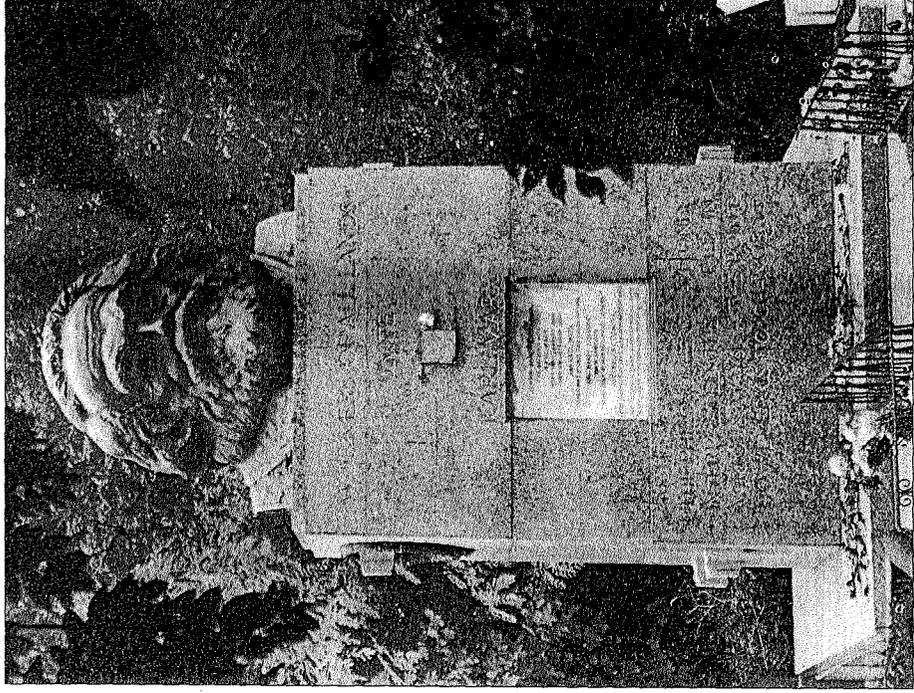


↑ 民主社会主义发端于一个世纪前的欧洲工人运动。



→ 社会民主党对马克思的社会分析理论并不抗拒，但却不认同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社会党国际前主席暨西德前总理维利·勃兰特是全球民主社会主义的卓越领导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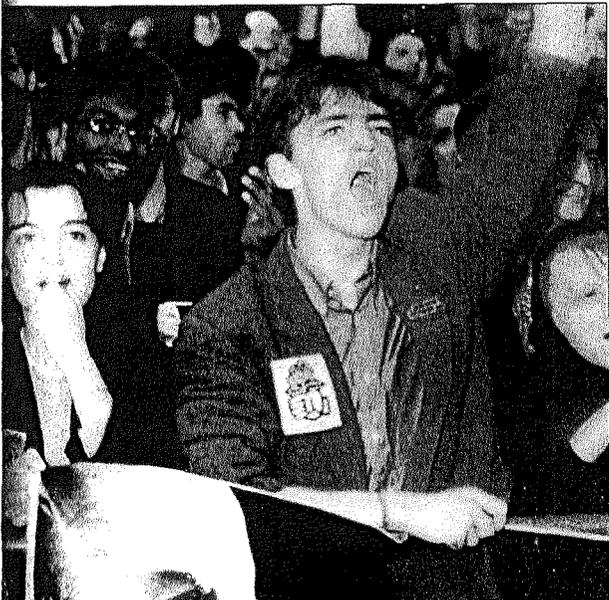
瑞典前首相欧罗夫·帕尔梅与其夫人的日常生活十分俭朴。他是国际裁军和南北合作的首要倡议人。



← 奥地利前总理布鲁诺·克赖斯基和勃兰特，都是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领导人和理论家。

↓ 1996年社会党国际第廿届代表大会在联合国召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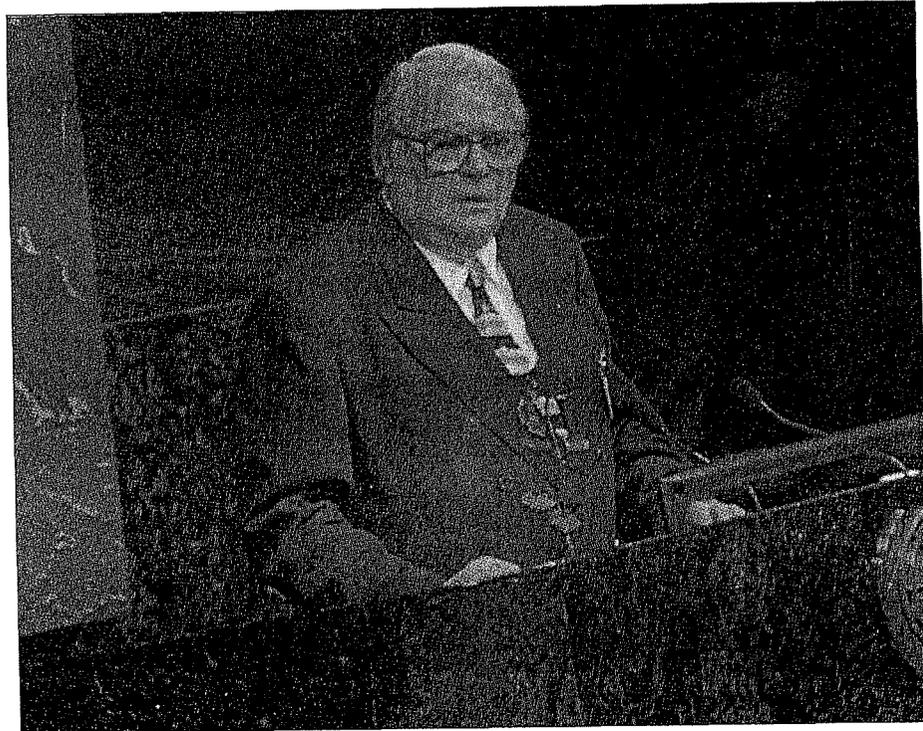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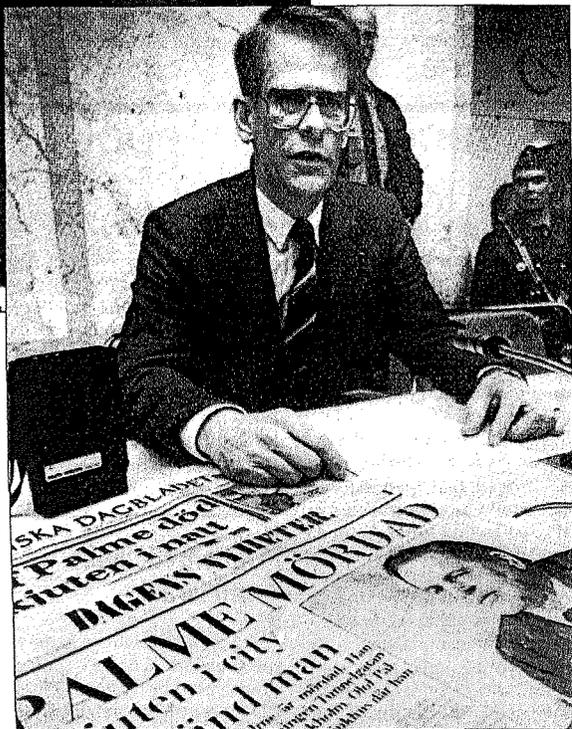




← 八十年代的左翼青年支持密特朗连任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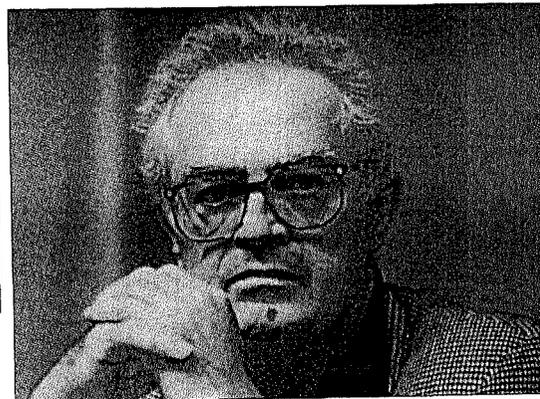
瑞典前首相英瓦尔·卡尔松是首位提出「可持续发展」环保观的社会民主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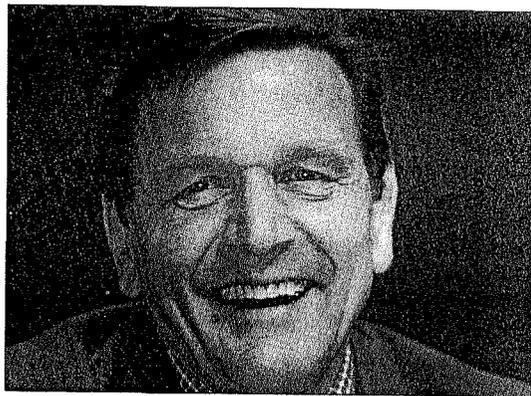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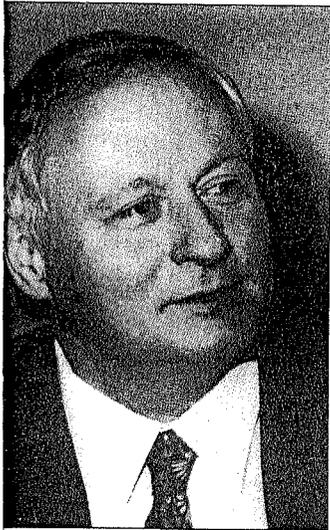
↑ 1992年9月，彼埃尔·莫鲁瓦在社会党国际的第19届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主席。



↓ 法国总理佐斯潘：「市场经济可以，市场社会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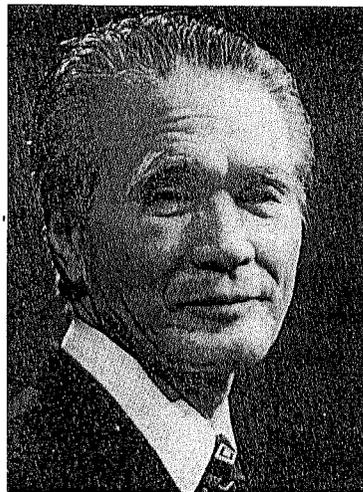


↑ 英国首相东尼·布莱尔被称为「睿智的务实主义者」。



← 德国财政部长暨社会民主党魁拉封丹坚持不放弃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

↑ 德国新任总理施罗德宣称要走「第三条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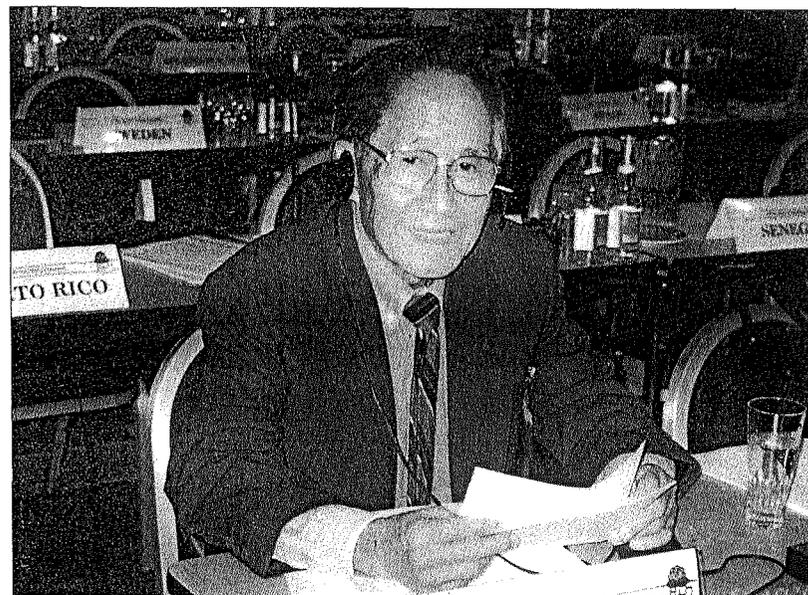
↑ 日本社会党领导人村山富市，曾公开向亚洲人民就二战的军国主义侵略而道歉。



→ 大马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吉祥主张「社会党国际」应易名为「社会民主国际」。



↑ 西班牙前首相冈萨雷斯说：「投社会主义一票就是投自由一票！」



← 1998年5月，民主行动党主席曾敏兴出席假挪威召开的社会党国际理事会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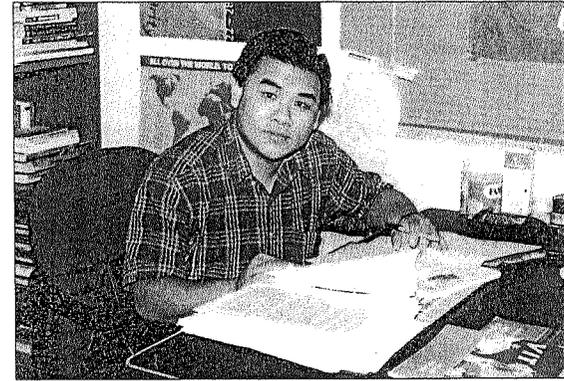
红玫瑰革命

丘光耀 著

红玫瑰革命

作者：丘光耀
出版：民主行动党蕉赖资讯工艺中心
DAP CHERAS IT CENTER,
No 532A, Batu 3½, Jalan Cheras,
56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603 - 9857532
Fax: 603 - 9830388
编辑：民主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承印：OTOPACK & PRINT SDN. BHD.
Lot 26, Jalan 5/118C,
Desa Tun Razak Light Industrial Area,
56000 Kuala Lumpur.
ISBN : 983 - 9820 - 08 - 7
出版日期：1999年1月1日
印刷量：0 - 1000
定价：RM20.00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作者简介

1970年出生于霹雳州安顺，中学时代曾兼职漫画助理。1998年毕业于吉隆坡尊孔独中，后与友人联合创办「漫画工作室」，7年内共出版了8本政治漫画与历史人物连环画传。

1989年加入民主行动党，受委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社会与文化秘书，积极参与宣传和后勤组织工作。

1991年入学南方学院马来学系，曾任学生会副主席。1992年因力争在院内主办「华教节」活动而引发学潮，并遭院方两度开除（又两度撤销开除令），最终以荣获「马来学系优生」证书而告顺利毕业。

1994年9月，以优异成绩破格考入中国暨南大学历史系硕士班。1996年获颁广东省「南粤优秀研究生」（一等奖）称号。同年5月，受瑞典社会民主党之邀到该党党校学习。

1997年7月考获硕士学位，返马后出任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吉祥的政治秘书及《社会民主青年论坛》主编。同年11月，代表社青团赴挪威出席社会党青年国际联盟第22届代表大会。

1998年接任中文版《火箭报》主编。目前是民主行动党全国副宣传秘书暨社青团政治教育局主任。

自序

在两年前出版的《第三条道路》，旨在为国人引荐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为了更广泛地在大马弘扬一种介于「亚洲价值观」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替代性选择，我近乎把全副的精神集中在专研有关的方向。

我力求把日常的工作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相挂钩，如撰写研究性和普及性的文章、编撰《火箭报》及《社会民主青年论坛》、为民主行动党开展政治教育工作、给大专青年提供理论启蒙，并且和国外兄弟党维持联系等等。

这方方面面的工作，让我深深体验到，要在大马当前这一意识形态「虚无」的大环境下从事理论建设的工作，非要「自我赋权」(self empowerment) 不可！换句话说就是要当一个「有力感」的知识份子！否则，这项工作很难支撑下去。

原因是大马的知识界，对什么「主义」都是持消极虚无的态度。他们只热衷于研究和谈论某某「思想」，如他们对 Neo-Confucianism 的「ism」丝毫没有抗拒之意，但却对 Socialism 的「ism」十分厌恶。

特别是那些标榜「不左不右」的所谓「多元论」知识份子，近乎幼稚地对「社会主义」感到莫名的恐惧，导致他们将「第三条道路」的提出，纯粹视为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标签。然而，随着最近欧洲左翼的回潮，「第三条道路」顿时成为全球的显学，那些骨子里流着「自由主义原教旨」血液的知识份子，平日爱说：「多研究问题，少谈点主义」；今日却鸦雀无声，愁容满脸。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我过去两年来的努力，开始看到了成

绩。本地的大专青年，他们开始对民主社会主义发生浓烈的兴趣，我受邀到大专生活营的每一场演讲，总会面对许许多多有关「第三条道路」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热情提问。最近，社青团更联合大专青年，初步筹组了「民主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以便能投入更大的精力，来为本土的民主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这本书的出版，和最近欧洲的红玫瑰变天有直接的关系。民主行动党对政治教育的重视，和过往的情况有很大的分别。党的政治教育局主任邓章钦，甚至费尽心思撰写一系列教材，并把民主社会主义列入课程的内容。

鉴于此情，我把过去一年半来所写的文章，应同志和朋友们的要求，给予重新整理和润饰，以作为政治教育的补充教材。我要特别感谢「蕉赖资讯工艺中心」的负责人伍薪荣和林光华，这本书的原初意念是属他们的，后经陈国伟、刘天球、张玉麒和李彬树同志的鼎力支持下，编撰和出版的工作方能顺利完成。当然，我也要向各大专的青年朋友们致敬，因为你们对协助在校园里发行和销售本书的承诺，让我们的士气受到更大的鼓舞！

国际政经形势的转变、国内政治「改革」的呼唤，把理论建设的要求提到了议事程上来。大马的民主运动向来缺乏理论建设的传统，导致理论的研发远远滞后于实践。没有理论作为行动的指南，过于激进的蛮干以及过于保守的退却，往往同样成为民主运动发展的桎梏。

理论研究不是脱离实践的梦呓；意识形态也不等同于教条，对「第三条道路」的探究和考析，在在是「对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社会的构想」。

5.11.98

目录

时代呼唤社会民主主义	1
第三条道路：体制社会主义的再探索	4
从新工党的胜利展望社会民主主义的恢宏	10
欧洲左翼回潮对亚洲青年的启示	17
社会民主在世纪之交的新态势	24
论安华的「中间道路」和社会民主主义「中间道路」的异同	35
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如何理解「人的本质」	46
社会主义应用「伦理」来坚持	59
对「团结互助」理念的再考析	62
对劳动节意义的反思	66
「社会化」取代「私营化」	71
格瓦拉的斗争与恐怖主义的区别	77
重建行动党的意识形态？	83
论林冠英公案的正义标准	91
政治立场与新闻专业没有冲突？	99

附录

社会民主主义：亚洲在世纪之交的新机遇	107
东亚经济危机与东方社会民主主义改革	112
社会民主的新疆界	123
社会党国际的连续性与更新性	126
我们与未来的工作	132
瑞典模式：国际化趋势下的牺牲品	135
城市贫穷的定义	139
行动党新旧「政治典范」的冲突	145
需要一种新的政治文化	153
行动党的未来应秉承四大理念	159
行动党的斗争与草根运动	165

时代呼唤社会民主主义

由于东亚许多保守的民族主义政权，在二战后建国，为了达到反共剿共的目的，遂把马克思的学说、共产党的苏维埃实践和社会主义的理念一并等同起来，混淆视听，企图把左翼进步运动抹黑成暴力、极权兼恐怖主义「三位一体」的妖魔。

历经数十年简单化但强悍的反共宣传，使到今天年轻一代，将任何批评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激进女权运动、红色绿党、社会民主党、解放神学、新社会运动、托派等），一律视为洪水猛兽；有的甚至把迄今依然信仰社会主义的个别人士与团体，当成落伍、愚昧的顽固份子。此外，亚洲当代史上所发生诸如赤柬的屠城、越共的排华、中共的文革、朝鲜的饥荒和苏联的霸权，总体上更加深了亚洲青年对左翼的负面印象。许多朋友往往可以用简单的语言概括出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直观见解，如「吃大锅饭」、「做也三十六，不做也三十六」、「虐待战犯」（兰保电影的影响）、「领袖崇拜」或「坦克车镇压」等等。

难怪大马的人民社会主义党（PSRM），在东欧变天后，就仓促地把「社会主义」丢掉，易名为「人民党」；民主行动党则不断「漂白」民主社会主义，左右不分地专注于和日常课题打交道。

要在这麽一种保守的政治氛围下弘扬社会主义，似乎有点不识时务。如在英国执教的大马籍政治学者詹运豪博士曾规劝民主行动党社青团（DAPSY）放弃社会主义的「招牌」。然而，我近年来在行动党内从事政治教育（将弘扬社会民主主义列为工作重点之一），同时也在中文报章撰写有关讨论左派理论和实践的文章，这

些工作都在党内外引起若干程度的回响，特别是行动党的新生代和大专青年对社会民主主义开始产生兴趣。

这或许反映了大马青年一代，对政治经济问题的困惑与反思，存在着呼唤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替代观点的需求。马克思曾曰：「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社会民主主义能否在大马开花结果，当然胥视本土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我国近年来勃然而兴的经济发展势头，伴随着真假参半的「小开放」，虽然令许多人告别了往昔的忧患意识，但是在党国资本主义的操作下，倍受异化的「日常生活」，其表面虽然风调雨顺，却掩盖不了残酷丑陋的本质如：

(一) 在亚洲价值观的宰制下，各族人民仅能有选择性地享有半截子的人权、自由、民主和法治；

(二) 国家的经济资源，日愈集中在一小撮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权力精英手上；

(三) 下层的普罗大众在国家拟定的低贫穷线上依旧面对贫穷的梦魇；

(四) 蓝领工人的「阶级意识」经政府长年打压工运而窒息，其基本的福利和权利，只有透过资方的「恩赐」才能享有；

(五) 白领阶级如城市上班族虽然解决了温饱问题，但生活质量（如交通阻塞、住房与环境卫生、公共治安）的低指标被视为是繁荣的象征；

(六) 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精神枷锁依旧紧扣，在学术领域本应享有的基本自由没有真正被落实；

(七) 青少年所犯上的「社会病」，是典型虚无主义及消费主义主导下的产物。政府没有适当的管道，把他们过剩的精力和不满

引向建设性或有目的性的活动（如恢复地方议会选举，把普选权下放到 18 岁），从而让青少年积极参与国家与社会的建设工作，抵消消极和宣泄的逆反行为；

(八) 妇女和小童在家庭暴力的摧毁下，身心严重受损，但国会在这方面的立法却远远滞后于现实，导致他们求助无门；

(九) 国人迄今实质上还无法在「土著」与「非土著」的划分下真诚团结，种族主义的幽灵经常神出鬼没，混淆了阶级剥削的本质；

(十) 环境与生态在「发展主义」下被迫牺牲，绿色政治的议程在本土无从拓展和推进。

以上所概括的十点弊病，是大马在「威权性发展主义」政权下所派生的异化现象，它们应如何克服，如何比较有效地获得改善，都是我国各民主派和社会民主党人所必须面对的考验。毫无遏制地奉行保守派的私营化与「市场万能」、「效率至上」的政策，肯定只会更加恶化有关弊端；但是若服膺于共产主义的教条，则会导致步向苏维埃政权的历史命运，而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正正是值得我们共同探索和开创的新替代路线。

本文曾刊载于 1997 年《大专生》第二卷第一期，当时尚未爆发亚洲金融危机风暴，故文章的批判没有触及经济发生危机后的各个介面。

第三条路： 体制社会主义的再探索

欧洲联盟 15 国当中，目前唯独西班牙和爱尔兰由右翼政府掌政，其他走「第三条路」的政党（如工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有 7 个单独执政，另 6 个加入左翼联合政府。这是自九十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共产党集团崩解以来，欧洲首次出现左翼全面回潮的高峰期。

冷战结束，右翼理论家纷纷论证说「历史终结」了；并指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状态；非但共产主义，所有的左翼道路皆证明是走不通的。

东亚威权政府也乘机大肆回应西方右翼的「文明冲突论」，以模糊左右意识形态对主宰公共政策的影响。我国华社知识界也普遍推崇不左不中不右的「伪多元主义」，鼓吹「多研究问题，少谈点主义」。

因此，我们对欧洲左翼回潮的现象无法宏观把握、更无法透彻理解。到底「第三条路」是一条怎样的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践还算是左翼吗？英国首相布莱尔、法国总理佐斯潘、瑞典首相珀森、以及最近刚上台的德国总理施罗德，他们的施政纲领都是抄袭自新自由/保守主义？为何他们上台前后总要蓄意淡化社会主义以讨好工商界；甚至不惜和工会保持距离？

为了要简要地回答上述问题，首先我们必须认清一点，即「第三条路」是属于一种作为「体制的社会主义」，它和作为「理想的社会主义」；作为「学说的社会主义」以及作为「政治运动的社会主义」有所不同。因为社会民主主义是一支要透过参加民主选举并赢得执政权才能施展抱负的左翼流派，故它不同于靠布尔什维克式建党的共产党，亦和极左托派专搞社会运动起家略有差异，也和书斋讲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区别。

社会民主党既然选择走议会民主道路来落实社会主义的价值观，那么它必须尽可能地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而非固守在传统的蓝领工人阶级中求存。社会民主党历经整整一百年的实践，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阶级的调整、右翼政敌的演化，它无法不走出「工人党」的旧框框，而迈向「全民党」的方向来组织政府。

「渐进的改良」意味着不以暴力推翻政府，不靠没收资本家财产来建设社会主义。由此，持续耐心的说理、生动有效的宣传（甚至突出党魁的个人领袖魅力）、不偏激的经济纲领、能赢得大多数民心的社会保障政策，遂成为了社会民主党为了参加选举而被迫不断「修正」（甚至「隔裂」）传统左翼教条的理由。

对「第三条路」的不同理解

如果我们回溯社会主义发展史，就会发现对「第三条路」的诠释是因人因时而异的，它大体上有三种理解：

（一）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解：二战后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为了要和苏俄式的共产主义以及自由资本主义划清界限，便把自己定位

成「第三条路」，他们在1951年6月组织了自己的国际组织——社会党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以红玫瑰为共同标志。这些党在政治上奉行改良主义、鼓吹混合经济、强调国有化，通过三高政策（高收入、高税收、高福利）积极缔建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制度；工会是他们政治运动的主要支柱。它们的民主社会主义观主要有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国际民主，基本价值为自由、公正和平等、团结互助及和平。这些党对列宁主义是全然持否定态度的，但对马克思的社会分析理论尚能加以扬弃地接受，特别是各个党的青年团，迄今依然保留相当激进的作风。80年代以前，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欧洲，被视为「欧洲中心主义」的「左翼流派」，然而，在西德前总理维利·勃兰特接任主席后，积极扩张民主社会主义在其他大陆的影响，以摆脱「白人国际」的印象。民主社会主义在实践上较为成功的模式主要有「瑞典模式」和「莱茵模式」。卓越的领导人西德的维利·勃兰特、瑞典的帕尔梅、奥地利的克赖斯基。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当代西方尖顶左翼知识分子因对「苏共模式」的彻底失望以及对美式资本主义世界的严厉批判，导致他们对建立现代工业社会的合理性（不论左右）皆感到质疑。他们认为左右两种制度都是异化人性的，但又不看好民主社会主义能有效克服问题的两难，原因是他们认为依靠工人运动来走「第三条路」是不行的。如马尔库塞认为工人的阶级意识已被「单一化」，失去了造资本家反的能力。由此，他认为学生、知识分子、流浪汉、有色人种的被迫害者才是社会革命的主力，透过意识革命，搞「大拒绝」，从而开拓「第三条路」。西方马克思主义不热

衷议会选举，推崇街头运动。在60至70年代的欧美校园和社会运动方面，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力。后来随着多位精神领袖逝世或退居书斋，影响力遂回返大学讲坛。从理论而言，他们对晚期资本主义所进行的文化批判是最为激烈的。

（三）社会民主的理解：90年代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开始反思是否要放弃「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而改称「社会民主」（Social Democracy），布莱尔甚至称「社会-主义」（Social-ism）。这肇因于苏东波变天，欧洲普遍「向右转」，令民主社会主义者感到十分狼狈。加上欧洲经济开始不景气、失业率高企、福利国的「刚性包袱」累赘、资本家恫言资金外逃以及工会对社会党政府的胁迫作风等等，导致民主社会主义者对传统所标榜的「第三条路」再次被迫进行修正。他们开始提出「新中间」（New Middle）道路，模糊左翼色彩，远离工会约束；提出更务实的经济、税收和社会政策（突出教育投资、改革福利制度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积极开拓更广阔的票源。虽然他们试图向工商界表示亲和，甚至不反对私营化政策，但并不认同「市场决定一切」的保守主义理念。它们也积极鼓吹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和健全的家庭价值观，并呼吁亲属应分担家庭成员的社会风险，承担应份的社会福利责任。此外，他们也和共产党及绿党竞争环保份子、妇解份子、有色人种、新移民及同性恋者的支持。在国际事务方面，它们追随北约的路线，大力反对恐怖主义和国际犯罪，并赞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配套措施，总体上有模仿美国新政党的影子。

他们所理解的社会民主，是介于旧左和新右之间的「中左」

路线，被称为「睿智的务实主义」。有人甚至把它概括为「社会自由主义」，指它的社会经济实践是以美国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来作为参造系。

当今归类于第一种理解的社会党人，或曰社会党的左派，较鲜明的有法国社会党、瑞典社会民主党、挪威工党、奥地利社会党、意大利左翼民主党等；至于属第三种理解者，则英国新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佼佼者，它们比较接近美国新民主党的激进自由主义。当然，这是属于较粗线条的划分，事实上他们个别党的内部也是左、中、右派系林立的，并经常为了政策的左右摆动而争执。最近可能出任德国新任政府财长的社会民主党党魁拉封丹（Lafontaine），普遍被外界视为「老左派」，他对施罗德的「第三条路」很有意见。此外，英国新工党内部的「Labour Left」及「Labour Reform」派系，对布莱尔的批判亦是十分激烈的。工党在「98年会」对布莱尔的批评，据悉是过去四年来最不客气的，并且有四名极左派的领袖被选入该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所以施罗德和布莱尔即使再「右」，也不可能完全走新自由主义的那一套方案。

变通：选民是务实的

不论社会民主党人怎么调整和变通，右翼依然竭尽所能地歪曲和攻击累进税制、福利救济、集体谈判机制、公用事业社会化、妇女固打制、扶贫优惠措施（Affirmative Action）、可持续发展（环保主张）、裁军、防止核扩散、国际工运串联等等属于「民主

义」或「社会民主」的核心政策（激进程度各党有异）。

以上的政治/经济/社会议程都需要获得大多数选民（西方世界以中产阶级为主）的认同，才能付诸于实践。不论喜欢不喜欢，一般选民都是务实的、短视的。换句话说，太长远的目标、过高的政治纲领、需要向现实利益妥协的经济理论，很难吸引到选民的支持。

原初的理论和往后实践上的差异，成为「第三条路」的必然局限，这对于「体制社会主义」而言是无可厚非的。

然而，右翼政党在下野后，不忘嘲讽社会民主党是靠剽窃他们的政策才能上台，但右翼为何不反诘何以他们正统的保守政策不再获选民支持？

除非我们承认左翼彻底失败，无须再继续探究（或阻止他人探究）新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制衡贪婪的资本主义，否则像共产党、社会主义工人党、托派和绿党等在政治坐标上较社会民主主义更「左」的党派，动辄攻击「第三条路」是「妥协路线」、「议会迷」、「向右转」及「机会主义」等等，是无助于在全球化时代共同肩负起抗衡资本主义国际化的新斗争使命的。

从新工党的胜利 展望社会民主主义的恢弘

由东尼·布莱尔所领导的英国新工党，在经历了18年在野的卧薪尝胆与深切反思后，终于在97年5月1日的全国大选中，以横扫千军之势，重挫执政长达4届之久的保守党政权，成功入主唐宁街10号。

近日主流传媒已频频针对新工党的凯旋告捷与保守党的辙乱旗靡展开许多论述和剖析，故本文不打算再从两党的选战文化、领袖魅力、政党形象等多费唇舌，只想集中探究新工党在进行「现代化」改革过程中，其背后的恒定本质与战略考量。

笔者以为，把英国新工党从低谷中扭转乾坤的改革进程作为一个参照系，再和近年来东欧出现「左翼回潮」的趋势一并考察，相信会有助于我们宏观把握社会主义在下一世纪的历史命运。

东欧社会党东山再起

回想起6、7年前，苏联崩解，东欧变天，一个个「现实的社会主义」(Real Socialism)国家如多米诺理论般倒台，右翼政党一夜之间以「民主斗士」的姿态接管了政权，自由市场经济被推崇为民主政治的万灵丹。然而，东欧人民对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陶醉没多久即从「震荡治疗法」(Shock Therapy)的冲击中猛醒过

来。恶性通胀肆虐，失业幽灵徘徊，社会安全保障体制失效，生活水平大幅度滑坡。新掌权的右翼政府官僚比过往的共产党政权还要贪污腐化，其自由市场经济下的私有化政策促使社会不平等的鸿沟迅速扩大，导致一小撮人发财致富、纵欲享乐。人民在冤情沸腾之余，滋生了怀念过去稳定生活的情绪，加上改宗社会民主主义后的前共产党人，经痛定思痛，整装待发，展现出全新的政治面貌——告别过去表面所理解的种种经受扭曲后的「兵营社会主义」之理论和实践，不再把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剥夺剥夺者、实现公有制当作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而提出「以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为实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私有化和财产所有者与劳动者的社会公正」。由此，东欧诸国的社会党在主客观形势的配合下，自1992年杪开始，纷纷透过和平投票途径重新掌握回政权。

20世纪末「历史的终结」恰恰正是21世纪「进步」历史的开始。从镰刀铁锤转型到红玫瑰，证明了1990年崩解失败的并非社会主义，而仅仅是扭曲了社会主义实质精神（如人的解放、自由、平等、民主、公正、博爱、团结）的「斯大林模式」，其中一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并不等同于社会主义总体理想、价值体系与其他另类模式的灭亡。

不同的道路和模式

历史和现实都已证明，社会主义运动不存在单一的模式，不同国家由于不同的主客观条件而各有各自不同的模式。每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模式也会由于不同时期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而发生变

化。社会主义有理论到实践的一个世纪以来，除了有马恩列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模式外，尚有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如瑞典模式、莱茵模式及荷兰模式），中国亦有文革前按毛泽东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模式和改革开放时按邓小平所倡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亚非拉各国更有揉合了各种宗教价值观与民族特色的模式。故任何模式都决不能自诩是最正确、最终极的唯一模式。至于一种社会主义模式是否服膺社会主义的精神和原则；是否正确、正确程度多少；是否有缺陷、缺陷又是什么，都不能按马恩的经典本本来检验。反之，成功或比较成功的社会主义模式，只能是那些在具体实践中证明符合时代精神和本土国情，在结合社会主义精神下而能在各个方面产生积极成果的模式。这么一来，有关模式不可能是定于一尊的，它必然要随时代的不断发展而自我修正与自我完善化。

改革与战略

英国新工党为重新上台执政而规划的改革宏图以及所布署的战略步伐，如修改党章第4条款（放弃国有化）、与工会保持距离、承诺不加入息税及公共开支、把通胀率控制在2.5%以下、改革教育与全民保健服务等都是淡化左翼色彩、大力拉拢中产阶级选民与工商界支持的举措。然而，另一方面，新工党亦承诺实行最低工资法、重签欧洲联盟工人权利社会宪章、以「就业福利」(Workfare)取代「救济福利」(Welfare)、主张废除上议院承袭议席、就比例代表制进行全民投票、推进伦敦市长直选等，都显然

比保守党「激进」。一句话，新工党「将致力于创造机会、伸张社会正义、追求进步和重建社会意识」。布莱尔表示：「目标极为明确，但是在追求成果的过程中，我们不崇尚教条！」这就是「新工党，新英国」。然而，主流媒体却讥讽布莱尔「抄袭」保守党撒切尔主义的精髓（如私营化），并指责新工党的「中间偏左」路线是背弃社会主义与工人阶级的右转方针，工党强硬左翼领导人东尼·本(Tony Benn)更形容新工党「旨在创造一个目的是使其国会议员掌权的新党，根本忽视了工会和社会主义的传统。」

然而，布莱尔却没有因「左」的干扰而动摇改革的决心与放软改革的力度，他声称：「没有原则的权力是贫瘠的，但没有权力的原则是无益的」；又强调：「唯有赢得大选，我们才能为穷人和无家可归者服务」。这证明工党在过去数届大选连番败北后，逐步认识到1917年建党时的章程（斗争纲领）随着时代的变迁，有些宗旨如大规模实现国有化已经「过时」。当今不仅大多数的英国选民不再相信这一套，事实上，连工党近10年以来也未曾承诺要真正扩大国有化。尤有进者，国有化的概念也容易遭到保守党的蓄意曲解，撒切尔夫人在过去经常爱把工党等同于共产党；而梅杰在今届大选中也把工党描黑成全球仅剩其中两个依旧相信公有制的政党之一，另一则为朝鲜的劳动党。

向资本家学习

若回顾国际工运史，布莱尔并非第一位「抄袭」右翼经济理论的领导人，「抄袭」得最大规模、最使劲、最迅速、甚至公开宣称

「不要害怕向资本家学习」者，当首推列宁。他在晚年推行旨在为「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经济政策」时就曾说过：「哪怕他是一个大骗子，只要他组织过托拉斯，只要他这个商人曾经搞过千百万人的生产与分配，只要他有经验，我们就应向他学习。」

有鉴于此，那些今天依然顽冥不灵地抨击新工党探索与建设自己道路或模式的「左王」，应该重温列宁晚年的遗作。

最近有不少西方论者皆认为，20世纪末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最根本的关键，即是在探索与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过多地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这股思潮左右着人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正确认识；阻碍着社会主义理论的现代化发展和突破；不利于社会主义另类模式的建设与多样化。「极左」的思潮表现在盲目、机械地套用本本来对待新事物，从而扩大矛盾、制造纠纷。

众所皆知，社会主义不论所属何种流派；不论主张用何种手段「过渡」，都离不开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下选民意识的考察。西方不少论者曾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进入科技革命的新阶段，传统的产业工人已由单一的「蓝色」转变成「五颜六色」，首先是「白领」工人的大幅度上升，较后又从中分化出从事工程技术的「金领」工人，另有专搞设计、维修与营销的「灰领」工人，再来是参加服务性质和文书工作的女工，称之为「粉白领」工人。加上最近因资讯革命而涌现一大批新型的「知识型」工人，多元分化的工人阶级已无法再因世界观或价值取向的认同而凝聚成一股「自为」的阶级。赖以对抗资本家的「阶级意识」（如团结互助）被

「里根革命」与「撒切尔主义」冲击得七零八落。「极端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许多传统价值观格格不入，非产业工人反而更倾向新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自由放任和非集体化意识。

社群主义

由此，布莱尔从英国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约翰·麦克默雷（John Macmurray）那儿得到了灵感，新工党主张的「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和「利己的利他主义」（Egoistical Altruism）都源于麦克默雷的「他人中心论」（Other Centred View），这种从宗教伦理出发的新集体主义观认为：「利他是个人利益的最高体现」，主张「如果您为我效劳，我也会为您奉献；大家共同建立社群意识，人人都承诺为所有单个人的福祉而同舟共济」。与此同时，「我们也不会社群关系中丧失个人特征。反之，个人特征只有在社群关系中才能彰显出来」。

换言之，「他人中心论」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个人有权利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事情，只要不对他人构成伤害——是肇始于一个虚幻的假设，因为它把人假想成存在于一个真空的状态，唯有在作出选择时方影响他人。故麦克默雷认为「缔造社群即是在所有的个人关系中建立友谊，这是一项笃诚的任务，它只能通过转变我们行为的动机后始能呈现出来」。简单来说，麦克默雷希望人人都能摒弃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孤立倾向」，鼓吹「为他人做好事」，「力求做到人人出力和人人尽责。」布莱尔把它用作重振

英国人民的社会意识，宣称「社群主义是欧洲左翼复兴的酵母。」

新工党在现实的历史条件下，为求抗衡保守党，恢弘社会民主主义而审时度势，不盲目蛮干，不受制于本本教条都是值得肯定的作法。反之，该党内外各股「极左」势力，一味宣扬唯我独「纯」、唯「马」（马克思）首是瞻，在在把英国的进步力量送入死胡同。

红玫瑰取代镰刀铁锤

社会民主党人在下一世纪的使命是任重道远的，红玫瑰取代镰刀铁锤是历史进程的「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要证伪「历史终结论」，就必须从理论到实践均能高度且有机地与时代的特征、需求和理想相结合，若只抓准时代特征与选民的务实需求，而未能激发人们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与追求，那麽社会民主党人即使掌权也与右翼政党无异；然而若只强调理想，妄顾现实的需求，脱离时代的特征，则社会民主党人只能沦为边缘化的角色，任由保守势力宰制一切。

最后，笔者谨以社会民主党先烈李卜克内西（Liebknecht）的一句话作为文章的总结：「在业已改变的形势下不改变策略，并不证明性格的坚强，而只证明智力的贫乏；并不证明始终如一，而只证明无能为力。」

本文曾刊载于1997年6月1日《南洋论坛》。

欧洲左翼回潮 对亚洲青年的启示

——为纪念社青团签署波恩《社会主义青年宣言》一周年而作

社会主义运动在廿世纪八十年代末遭到了全球性的大挫败，尤以「苏联模式」为典范的科学社会主义，因为在实践上经被证实乖离和扭曲了马克思的理论和学说，故走上万劫不复之路。

西方保守派借此大肆鼓吹「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同一时候，东方保守派（如大马的国阵、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与中国的共产党）亦高举「亚洲价值观」的旗帜，相互配套地将对方「妖魔化」（Demonize），企图制造新形式的冲突概念，以转移或模糊今后左右意识形态的争拗，合理化全球保守主义在后冷战时代的施政，并遏制世界公民社会的茁壮发展。

西方左翼在七、八十年代曾受到「里根革命」与「撒切尔主义」的洗劫，力量一度萎靡不振，再加上蒙受「苏东波」骨牌效应的波及，九十年代初期可谓雪上加霜，复兴无望。

人民的欧洲

东方的社会主义政党，由于二战后所追循的模式要么亲苏、要么亲中，依旧是走暴力革命路线。他们建党的土壤是封建的；建

国的底子是属于自然经济的；加上教育、文化水平不高，资产阶级法权意识薄弱，左右阵营都处在没有公平竞争的野蛮状态下斗争，导致终日纠缠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概念巢臼里，把一切试图以和平手段建立公民社会的社会民主力量一律斥为「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云云。

东亚各国的共产党，一直都处在民主建制外抗争，影响力式微，加上苏东剧变后，武装斗争的路线更是无所适从。至于在二战后即取得政权的一些共产党，如中共与越共，也不得不顺应时代的大潮而搞改革开放，成绩虽然是肯定的，缺点则依然不少。

总体形势皆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东欧前共产党人在遭到右翼的围堵后，痛定思痛，洗心革面，纷纷改宗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确实认真检讨并告别往昔错误的理论与实践，重新踏上社会主义的新征途。

首先在东欧回潮的左派是立陶宛劳动民主党、接着是匈牙利社会党、斯洛伐克民主运动与保加利亚社会党。随后尚有德国统一后的前东德的民主社会主义党，在原行政区的地方议会以及欧洲议会的选举中皆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近日的阿尔巴尼亚社会党，也在民主党贝里沙统治下的废墟中崛起。

西欧方面，最振奋人心的莫过于在今年5月1日凯旋告捷的英国新工党，加上6月法国社会党联合其他左翼力量成功上台组阁，大大恢宏了社会民主的信心。目前欧洲左翼踌躇满志，欧洲联盟中的15成员国当中，有12个是由左翼主政，其中6个是单独执政、另6个是执政联盟的成员。

左右不分地「妖魔化」西方

欧洲左翼澎湃回潮，宣告「历史终结论」的破产以及「文明冲突论」的失灵，因为推动历史巨轮向前滚动的关键依旧是左右对峙的矛盾。保守主义依然是右翼，代表资本主义的一方；左翼的担子，由共产党的肩上卸下，转给了以红玫瑰为象征的社会民主党。

然而，在东方，不论是共产党政权抑或是保守派的民族主义政权，为保政权的长治久安，遂联手促销「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以「亚洲价值观」来反击西方的「文明冲突论」，硬把多元分化的西方世界铸成铁板一块，并全盘将之「妖魔化」，成为魅影重重的假想敌。什么「人权外交」、「干预内政」、「文化侵略」等罪名统统被泛化并追算到整个西方文明的头上来。

也唯有这样，倡导回教与儒教价值观来作为反击西方基督教价值观的举措才更能发挥动员与宣传效应；也唯有如此，左右不分地反击西方世界才能模糊「后殖民」的亚洲人民对西方进步理念的借鉴与追求，从而遏制亚洲左翼的反思和扬弃。

这么一来，许多发源于西方工人运动，但随后发展成具有普世意义的民主、自由、平等、解放等价值观皆简单化地被划入同一西方价值系统中，一律要严加拒绝。导致大马人民一般搞不清楚什么是自由主义、什么是保守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以为西方就只有一种主义，就是要欺压亚洲人民的帝国主义。至于在国内倡议民主人权的人士与团体，不论左翼右翼，统统被妖魔化为西方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的代理人。

对「全球化」的批判

吊诡的是，在上层建筑领域，东亚的保守主义政权虽然是那麽旗帜鲜明地抗拒西方文明的宰制（「亚洲价值观」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的幌子下，抬出儒家文明和回教文明来为自己的极权/威权式的统治辩护），然而在经济领域，东亚的保守政权却奉行西方资本家所推崇的贸易自由化和公共企业私营化的政策，同时亦积极为西方跨国大财团入主亚洲廉价劳动市场以进行剥削活动而扫清一切障碍，如透过立法打压工运、箝制学运、「规范」媒体报导、削弱三权分立机制以及牺牲生态平衡等。这种二元分裂的虚伪举措，值得大家深思。

「工人无祖国」的国际主义，看来将之发扬光大的是资本家，尤其是结合了新科技革命的趋势，跨国资本主义大财团与康采恩更能无限制地扩大生产以实现资本增值的本性。

即使是从事具体生产性活动的跨国公司，它们致力于把北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和南方国家廉价的成本结构加以结合，把公司的行政管理机构设在北方，将生产的厂房设在南方，尤其是选择设在距离原料产地或销售市场最近、劳动力价格最低廉、工运力量不强、基础设施较好的国家。

跨国公司之所以这么做，一来可以使资本增值在每一个生产与销售的环节上，二来跨国公司缴交税务的对象得以一分为二（在北方只须要交一般办事处行政运作的税务；在生产所在国所缴纳给南方政府的厂房生产税自然比北方国家政府的税率要低得多），其利润自然数倍暴增。

至于从事非生产性活动的投机财团，它们通过资讯工艺进行跨国的「以钱生钱」的有价证卷、外汇、期货市场等交易，导致一种「没有祖国」的「流动资本」，在全球能以虚拟的形态逃脱所有国家的监控，整个地球仿佛成了大赌场，数以亿计的虚拟资本（virtual capital）能在键盘一瞬间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以套取在分秒之差的巨额利润。正是这种非生产性的纯粹投机活动，导致大马中央银行在1992年至1994年因参与外汇炒卖而亏损了3百亿零吉。反之，一名被称为「大盗男爵」的62岁美国环球货币大炒家——乔治·梭罗斯（George Soros）则在1993年9月的欧洲货币危机期间，从卖空英镑中赚取了50亿零吉。最近，梭罗斯再度狙击东协国家的货币，导致首相马哈迪医生公开点名批判他。然而，马哈迪却忘了大马中央银行在3年前也曾参与货币投机炒卖，可见全球化的资本主义豪赌活动，东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皆有份染指，马哈迪大可不必自鸣清高，严以待人，宽以待己！

至为令人遗憾的是，我国人民的思想因受到政府的操控，在一窝蜂地捍卫「亚洲价值观」之余，却忽略了亚洲保守主义者在经济领域所实施的正是迎合西方跨国集团所服膺的游戏规则，如「让市场决定一切」、「盈利至上」、「贸易自由化」等属于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市场经济观，再由此所推导出来的「全球化」浪潮，正正是西方新帝国/新殖民主义在亚洲扩张剥削地盘的罪魁祸首。

近日在一项由「公正世界国际运动」（JUST）主办、澳洲「国际基督教和平运动」（The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Peace Movement）所协办的《全球化的区域会议——亚洲太平洋区宗教传

统与文化社区的观点、经验及回应》的国际会议里，其中一位学者大卫·洛教授，从佛教的教义出发，对跨国企业进行了批判。他在总结时表示：「跨国企业有必要加以纠正，并以更好的经济与政治体制取代，否则受害的将是我们的后代。」

保守派的「黑袍底细」

在谈论「全球化」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冲击时，对跨国企业运作的研究和批判是至关键的前提，离开这个前提而光谈论宗教或伦理的介面，肯定有失偏颇。当然，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若再结合宗教或伦理学的考析，我们对「全球化」的认识与把握将肯定更为全面和深刻。

为反击东西方保守派所配套运行的「全球化」活动，亚洲人民应考虑团结西方左翼，以重新弘扬国际主义精神，共同携手揭穿「文明冲突论」的「黑袍底细」（Hypothesis 臆说），力求再造另一个公平的世界新秩序，诚如行动党社青团在1996年7月27日假德国波恩所签署的《社会主义青年宣言——团结互助的力量》（Declaration of the Socialist Youth — THE POWER OF SOLIDARITY）中所述，一个新的、公平的世界新秩序应该为全球人民提供：

- 一个能给予全人类平等权利与最大限度自由的社会；
- 一个终结不公平财富配置的社会；
- 一个没有剥削的经济制度；
- 一个为男女皆提供平等权利与机会的世界；

- 一个不因肤色、种族后裔、文化与生活方式、性别、性取向和个人残缺而受到歧视的世界。

为了达致上述目标，我们必须团结互助，共同为推进属于社会主义未来的经济纲领：

- 严正地向那些以主要货币进行投机活动的资本主义宣战；
- 强化区域之间的劳工团结力量，深化区域之间的社会与经济整合；
- 建构南北双方的联盟，以合作代替剥削；
- 反对全球经贸自由化的教条，某些特定的保护主义可用作反击北方工业强国的剥削；
- 拟制一个能在全球、区域与本土范围广泛创造就业机会的劳动市场政策。削减工作时间将是达到有关目标的其中一项重要途径。

一年前，民主行动党社青团曾委派副团长郭素沁、副秘书长尤国基及财政饶桂美，在行动党全国副秘书长章瑛的率领下，远赴德国出席了社会党青年国际联盟（IUSY）的国际夏令营，并签署了有关宣言。随着社会民主在欧洲的回潮，再配合行动党全方位的改革计划，社青团应不时检讨与反思斗争步伐，并以该宣言作为行动的指南以及制定政策的参照。一句话，我们应积极联合西方左翼青年，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缔建一个更人道、更民主、更开放的全球公民社会而奋斗！

社会民主在世纪之交的新态势

社会党青年国际联盟第 22 届代表大会侧记

80 年代末的东欧剧变，在全球保守派眼中，不仅是共产主义的破产，亦是所有左翼理论与实践的失灵。

以西方为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家，遂捉紧千载难逢的时机，大肆鼓吹「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以文化领导权的手段，企图通过重新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兜售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同一时候，亚洲的保守主义政客，凭着强劲的经济成长，在揉合了 70 年代的依附理论后，也频频强调文化相对主义，以突出「亚洲价值观」，来合理化其遏制后冷战公民社会发展的威权统治。

一句话，「全球化」(Globalization) 在东西方新自由 / 保守主义的相互推进下，其本质即是「全球资本主义化」(Global Capitalism)。

「全球资本主义化」在北方国家的表现，是右翼政府大肆削减社会福利，协助资本家打压工运；跨国企业则利用南北差异来离间工人，拒绝在北方缴纳高税务同时不断扩展对第三世界的剥削地盘；国际货币投机客利用资讯工艺和自由化的大潮，不时狙击各主要货币，从中牟取暴利。

至于在南方国家，保守的经济政策体现在政府大规模地将国

家资源和公共服务私营化、允许外资剥削廉价劳工、牺牲生态平衡以及妖魔化民主、人权和自由等普世性的价值观。可以这么说，后冷战时代是资本主义一元独大的格局，东西南北的矛盾基本上还是以阶级为轴心，只不过是剥削形式（参杂了种族、文明、性别等）的多元化，模糊了人们的视线。而左翼势力在该历史阶段，则处于被动的窘态和守势。

庆幸的是，社会民主主义在全球左翼的停滞逆流中，经整合了前共产主义的改革力量后，重新在社会主义的发源地欧洲东山再起，成为当前循议会民主道路来抗衡资本主义的最强大势力。

迄今为止，社会民主在欧洲联盟的 15 个国家当中，单独执政或参加联合政府者达 12 国之多，惟西班牙、爱尔兰和德国处于最强势的在野党地位。至于尚未参加欧盟的挪威，该国的工党刚在今年 9 月的大选中下野，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却极有机会在明年的大选中推翻由科尔所领导的基督教民主党政府。总体来说，社会民主此时此刻在欧洲，可谓踌躇满志，气势如虹！

全球社会民主青年云集挪威

社会党青年国际联盟 (International Union of Socialist Youth, 简称社青盟 IUSY) 的第 22 届国际代表大会，就是在这么一种宏观政治的新态势下召开。1997 年 11 月 13 日至 16 日，来自全球 96 个国家的 126 个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以及在意识形态方面向中左亲和靠拢的青年团和学生组织，共派出大约 300 代表前往挪威的丽丽哈麦尔 (Lillehammer)，出席两年一度的国际代表大会暨见证社

青盟成立 90 周年的历史性日子。本届大会的东道党为挪威工党青年团 (AUF)。受邀出席的代表有来自社会党国际、社会党教育国际、欧洲议会社会党党团的资深领导人，如挪威前首相暨现任工党主席托普庄·贾克兰 (Thorjorn Jagland)、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国际秘书暨社会党国际地中海委员会主席莱蒙 (Raimon Obiols) 以及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艾尔福特 (Alfred Gusenbauer)，都是大会的嘉宾兼政治论坛的主要报告人。

笔者代表大马民主行动党社青团赴会，有幸目睹并参与了大会的辩论、浏览了若干个工作小组的讨论会与展览会，同时和各国的兄弟党代表交换了各自党的机关报、理论刊物、传单、海报和旗帜等，收获甚大。最难能可贵的是，挪威工党青年团的同志，在休会时仍孜孜不倦地为南方国家的兄弟党广泛介绍「挪威模式」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笔者从中所记录的大量笔记，其中有不少观点是值得行动党加以借鉴的。

从大会的辩论当中可窥得，来自各大洲的兄弟党，基于各国社会发展阶段和历史背景的迥异，故对若干问题的看法未能取得一致的共识。如对切·格瓦拉的评价、对前共产党是否真诚转型、对回教国家的社会民主实践、对社青盟领导层的结构性调整、对解决童工问题、对中东和平进程受阻的责任追究、对欧洲应否设立货币联盟以及对使用新的机器应否课税等等，都有待历史的实践来弥合认识上的分歧。

然而，大家所坚信不移的是，社会民主主义将是克服当前困难以及规划未来人类社会的最有效方案，而「国际的团结互助」(International Solidarity)则是制衡「全球资本主义化」的有力纽带。

大会主题：欧洲执政社会党的挑战

本届大会的主题，充分反映出欧洲社会民主党在朝的观点。社青盟对如何有效地解决欧洲高企不下的失业问题，进行广泛的咨询和商议对策方案。若非如此，社会民主党人改造世界的议程，将会因失业所接踵引发的青年问题、治安问题、社会福利问题、以及南北工人的团结等连串障碍而裹足不前。

由此，大会必须对未来的工作进行科学与伦理的分析。社青盟确认新技术革命（如资讯工艺、基因工程）业已对工作的定义、社会财富的分配、女性的角色、工运的拓展和「全球化」的推进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社青盟从未抗拒这种转变，我们所反对的是由新自由主义所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化」的剥削大潮。

社会主义的新任务

社青盟认为，社会主义自 19 世纪发端于欧洲工人运动时，就是一种对平等的自由的执着追求。社会主义的历史目标，正正是为建立一个得以让每一个人均能充分发展和满足其人类潜能的社会制度。因此社会主义的斗争，就必须改造既存不合理的资本主义那种异化人性的结构，打破种种诸如阶级剥削、种族压迫、性别歧视等遏制人类潜能发展的桎梏。

一个世纪以来，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依然没有完成，虽然我们的运动自工业革命开始，就已持续不断地「驯化」贪婪的资本

主义。但是伴随着一波又一波的科技革命，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一次又一次地获得延伸，并有日益强化之势。如今历史又发展到一个新的世纪之交，社会民主党人不能仅是让历史自由放任地发展，而是要用我们的理念去主导历史前进的车轮。对工作条件的人性化改造，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当前要务。

未来的工作观

只要我们承认人类是一种具有积极性和能动性的主体，那工作则是一个持续改造现实的创造性过程。社青盟认为，工作不仅是确保为劳动者提供衣、食、住、行的手段而已，而是把工作认识成是人类作为社群的一份子，他（她）有融入和贡献社会的社会属性。若人类被否决了通过工作来贡献社会的可能性，则人类将形同被边缘化或遭受社会的涤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工作的分享能给予人类一种重返社会以及让他（她）拥有充实角色可扮演的积极意义。

再者，工作也是人类自我完成（Self fulfilment）的必要前提，而工作的性质和条件对于一个人能否自我尊重（Self esteem）也是极为重要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里，牟利是资本家的至要考虑关键，因此为人们提供的工作环境、条件、待遇、福利都是尽可能维持在最低的标准而已。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就是要为人们的工作，奠下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基础。

在「全球资本主义化」的威胁下，社会民主主义的抗争也必须是全球性的。社青盟 90 周年纪念的口号即是：「遍布全球，改造

它!」(All Over The World, To Change It!)

改造全球需要团结互助

社青盟呼吁全球的工人要团结互助，免受跨国资本家的威胁和离间。大会为此重申数项关键的国际性合作步骤：

1. 资本主义在资讯工艺和自由化(Liberalization)及去规范化(Deregulation)的推波助澜下，非生产性的货币狙击活动十分猖獗，为了监控国际投机资金的流动，托宾税(Tobin Tax)的实施是十分迫切的。

2. 跨国企业在所谓自由化和有弹性(Flexibilization)的框架中「周游列国」，其剥削廉价劳工、逃避高税制以及破坏环境的活动必须即刻加以制止。强化南北工运、引入集体谈判的机制、严禁雇佣黑市劳工、杜绝童工被剥削以及制定最低工资法，都是可行的方法。

3. 国际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协助南方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解决日益膨胀的债务危机，所提出一揽子「矫枉过右」的方案，如推进自由化、缩紧财政开支、提高利率、更大规模的私营化、更强的外来干预等措施，导致人们最基本的社会和经济利益受到忽视。再者，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也是导致拉美小型企业无法生存的关键点。由此，社青盟谴责新自由主义的解决方案，并呼吁国际金融机构应检讨既存的累退税制（即收入愈高者纳税愈低）。社青盟认为有必要拓宽贸易条约的内容，如加入就业、移民、环境和若干程度的经济自主权等议程，以落实可

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社青盟特别推崇安甸条约（Andean Pact）为典范。此外，北方国家也应免除南方最穷困国家的债务。

4. 就北方国家而言，政府可鼓励削减工时、减少工作量但领取同样薪酬，甚至考虑禁止超时工作，以制造更多的工作机会供大家分享，从而杜绝青年失业者向新法西斯和仇外（Xenophobia）主义靠拢。

5. 资讯革命本应为人类带来更大的解放，然而事情发展的趋势却令人担心，因为电脑并非替代人类的工作，而是替代人类本身。如何克服这么一种悖论，社青盟认为，所谓「工艺性失业」（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的恒定导因，并不是资讯工艺本身，故谋求打破资讯工艺仅由少数人垄断的框框，才是根本解决问题之道。社青盟认为，政府有义务为学生提供直到大专的基础教育（包括电脑教育），同时将电脑课程列为员工再培训计划的核心内容。目的是为了使到人人都能在资讯革命中受惠，除了可减少「死劳动」，也能腾出更多的工余时间供消闲和娱乐之用，以避免下一世纪的人类成为冷漠、自闭及不善和群体交往的「玻璃人」（资本主义异化人性的新形式）。

6. 基于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是来自环境领域，故「绿色工作」（Green Job）对人们和社会而言，都是极其重要的。社青盟不能接受从纯为牟利的角度来对待环境问题，但完全停止发展也和左翼的「进步观」相悖。我们呼吁和绿党在共同纲领上缔结「红绿联盟」，一道为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而奋斗。

此外，社青盟也呼吁各个国家都必须制定自己的环保政策，同时北方国家也有义务将新科技转移给南方国家分享。

7. 女性应该从传统的、无报酬的「再生产性」（Reproductive）的家务中解放出来。社青盟确认女性在劳动市场中，经常是遭到剥削和压逼的最大受害者。诸如性骚扰、低薪酬、仅受雇为兼职劳工（意味着她丧失参加工会和进行罢工的权利，同时也没有退休福利）以及裁员时成为首要对象等，都是女性就业时所遭受的歧视。社青盟由此认为，国家必须为职业妇女提供更多、更完善的托儿所设施、为女性优先提供再教育和职业培训课程以及严厉惩罚对女员工进行性骚扰的雇主。此外，对那些自愿从事性服务行业的女性，政府应通过「娼妓合法化」来保障她们的权利，从医疗、税制、保安、教育等方面着手，避免她们受到「中间集团」的剥削。

8. 雇佣和剥削童工，依然是本世纪末资本主义在南方国家进行资本原始积累最野蛮的一面。社青盟呼吁每一个国家都要立法严禁雇佣童工，同时要为学龄儿童提供义务的基础教育。另一方面，工会和非官方组织也要加强对跨国公司剥削童工的监督，并且要认识到剥削形式的多样化，最典型的是「血汗店铺」（Sweat shops）以及雏妓（包括儿童春宫写真）两种形式。

年轻领袖应开展理论研究的风气

社青盟在第二天的大会议程里，特安排了一场专门讨论改革社会党国际的论坛。报告人莱蒙表示目前的社会党国际，在理论的研发和创新方面远比不上右翼理论家，后者在东欧剧变后，推出一浪又一浪的理（輿）论攻势，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以及最近刚逝世的以撒·柏林生前的访谈录等，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攻歼和诬蔑，事实上都是建立在简单化和混淆概念的基础上。

右翼理论家的问题预设，都安排了埋伏左翼的陷阱，如对苏俄模式（马列主义）的失败扩大成是所有社会主义流派的破产；利用文明冲突来取代阶级矛盾；将美式自由民主说成是人类的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把社会福利说成是衍生懒汉的机制；把社群主义描黑成是集权主义的新变种以及把市场经济吹捧成是解决人类社会一切问题的万灵丹等等。

右翼理论的说词在年轻一代是十分受落的，而社会民主主义所鼓吹的「团结互助」（Solidarity）日益对年轻人没有吸引力。极端个人主义、虚无主义、利己主义大大抵消了左翼的集体主义观。此外，现代主义的进步观在目前的后现代土壤中也很难生根发芽。

有鉴于此，另一位报告人艾尔福特呼吁社青盟要积极从事理论研究，同时也要在党内的青年社群当中尽量开展政治讨论。他举例说，当年社会党国际的主要领导人如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所提出的「新东方政策」（Ostpolitik）、欧罗夫·帕尔梅（Olof Palme）所倡议的「共同安全」（Common Security）以及英瓦尔·卡尔松（Ingvar Carlsson）所弘扬的「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等，都突显了社会民主党人理论的前瞻性，这些理论皆主导了世界历史潮流的发展。

事实上，没有多少国人知道，大马首相马哈迪医生近来所频频鼓吹对货币交易进行管制的观点，也是来自北欧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当后期梭罗斯发表和马哈迪一致的观点时，本地传媒把它形

容为是马哈迪的首创见解终于获得了梭罗斯的认同。然而，若我们翻阅近年来社会党国际所发行的机关刊物《社会党事务》（Socialist Affairs）以及各种通讯，我们将不难发现，在1996年9月社会党国际第20届代表大会所接纳的《世界经济》宣言，经已志明：「一个稳定且控制国际金融流动的框架，能使国际市场的运作更具透明度，同时避免民选政府有欠稳定的经济政策。认真看待纯粹狙击外国汇率的交易，并制定一项交易税。由诺贝尔奖得主詹姆士·托宾（James Tobin）所提倡的有关税制，应该包含在所有的主要市场。」

再者，社青盟在96年7月于德国波昂所议决的《团结互助的力量》宣言，亦有志明：「我们要和豪赌般的投机资本主义，以及各个最主要的货币之间进行恒久狙击的活动作斗争。由此，我们要求设立一项固定交易汇率框架的新制度，抑或通过如托宾税来对付投机活动。」

笔者有理由相信，社会党国际和社青盟的议决案对首相是有一定程度的借鉴意义。事实若非真的如此，至少也能证明管制货币投机的构思并非由马哈迪所首创。顺道再提一个例子，马哈迪在呼吁国人樽节开支时，曾引用法国总理佐斯潘（社会党人）乘坐小车为例。可见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和作风，的确对我国领导人产生若干影响。

选出首位女秘书长

社青盟走过了20世纪的90个年头，打从1907年8月24日成

立开始，社青盟在大多数的国际问题上皆采取进步的立场，对资本主义持强烈批判态度，宣布忠实于国际团结互助的原则。在庆祝新世纪临近前的 90 周年纪念日，最令人感到欣慰的莫过于选出了社青盟历史上的第一位女秘书长，即来自瑞典社会民主党青年团（SSU）的丽莎·碧菱（Lisa Pelling），主席则由来自意大利左翼民主党的昂布里多·金泰鲁尼（Umberto Gentiloni）。

随着时空的变迁，社青盟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都务求从实际出发，「我们拒绝成为旧观念与旧理论的奴隶，不论有关束缚是来自占宰制、强有力的特权阶级抑或源于我们自己运动的历史」；「我们是全新的社会主义者，因为我们不再是生活在第一、第二或第三世界的年轻人，我们是在全球化底下同一个世界成长的第一代人」。

11 月 16 日的闭幕仪式，是由社会党国际秘书长路易斯·阿亚拉（Luis Ayala）主持。在互赠红玫瑰和高唱国际歌那种既温馨又激昂的氛围下，各国兄弟党代表在离别前，誓言将秉承国际团结互助的精神，把改造「全球资本主义化」的不合理结构，列为青年社会民主党人在 21 世纪的共同抱负。

论安华的 「中间道路」与社会民主主义 「中间道路」的异同

「中间道路」（The Middle Road）或曰「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Road）自十九世纪以降，一直都是欧洲社会民主党为区别自己的理论与实践和共产主义及资本主义有所不同的划界术语。

就以英国新工党为例，该党在去年五月选举成功上台执政后，就公开宣称要实践「第三条道路」，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在第三届欧洲社会党大会上表示：「我们党的任务并非进行旧的斗争，而是要彰显『第三条道路』，它是一个开放、具竞争性与成功的经济，再接合一个公正与人道主义的社会。」

至于「中间道路」，则是在六十年代抄，由瑞典著名经济学家阿德勒·卡尔松（A. Carlsson）在构建其「职能社会主义」时所总结出来的典范用词。

一般来说，具有普通政治常识的人，都能轻易理解所谓的「中间道路」或「第三条道路」是指既不支持右（资本主义），也不认同左（共产主义）的一种政治思潮。但是，基于冷战思维作祟，奉行这支理念的温和进步力量，习惯被人讥讽为修正主义与投

降派，例如大马的民主行动党早年曾被极左阵营责为议会迷和机会主义，而来自右翼的批评，形象地表现在巫统领导人这么一句话：

「DAP 即是 Duduk Atas Pagar!」

非黑即白、非左即右的二分法，是典型教条主义前科学、准宗教式的认识方法论。在后冷战时代存在于现象界的大量灰色地带，上述僵化的认识论已无法胜任，若再不来个「范式转移」，恐怕只会加重宗派主义的偏见，无助于进步力量的整合。

由此，如何正确地认识与把握由我国副首相安华在其著作《亚洲的复兴》（The Asian Renaissance）一书中所倡议的「中间道路」、并将之和社会民主党人的「中间道路」或曰「第三条道路」相比较，是一种有利于涤荡旧思维、调整新步伐的尝试。

安华在该书的《伦理与经济》篇章里，从回教教义出发，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中间道路」理念。他说：「无论是盲目相信市场导向的解决之道，抑或虔诚地信仰政府作为生产与分配物资的唯一裁决者，双方的态度皆受难于天真地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处理。」

为了要调和市场与人道之间的二律背反，安华主张要走出一条「中间道路」，有关概念源自于伊斯兰教的 Awsatuha、孔子的「中庸」或阿里斯多德的「折衷办法」。

如果把安华的「中间道路」纯粹按林良实所挂在口头般的「中庸」来理解，无疑是将安华的学养与内涵庸俗化。事实上，安华的「中间道路」是从正反两面地剖析马克思主义与批判资本主义反革命的弊端中所提炼出来的总结方案。

马克思主义的失败

安华以《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为独立一节，专门分析该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分裂，兹归纳为以下数点：

- (1) 马克思主义对人的理解有所瑕疵，它把人当成是宿命的，「是一架称作国家的野蛮机器中的一个暗码与齿轮」，「不存在任何的伦理、道德与属灵的空间」；
- (2) 奉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其经济本质是如兵营般命令式的，生产怎么以及何人获分配些怎么都由权力官僚（Nomenklatura）来决定，而非为满足人民的需要；
- (3) 马克思主义在结合了第三世界的特征所演化出来的模式，如由坦桑尼亚的尼雷尔（Nyerere）所鼓吹的「乌贾马」（Ujama）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只是一种强制集体化的委婉说词，一种精心构思且伪装虔诚的集体主义哲学」；
- (4) 总结发展中国的经验，「社会主义与国家的成功之间的关系是相悖的，社会主义直接为人民带来贫困」；
- (5) 发达国家的左翼，利用罗马俱乐部所发表的《增长的局限》来作为反对经济增长运动的水量标。有关报告书的内容对西方工业国来说无疑是有利的，但对第三世界而言则意义不大，因为许多贫穷国家甚至经济增长不足且发展停滞。

安华由此总结出两大教训：「第一，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与善良愿望是不足以达到崇高伟大的目标，我们应该十分清楚有关达至我们所宣示目标的手段，我们不应该以真实的、但不完美的东西去交换那些看来是完美、但切会转换成幻象的东西。第二，我们将通

过时间的发展，领会到没有任何建基于暴力的集体，能期望逃脱一个同等暴力的对抗。」

综观以上所述，安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囿于以「苏联模式」为典范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故不能将安华的批判泛化到所有非共左翼的阵营。社会民主党人承认，并一早作出预见，苏维埃的七十年实践加上亚非拉许多后殖民国家的社会主义治国历程，足以说明了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经已严重怪离了原先马克思学说里头的核心价值——「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回顾历史，当年列宁（Lenin）与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围绕着「民主集中制」所展开的争论，不仅可用作解读斯大林、布尔波特与齐奥赛斯库等人的集权暴政，甚至迄今对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改革，尚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康德的实践命令：人是目的

事实上，康德（Kant）早在马克思已前就提出人是自在目的的「实践命令」：人以及一切有理性者是作为自在目的而存在着，而不是只供这个或者那个意志任意利用的工具，在人的一切涉及他自身和其他有理性者的行为中，人永远应该被看作是目的。

社会民主主义的人学观与伦理观，继承了康德的上述灵魂，没有把社会主义当成科学（主要是经济结构的改变）来看待，而是视为道德与伦理问题。换言之，我们把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割裂开来，再结合伦理学，并主张非共左翼要超越马克思的坟墓，「回到康德去！」

由此可见，社会民主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更准确的是马列主义）的批判与安华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我们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度里，实际上是通过国家机器与文化霸权建立起一个新型的特权阶级社会。由铁幕政权所挣得的民主，甚至比资产阶级的法权（Bourgeois Rights）还要不足。社会主义的民主价值非但没有落实，自由与平等亦同样窒息。这么一来，人民的创造力与能动性受到束缚，生产力自然无法拓展，再加上失去监督与制衡，特权阶级滥权腐化，国家经济怎能不处于崩溃的边缘。这一切的实践正正与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相差十万八千里。

然而，在批判共产主义的弊端之余，社会民主党人的「中间道路」与安华所倡议者也存在若干差别，主要有两大分歧：

(1) 普世的人权观推进全球社会民主党人争取人权与落实民主的步伐，在这个关键点上，亚洲价值观捍卫者和共产主义者却无法与社会民主党人分享同养的价值标准。他们不仅把人权与「人权外交」等同起来，甚至把人权的各个介面（如政治、公民、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加以割裂开来，通过摒弃一个介面来换取对另一个介面的坚持，这种孤立地所谓「检讨」人权宣言的做法，是无法令社会民主党人苟同的。

另一方面，我们与自由民主党人（Liberal Democrat）的人权观又有所不同，我们反对「人权外交」，并认为人权概念是由三大基石所组成，即宽容的自由权利、民主的参与权利和社会的保障权利，三者互为条件又互相补充，只有如此，人权概念的推进与落实才算是全面的（Comprehensive）、真诚的（Genuine）。

(2) 社会民主不像安华那样全盘否定暴力，但这又不意味我们赞同走暴力革命路线。我们主张循议会民主途径来逐步、渐进地改良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结构，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故我们谴责那些通过搞恐怖主义活动来威胁和平、妄顾民主的「急过渡」手法，因为暴力行动妨碍着而不是有利于问题的民主解决。

但是，社会民主党人会以下四种情况所展开的武装斗争施于同情、谅解和声援：

(a) 广大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完全没有获得保证；

(b) 政府不为人民提供合法斗争的权利并用暴力镇压一切合法的反对力量；

(c) 当权者治国无能，不仅无法缓解尖锐的社会矛盾，更助长矛盾的激化；

(d) 外国势力的入侵与干预，侵犯一个国家的主权或践踏一个民族的尊严。

诚如瑞典前首相帕尔梅 (Olof Palme) 所曰：「拿起武器并不是为了斗争，而是因为人们想要创造建设的先决条件，因为革命后开始的是正常的工作」。

需要补充的是，若基本政治条件（虽然未必完善）尚能允许合法、和平的改良运动之生存与发展，就不应存在任何借口来合理化盲动的暴力行为。马克思早在 1872 年就讲过：「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反革命

安华特以一节《反革命》(The Counter Revolution) 来阐述他对极端资本主义的唾弃，他说：「当明显地经济管理重返市场这么一个积极面之际，资本家的反革命却在危险地回旋到另一个极端」。资本家过渡的推崇市场的理性，取消政府（代表国家）干预的「那一只手」；为了强调经济效率，不惜牺牲社会公正的做法，安华都不表赞同。他认为这一却将导致「社会议程如贫困阶层的住房、保健以及经济机会的公正分配等问题被边缘化。」

以此同时，安华亦表示「不受拘束的增长目前已被奉为经济政策的魔杖」，通过「增长所创造的财富，能消灭贫穷，改善生活条件与拓展选择度」。安华在积极肯定了上述的说法（引用东亚在 70 与 80 年代的发展例子）之余，尚敢于正视各种在发展名义下所依旧存在的各种形式之剥削。「在东亚，1990 年有接近 17 亿的人口还生活在贫穷线底下，同时超过 10 亿名男女学童被迫在中学阶段辍学。在亚太区域，超过三份之一的五岁以下的孩童营养不良。此外，接近一百万名东亚小童在五岁前即告夭折。」

尤有甚者，安华也对「在适当时间，增长能消除有关弊端」的说法存疑，因为「这可能是一个妄想，要不然发达国家早就脱离贫穷问题了。直到今天，在发达国家中，超过 10 亿人口依然生活在贫穷线下，同时还有超过五百万人口无家可归。」

安华的「中间道路」

在剖析马克思主义失败的根源以及批判盲目推崇毫无节制的

资本主义反革命之后，安华遂在极左与极右的两极当中为自己的「中间道路」定位。他说：「从过去东亚 30 年的经济表现可总结出教训，即‘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必须合作无间，最迫切的是在市场力量与良性的干预之间求得平衡。」

安华按回教教义的理解，表示「穆斯林的思维被培育成是亲和市场的」；同时也说「回教文明铭刻于遍布商业精神的兴旺市场之中。」

虽然如此，安华亦强调回教社会在过去经已认识到要引入一个称之为 hisba 的机制来监督市场活动的公平性，以反对垄断与操纵。「可兰经谴责在特权阶级当中累积财富」，「『财富不应在一小撮人当中流通』为穆斯林的观念提供了一个均衡感，以及奠下财富公正分配原则的基础。」

「这些教义协助培植了社会福利机构的成长，以便在艰难时刻相互援助以及为那些贫困者、需要帮助的人、孤儿和寡妇提供保障。」

安华在文中举出 Zakat 和 Waaf 两种福利机构为例，前者是一种从收入、财产、农业与经贸中所奉献出来的税务，用以分配给那些需要救济的回教弟兄；后者则为一种慈善基金会，用以增设医院、大学公共设施并且资助学术活动。

安华所勾勒的「中间道路」，「其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而社会民主的终极目标也是为了要解放人，让人能全面地获得发展，从而摆脱资本主义的「异化」(Alienation)¹。

在处理市场与人的关系之问题上，社会民主党人向来就强调「市场应该是为人服务而非反之」(John Smith 语)。职是之

故，我们主张「尽一切可能开展竞争，按一切需要实行计划。」

我们认为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有赖于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不断的创新性。它们只有在竞争和多元主义的环境下才能得到自由发展，而市场作为调节无限多样的经济政策、供给关系、价格规律与竞争能力等的杠杆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故此，在经济领域，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是高效率 and 零活性的必要前提，它可保证社会生产能较好地满足人民的不同需要，以避免物资匮乏、调节不当、产销脱节、供给失调等不良后果。

社会民主党人在肯定市场的重要作用后，也认识到市场自身存在着若干的局限性与负面影响。

比如市场一旦不受限制或监督就会步向垄断，取消竞争。再者，市场经济本身不能保证收入和财产的公正分配，同时许多社会需求（如公民培训、环境保护、社会保障、艺文休闲、社会质量等的改善与提升），市场是无法显现出来的，因此如果政府不加以干预，市场也就无法在上述各个领域合理且及时地配置资源。

社会民主党政府所贯彻的「中间道路」，就是虽放弃国有化，但却积极对市场进行合理的干预和调控。通过立法，推进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一般统称市场社会主义或混合经济，其中尤以瑞典模式的「中间道路」所取得的成效最为显著。

瑞典模式的中间道路

何谓瑞典模式的「中间道路」？据阿德勒·卡尔松的解释，主要特征如下：

(一) 权力均衡：在瑞典，人们有意识地保持着一种尽可能均衡的权力对比关系，一方面存在着像瓦伦堡家族为首的少数工业巨子（他们控制着工业的主要命脉）；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政府有强大、团结的工会力量作后盾，加上长期执政，抗争持续，效果显赫，遂形成了「历史性妥协」。

(二) 不以暴力解决问题：瑞典社会民主党建党初年即强调要靠选票（Ballot）而非子弹（bullet）来解决劳资纠纷。工人阶级参加选举是建基于这么一个信念基础上：民主不仅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充分条件。

(三) 对市场和干预持实用主义态度：在经济领域，社会民主党认为必须创造一种把工人利益与资本家利益协调起来的合作气氛，使工人愿意合作、储蓄，而资本家愿意投资、生产。换句话说，让资本家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推动生产的发展，而工会通过政府维持了收入的公正分配，从而比较好地协调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的矛盾。

此外，政府也务求在混合经济的框架内，从税务、劳工、保健、福利等方面以立法手段来捍卫人们的利益，打破少数人对经济权力的垄断，强化工人代表参与微观经济决策的谈判力量，动员公民社会对宏观经济决策的影响。另一方面，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日益拓宽，希望在缩小各类不平等的基础上维护所有社会成员的自由和尊严。

社会民主党人实施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保障，在量与质方面可谓远远超越美国的福利制度，大马在这方面的表现更是望尘莫及。但愿日后安华的「中间道路」能秉持回教的 Zakat 精神，在

借鉴北欧的合理经验（避免福利国的刚性包袱），为我国的老幼病残提供更好的照顾。

小结：慎防滑向「民粹主义」

安华与社会民主主义的「中间道路」，在宏观认知方面存在着许多原则上的一致性。双方在对市场的积极肯定之余，不忘重视对人的全面发展。另，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当儿，没有忽略社会公正。这些共同点无疑可拉近行动党未来与执政党在有利于全民利益的课题上合作的距离。

话虽如此，安华的「中间道路」能否将其道德内涵透过立法途径落实在日常的公共政策上，是十分值得我们深思的。尤令我存疑的是，当前我国的政经结构（党国资本主义）与上层建筑（威权型的亚洲价值观），能否与安华的「中间道路」有机地相互配套运行。

我衷心祝福安华能顺利接棒，从而将其「中间道路」由理念转化为现实，并日趋丰富和完善化。否则，无法实践或不愿实践的道德伦理，恐怕只回滑向民粹主义（Populism）的方向，我想这也是绝大多数国人所不愿看到的结局。

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 如何理解「人的本质」

丘光耀

前言

所谓「人的本质」，即是人与动物相互区别的最根本之划界标准，亦是人之为人的最根本属性。

如何看待和区别人的本质问题，不仅不同的哲学流派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左翼阵营里的两大支柱，即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都无法维持一致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本是同一渊源的欧洲工人运动思潮。两者在尚未分道扬镳前统称社会民主主义，后来因为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以及对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过渡手法，在认知上存在极大的分歧，遂在政治实践上越走越远。这是一般比较研究两支左翼队伍的分歧所得出的主要结论。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分歧，其中最大的源头，也是出自于对「人的本质」的不同理解。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论述，迄今还不甚常见。

一百年后的今天，再重新探究和考析这么一个老问题，许多因实践而导致理论上的修正和发展，都应验了【德】维利·勃兰特

(Willy Brandt) 的一句话：「我们应当放弃追求一种真理，而应当学会跟若干真理共存。」

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是建立在继承和扬弃唯心主义（黑格尔）和旧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的基础上。前者认为人是一种精神的存在，主张把人的自我意识和理性当作是人和动物相区别的主要特征。^① 旧唯物主义则用自然主义的视角来观察人，过于突出人的生物特征而无视人的社会实践性。^② 马克思认为他们的根本错误在于把人的本质抽象化，并归结为精神的东西。

马克思以前的许多哲学家往往把人性中的某一特征（如理性、自我意识、道德等）当作人的本质。马克思本人在德文的原著中对有关概念的表述是有所区分的。人性一词为 Die- Humanitat，而人的本质则是 Das Wesenbes Menschens 一词。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使自己 and 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并非在于他们有思想、意识或宗教，而是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所必须的生活资料，即劳动实践。「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③ 由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第一位原因，也就是人的本质。

按马克思个人的论述，动物的生命是本能的活动，而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活动。何谓「有意识的活动」？马克思指的是：改

造自然界、实际创造对象世界的劳动。

但是，人的劳动不是在真空的状态下进行的。换言之，人的劳动离不开社会，只有借助他人的劳动成果，在和其他人直接或间接的交往和协作中，即在各种社会关系当中，劳动才能进行。

马克思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所以马克思得出的结论是：「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

有鉴于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和社会性是不可分离的，人的社会性从劳动中产生，而人也只有在社会中才能进行劳动。劳动和社会性，两者互为条件，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

马克思在这个环节的认识，对费尔巴哈是持批判态度的。「费尔巴哈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一孤立的一人类个体」，「所以，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④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个体固然可以构成一个「类」，即人类，但是人这个「类」和其他事物的「类」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类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这表示每一个个体的人，一旦抽离了社会关系，他（她）便不能生产劳动，不能生存。

那什么又是社会关系呢？马克思说基本的和首要的社会关系，就是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还有政治、法律、伦理、宗教、哲学、思想等关系。只有在这种诸多关系网中的人，才是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的人，现实的人和历史的人。

马克思这么概括道：「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当然，马克思的论述并没有在此就打住。他认为人不是消极、被动地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而是人不断地变革和创造着自己的社会关系。当人在认识、改造着自然界和社会关系的同时，也改造、创造和认识着自己本身（肉体组织、心理状态和思维解构）。换句话说，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

人既然通过劳动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人化的自然环境，同时也为自己造就了人所持有的自然属性。另一方面，人通过劳动实践和交往活动创造了一个社会关系系统，当然也就为自己造就了人所持有的社会属性。社会属性制约着人的自然属性，并在其中打上了社会的烙印，促使人的生物组织越来越适合社会生活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没有把社会关系夸大成消融人类自然属性的盐酸池。人在形成社会存在物（Social being）之后，其自然属性并没有消散，它仍然伴随着人的发展过程，以感性、生命冲动、前意识等形态和人的社会属性维持一定的平衡及张力，相互制约，相互补充。

由此，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社会性是包含着人的生物属性的社会性。人是生物遗传和社会遗传、自然演进序列和社会演进序列的统一体。换言之，人的本质是通过劳动，将「自然的人」和「社会的人」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包含者多种要素（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和多重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意识的关系）的系统质。

人的本质和共产主义革命的联系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目的是，在于为达到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的目的提供理论依据。

马克思在早年的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经已揭示了「劳动者及其产品的异化」这一基本的社会经济现象。虽然在后人的研究中指出，马克思这部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尚受到旧哲学的束缚，在出发点、研究方法和理论前提上还带有浓厚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色彩和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旧痕迹。^⑤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导致劳动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成为奴役劳动者的异己力量。劳动对劳动者而言，是一种被迫的强制劳动，因此，作为人的本质，即劳动，经已变成了「外在的东西」；「不属于工人本身的东西」；「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⑥

「异化」(Alienation)或「生产性的否定」(Negation of Productivity)就是马克思用以概括上述现象的哲学/经济学术语。

为了要彻底克服剥削和异化劳动(人的本质的异化)，马克思主张消灭私有制，因为在他看来，私有制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出发的，它是在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揭示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占有关系。

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

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人复归。」^⑦

所以，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新社会，人性才能获得解放。马克思所勾勒出来的大同世界，是一个自由个人的联合体，每一个个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将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取得和谐一致。

至于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手段，秉承晚年马克思主义(或称成熟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和青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很大的出入。需要强调的是，《资本论》虽是晚年马克思的理论精华，但它和马克思本人在青年时期所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也明显有所不同。

在以苏俄模式为实践典范的共产党人，片面地、无限扩大地发展晚年马克思有关「对剥夺者的剥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导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精神受到践踏和遗弃，并在此节骨眼上和民主社会主义者发生严重的原则分歧和理论冲突。

民主社会主义 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属点——人

民主社会主义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主要取源于新康德主义，并引用青年马克思主义作为补充。

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主要理论家柯亨·赫尔曼(Cohen Hermann)发展了康德的绝对命令学说(Categorical imperative)和「人是自在目的论」，提出了伦理社会主义，和晚年马克思主义关

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相对立。

所谓绝对命令，康德的表述是这样的：「始终要按照那样一个准则去行动，你可以希望这个准则的普遍性同时也是规律的普遍性，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意志才会永远不自相矛盾，而这个命令是绝对的。」^⑧

康德把这种纯形式的绝对命令，运用到具体的生活事件之中，提出了人是自在目的的「实践命令」：「人以及一切有理性者是作为自在目的而存在着，而不是只供这个或那个意志任意利用的工具，在人的一切涉及他自身和其他有理性者的行为中，人永远应该被看作是目的。」「因此，实践命令是这样的：你应当这样行动，做到你始终把你自己或其他人当作目的，而不是当作手段来使用。」^⑨

科亨在1904年所出版的《纯粹意志的伦理学》中指出，观察社会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建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另一种是从法权角度出发，建基于伦理学的社会主义理论。

科亨认为马克思的全部著作尽管贯彻着强烈的道德激情，但是他却不承认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伦理原则。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在科亨看来，是因为作者生活在经济动荡的时代，而过度重视「肚子问题」。科亨认为社会主义问题首先不是经济问题，而是道德、伦理和精神生活的问题。「作为观念的上帝，应当是社会主义的最高概念」，由此，科亨推导出这么一种见解：为了实现社会主义，首先需要的不是改造经济，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而是改造法权，实现伦理的社会

主义原则。^⑩

综观以上所述，民主社会主义的伦理主义渊源，造就了它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人的本质在于人享有自尊、自主和自由。这是人区别于动物，人作为人的本质要求。

社会民主党人「共同把人理解为自然的、个人的和社会的存在。他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只能在自然界中并且同自然界一起生存。他作为社会的存在只能和自己周围的人一起才能发展自己的个性、唯一性和独特性。」^⑪

可见民主社会主义对人的理解，还是置于自然、社会和个人三重关系的脉络之中来加以界定的。它承认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只不过民主社会主义所理解的「社会」和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社会」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是规定人的本质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各种社会关系，而民主社会主义则将「社会」视为与个体性相对立的群体性。

民主社会主义不承认劳动是造就人的本质的中介，反而大肆突出人的本性的自然意义和天赋意义，体现为一种抽象的人本主义和唯主体论哲学。

基于这种人本观，民主社会主义「将人置于整个社会发展的中心」，强调应把人看成是目的，而非手段或工具。在民主社会主义看来，评价社会制度的根本标准，既不在于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程度，更不在于是否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在于人的自尊，即自主和自由本性的解放和实现程度，「其目标是使人的个性在共同生活中得到自由发展。」^⑫

由此，民主社会主义一方面批判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亦反对共产主义，因为这两种制度都是把人当作手段来使用。

民主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虽然自19世纪以来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但其代价是排除了绝大多数公民对生产的影响，它把所有权置于人权之上，制造了一个没有财产和社会权利的新贫穷阶级，标志着社会财富和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引起群众生活的不安定、周期性的恐慌、大量的破产和失业问题，雇佣劳动者成为资本家用来牟利（通过剥削）的工具。

再者，以无限追求利润和效率至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对物质成就和物欲消费的盲目崇拜，遂给人带来精神上巨大压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纯粹以利益为纽带，导致人际关系的物化和疏离。

所以民主社会主义声称，社会主义是对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贬低人格的一种道德抗议。它宣告人是具有尊严的；每一个人，无论男女都有权享有平等机会，以及精神、智力、政治和经济的自由，并有权对影响工作和生活的决定行使其责任。

对共产主义而言，民主社会主义也是持否定态度的。它认为共产主义妄称继承了社会主义的传统，但事实上是歪曲了这个传统，使它面目全非。

「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实际上是暴政的体现，是否定民主社会的精髓，即言论、宗教、批评、自愿结社和同外部世界接触的自由。共产党国家尽管用最强烈的语言反对殖民主义，但它们自己却奴役着成千上万的人民；对共产党人来说，只要目的是对的，就可以不择手段，在他们的言行之间永远存在着矛盾。」^⑬

斯大林模式的共产主义社会，确实戕害人性、扭曲人格、违

逆人道。人不再是具有独立尊严、自我目的、自发意识的创造性主体，而只是被动的材料和客体。

民主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就是在抗衡共产主义和批判资本主义的脉络中所展开的。

尤有甚者，青年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也成为民主社会主义借鉴并加以补充发挥的活水源头。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大约一个世纪后的1932年才首次发表，引起非共左翼极大的瞩目和回响。「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家纷纷从这部著作中，发掘出晚年马克思主义所「绝迹」已久的人本主义道统。

在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前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朗兹胡特和迈耶尔，比利时社会党人亨利·曼德，后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佛洛姆（Fromm），他也是美国社会党——社会民主联盟全国委员会委员。

佛洛姆在60年代出版的《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特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收录在内。佛洛姆并非针对该手稿本身进行阐释和引申，而是正本清源地就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三个方面的人本主义的诠释。

第一是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佛洛姆说是源于西方人道主义的哲学传统；是人类的尊严和友爱的传统，「这个传统的本质就是对人的关怀，对人的潜在才能得到实现的关怀。」

第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目标。按佛洛姆的理解，马克思的目标是使人在精神上得到解放，使人摆脱经济决定论的枷锁，使人的完整的人性得到恢复，以便能够成为具有充分人性的

人；马克思主要关心的事情是使人作为个人得到解放，克服异化，恢复人使他自己与别人以及自然界密切联系的动力。^④

第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佛洛姆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代表一种抗议，抗议人的异化；抗议人失去他自身，抗议人变为物。显然，「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创造出一种生产的形式和社会的组织，在这种形式和组织中，人能从他的生产中，从他的劳动中，从他的伙伴中，从他自身和从自然中，克服异化；在这种形式和组织中，人能复归他自身并以他自己的力量掌握世界，从而跟世界相统一。」

身为美国社会党的佛洛姆，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关人道主义的理解和诠释，和欧洲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的纲领十分相似，特别是他在1960年发表于美国《社会主义呼声》杂志的《让人成为主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宣言和纲领》，更是为缔建美国社会民主模式的一面旗帜。

小结

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对人的本质的理解，虽然在「社会观」方面有所出入，但两者对人性、人道主义的考察，都是建基于「集体」的脉络中。他们虽一致否定人是一个能抽离社会并独立存在的个体，但在对人的权利方面所赋予的定义却又存有歧义。虽然如此，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均认为资本主义的整个运作结构，都是扭曲和异化人性的，但基于他们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有异，导致他们对复归和解放人的方法南辕北辙。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会

选择暴力革命来推翻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会推崇和平议会道路来改造资本主义，都是源自于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使然。

注释：

- ① 黑格尔表示：「人的规定是思维的理性：一般思维是他的单纯规定性，他由于这种规定性而与兽类有区别。」转引自：《逻辑学》〔中〕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18页。
- ② 费尔巴哈主张「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来代替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他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肯定世界的可知性，认为思维和存在统一于实在的人，并把自己的哲学称为「人本学」，其任务是使被宗教和思辨哲学歪曲的人的本质还原，「对人来说，人就是上帝」；认为「类」意识（理性和爱）是人区别动物的主要特征。
-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8页。
-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 ⑤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是一部过渡性和二重性的著作，所以它问世后众说纷纭，成为当代左翼理论界斗争的一个焦点。评者或褒或贬，评价大体有三：（一）非共左派认为它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顶峰，是体现马克思原本学说的人道主义面貌；（二）苏俄共产党人认为它是不成熟的非马克思主义作品；独立左翼人士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著作，是哲学中革命变革的起源。
-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4页。
-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
- ⑧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商务印书馆，第51页。
- ⑨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商务印书馆，第42-43页。

- ⑩ 徐崇温：《民主社会主义评析》，【中】重庆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52 页。
- ⑪ 德国社会民主党 1986 年新党纲草案，转引自《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文献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67 - 368 页。
- ⑫ 《社会党国际文件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27 页。
- ⑬ 1962 年社会党国际理事会在奥斯陆会议所发表的《社会党对今日世界的看法》，转引自李永清：《当代民主社会主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0 页。
- ⑭ 佛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中译版）【香港】旭日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8 - 9 页。（作者为留华历史学硕士，现任共青团政治教育局主任）

本文曾刊载于《资料与研究》第 35 期。

社会主义 应用「伦理」来坚持

自 19 世纪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以批判、扬弃与超越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的社会主义运动，发端于欧洲，并陆续转播到世界各个角落。

1917 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Bolshevik）十月革命，成功推翻了俄国沙皇封建政权，遂在人类历史上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列宁与随后的史大林，把苏维埃（Soviet）式的社会主义，从其理论到实践的「飞跃」，视为是符合历史必然性的产物，认为社会主义成功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进而推导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这么一个命题。

以上两句左派的命题，一方面除了用作激励工人起来斗争，乐观地等待胜利的必然到来；另一方面亦用于诅咒资本家和反动派，指他们的反扑和挣扎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历史注定他们必然会灭亡！

这就是所谓「科学社会主义」（Scientific Socialism）的「科学」所在。相对于「空想社会主义」（Utopia Socialism）一如早期的欧文、圣西门和傅立叶——而言，「科学」的社会主义，意即马

克思和恩格斯能通过精确的「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来论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非只是诉诸于知识份子或劳动阶级的道德和伦理意志，来推翻资本主义。

吊诡的是，若依据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他们原著中的论述，列宁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根本不可能在一片封建的欧亚大陆——俄国取得成功；同时革命也不可能得以在单一国家里获得胜利。

列宁上台后的理论研究工作，不断力求论证「一国胜利论」的科学性和必然性，以求合理化苏俄这块「红色孤岛」的存在，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后的具体成果。

在同一时期，选择以投票（Ballot）而非子弹（Bullet）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工党、社会党以及社会民主党人，在对于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方面，和列宁为主的共产党人分道扬镳。其中最大的分歧之一，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伦理的要求，而非历史的必然。

社会民主主义反对共产党人的暴力革命论、阶级斗争论、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剥夺剥夺者的做法，故呼吁工人运动要「跨越马克思的坟墓，回到康德去」！

康德的伦理观——「把人当作目的」的「实践命令」——成为社会民主党人社会主义斗争的理论内核。「实践命令」认为：「人以及一切有理性者是作为自在目的而存在着，而不是只供这个或那个意志任意利用的工具，在人的一切涉及他自身和其他有理性者的行为中，人应该永远被看作是目的」，「因此，实践命令是这样的：你应当这样行动，做到你始终把你自己或其他人当作目的，

而不是只当作手段来使用。」

康德的真知灼见，可以从史大林的「清洗」和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获得印证。通过专政和暴力来维持的政权，不论其弘扬的理想是多么的伟大和高超，但在日常实践上却被异化成践踏人权、摧毁民主、约束自由和扭曲人性的非人道统治。

再者，苏联和东欧的变天，不仅无法突显出共产主义的优越性，更无法论证为何共产主义不能战胜所谓「垂死」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为何没有灵验？

当然，资本主义保守派也别高兴得太早，历史尚未终结，君不见社会民主主义在世纪之交的崭新态势，欧洲的左翼回潮，鼓舞了全球中左力量的斗争。

今天，许多社会学专家，经比较研究由社会民主党执政和让右翼保守政权统治的西方国家和社会制度后，都不约而同地表示前者更为民主、人权更受尊重、贫富悬殊较小、生活质量更好、妇女地位更高、环境素质和社会保障更佳等等。

今后社会主义运动的探索和实践，必须先根除「必然胜利」的症候群，避免把所有灾难性的后果，统统都推给资本主义。反之，社会主义要彰显人的主观意志（道德伦理）和能动性，而社会民主主义的伦理观就是建基于我们的基本价值（Fundamental Values），即自由、公正和平等、民主、团结互助与和平。

对「团结互助」理念的再考析

近来因工作上的需要，在行动党总部资料室翻阅了大量的文献档案，其中有不少已是发黄的旧相片。图文并茂，无疑更容易令人进入历史隧道，一幅又一幅的历史画卷，仿佛就重现在我眼前。

其中最令我感到兴趣的是，有不少行动党晚宴的相片，布条上都冠以「团结晚宴」(Solidarity Dinner)的主题词，相信行动党各支部在过去30年以来，都习惯沿用「团结晚宴」一词，作为一年一度筹募活动资金的宴会主题。

然而，为什么要将宴会称为「团结晚宴」？它有无特殊涵义？为何行动党要恢宏「团结」意识？「团结」和行动党斗争的理念有何相连？

相信不只是一般社会人士，甚至是行动党的许多党员，都未必能阐述得清楚。

首先，我们不能狭隘地将「团结」按「分裂」的对立概念来理解，故行动党藉「团结晚宴」所要彰显的意识，并非是要向人民表示行动党领袖没有派系分歧，也不是呼吁持不同意见的党员，应该团结在某领导人之下，更不是号召出席晚宴的人民，要搞什么「华人大团结」云云。

Solidarity 的准确译词

按政治语义学的解释，Solidarity 不应只是直译为「团结」，Bersatu 也不是恰当的国语翻译，中国大陆学界有者将 Solidarity 译

为「团结互助」，有者译为「互助」或「互爱」；台湾的中华社会民主党创建人朱高正博士将之译为「社会连带」，我认为最贴切的国语译词应该是 Bergotong royong，汉语的翻译则以「团结互助」为首选。

事实上，「团结互助」是我们信奉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所推崇的其中一项基本价值。

民主行动党是属于中左意识形态的改良主义政党，我们的斗争是全球社会民主运动的一部分，社会民主主义是全世界百多种社会主义流派当中，势力最为强大的一支。

社会民主主义发端于欧洲工人运动，取源于基督教伦理，并受人道主义的启示。概括来说，我们的斗争是标榜「伦理社会主义」，一方面反对贪婪和剥削的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亦批判共产主义的集权和暴政。

而「团结互助」作为社会民主运动所秉承的四大基本价值之一，最能体现出社会主义的色彩。

回溯工人运动

从历史上来讲，「团结互助」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可回溯到一个世纪以前的工人运动，当时遭受压迫的工人阶级必须要团结起来，互相帮助，才能和资本家抗衡，以争取更平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团结互助」意味着当工会发动罢工时，不应出现某些工人出卖集体利益，返回岗位开工；「团结互助」也表示当另一工会或工厂的工人进行罢工时，其他工人应设法为他们提供后勤援

助，「团结互助」亦体现在当工人阶级的某一家庭成员（如兄长）参加罢工时，其他家庭成员应在物质和精神上给予鼎力支持。

唯有整个阶级团结起来，互相声援，彼此照应，工人运动才能壮大，才能持久，斗争的目标才能成功达致。

新的诠释

当然，今天的客观形势业已改变，「团结互助」不再是单一阶级的价值观。社会民主运动为了顺应历史潮流的新条件、新需求和新挑战，不得不将「团结互助」的内涵加以补充和扩大，如英国工党在其 80 年代通过的纲领中，把「团结互助」解释为强者支持弱者，健康者照顾病人，富裕地区援助贫困地区，男士支持妇女解放，白人支持黑人战胜种族歧视等等。

瑞典社会民主党在 90 年代对「团结互助」所给予的强调，是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守望相助。该党认为，国际之间的「团结互助」是实现世界持久和平的前提，一个一部分人生活奢侈、一部分人生活贫困的世界，抑或一个某些国家或民族压迫另一些国家或民族的世界，将是一个陷于不断冲突的世界，无论对哪一个人自由的威胁，都是对所有人自由的威胁。因此，「团结互助」不能局限在本国界限之内，而必须包括全球所有的人民。

法国社会党和台湾中华社会民主党皆认为「团结互助」不只局限在当代人，同时亦是世代和世代之间的社会连带，下一代人有权要求能影响到他们生活的这一代人和他们团结起来，比如环

保、反核，甚至如大马的华教运动，都高度体现了世代和世代之间的「团结互助」精神。

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

一句话，「团结互助」是一切弱小者（个人、民族或国家）争取正义的斗争武器，也是共同的人性对不公正的受害者寄予同情与提供援助的实际表现。

「团结互助」包罗了一切人道主义传统的主要精髓，弘扬了所有宗教对人类终极宽怀追求的理念。在个人之间和各国之间日益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团结互助」为缔建人类普世的理想世界，其意义也就更为重要了。

简单地说，「团结互助」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它不分民族、没有时空、超越国界。在今天弥漫着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物质社会，若再不恢宏「团结互助」这麽一种健全的新集体主义，人类在下一个世纪的命运，恐怕真的会步向「历史终结」的死胡同！

对劳动节意义的考析

「打工仔最钟意什么色？」（粤语发音）

相信绝大多数工人都会说：「休息！」（粤语发音）

每年的5.1劳动节成了所有工薪阶层最爱的日子，皆因人人都能在这一法定公共假期里尽情休息，不必上班或开工。至于属于左翼大家庭的成员（如共产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以及左倾的职工会等），都不忘通过各种形式来纪念或庆祝劳动节。有者发动万人示威大游行；有者举行学术研讨会或座谈会；有者甚至以更新颖、更平易近人的方法，来吸引年轻人的注意力，如举办聚餐会、舞会、舞台剧和电影欣赏会等等。

一句话，纪念劳动节的活动形式是以各国客观的政治条件和既在的民主氛围为考量。大马的民主行动党和人民党近年来皆以相对温和、活泼的形式来「欢度」劳动节，不像欧美兄弟党那般用较激进和强悍的手段来「怒度」这么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日子。

年轻人没感觉

一般来说，劳动节对于现今年轻一辈的犬马国人而言，再也不存在任何特殊意涵。大家都把5月1日纯粹当作是公共假期，人人都认为在休息日还要出门响应某某团体的号召，去参加什么集会，简直就事非分之求，甚至还有点「违背」劳动节「休息」意义

的味道。

作为信奉社会民主主义的行动党人，尤其是新生代的「新行动党人」，就不应毫不自觉地、浑浑沌沌地渡过劳动节。反之，我们应该在催生「新行动党」的阵痛过程中，以历史主义的角度，正本清源地追溯回我们社会民主党斗争的宏观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翻查国际工运史，我们获悉5月1日之所以会被确认为公共假期，并不是一个简单且理所当然的过程和结果，它是经过工人阶级无数艰辛抗争和奋勇牺牲所换取的胜利果实。

19世纪80年代是美国工运蓬勃发展的高峰期，他们「自为」的阶级意识，已经成熟到把争取改善劳动条件和8小时工作日列为斗争的核心议程。

芝加哥大罢工

1885年，美国劳联大会除了再度宣告要在明年5月1日起实施8小时工作日外，亦号召在同一时候举行全国性大罢工。芝加哥和其他城市的工会结果成功发动一场席卷40万工人参加的大罢工。波浪状观的工潮导致资方和当权者不得不用暴徒和秘密警察来加以镇压，结果9名工人丧生。两天后，芝加哥工会于Haymarket Square发起另一场大型的集会，以示对警方的蛮横镇压还以颜色。然而，示威现场突然发生爆炸，8名警察及4名工人活活被炸死，遂引起警方更强硬的镇压行动，多位工运领袖被逮捕并随后遭到处死。

接下来是政府和资方对工会展开一浪接一浪的渗透和收买行动，工运力量逐渐式微，许多工会纷纷解散，致使争取8小时工作日的

斗争陷于瘫痪。在这麽一个暂时退却的时期，美国劳联会崛起成为整合全体斗争力量的组织，并决定在 1889 年和 1890 年号召继续开展为争取 8 小时工作日的坚韧斗争。

第二国际的议决

与此同时，以欧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为主干所筹组的第二国际（Second International），在巴黎于 1889 年 7 月中旬召开成立大会。会上根据法国工会主义者雷蒙·拉维涅（Lavigne Raymond）的建议，主张在 5 月 1 日放假，目的是为争取 8 小时工作日。结果大会通过了关于「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议决，内容是：自 1890 年 5 月 1 日开始，各国工人在每一年的劳动节，都应该同时组织现存法律允许下的示威游行，并对政府当局提出要求——确立 8 小时工作日。

1890 年 5 月 1 日，各国政府都严密布署，以全副武装等候工人上街游行。然而，各国工人还是义无反顾、浩浩荡荡地出发，无情的制裁与疯狂的镇压，抵挡不住声势浩大的工运力量，特别是巴黎和维也纳，导致政府不得不就范，在 5 月 1 日宣布停工休息，唯独德国政府例外。据该国的社会民主党指出，德国反动派以威胁取消普选权作为钳制工人「肇事」的手段。

从此以后，各国工人逢每年 5 月 1 日，必举行各式各样的集会和活动，来纪念国际劳动节。5 月 1 日遂成为全世界工薪阶级和劳动人民团结战斗的传统节日。

大马职工会争取的成果

在我国，为争取宣布将 5 月 1 日列为公共假期的努力，始于 50 年代。遗憾的是，当时的英殖民政府把有关诉求抹黑成是共产党颠覆的借口而拒绝落实有关目标。

独立后，大马联盟政府依然不断取缔和镇压激进的劳工运动，导致我国的工运力量逐渐由激进转向温和，政府所通过的劳工法令一贯以来都是以资方的利益为考量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备受禁锢的本地工运，虽然无法像欧美的工运那般成为推进社会改革和捍卫工薪阶层的进步力量，并作为左倾政党的臂膀，但是我国的工运还是在大马职工总会（MTUC）和各反对党的配合下，继续为争取落实把劳动节列为公共假期而努力不懈。

迟至 1972 年，国阵政府才同意将 5 月 1 日列为劳动节，并宣布往后的「五一」是公共假期。然而当时的私人界却反对政府这么做，原因是担心他们的营业和生产力受损。结果经过数年的对抗和谈判，政府在 1980 年通过修改「劳工法令」，才正式将劳动节列为全国性的公共假期。

今天的年轻一辈，在享有前人以血泪战斗所换来的成果时，应明了到持续近一个世纪的斗争过程委实不易。我们除了必须对前人的身先士卒、英风胜慨表示钦佩和感激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以前赴后继的精神，来弘扬团结互助的价值观，把目光更多地投射在集体利益和公共事业上，以实践当前条件业已成熟的政治议程。

扩大与深化「五一精神」

工人阶级的「五一精神」不仅要恢宏，同时更要将之扩大到符合新时代工薪阶层利益的疆域，如捍卫公积金的审慎投资、声讨政府处理水荒危机无能、声援德士司机免遭垄断企业的剥削、维护本地工人在经济危机时不受跨国集团的无理裁退、反对政府以企业 and 市场为导向的高等教育政策、协助原住民保护他们对土地所拥有的合法权利以及推广有助于提升消费意识的活动等等，都是不必再如前人那般抛头颅、洒鲜血就能参与和领导的社会运动。

绝对克己为公的「雷锋式」集体主义。在今天经已失去了其存在的客观条件和历史合理性，但这并非意味着我们要摒弃集体主义，而是如何以更有效、更符合新客观条件要求的方式来弘扬「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精神。

希望今年的劳动节能令许多年轻一辈在休息之余，重新思考劳动节的意义。回溯工运史只是一个涤荡思维的发端，更重要的是如何审时度势、因势利导，从而把集体主义的精神培植在新世纪的新新人类身上。

北欧社会民主党的「团结互助」、英国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他人中心论」、美国的「社群主义」都是可供我们作为回应「亚洲价值观」时的参照系统。为了反击右翼文化霸权的围堵，我们除了需要更多的活动家外，理论家的研究和贡献也是整个运动的重要配套环节，大马的情况尤其显得急迫，毕竟我们对理论建设工作的长期忽略，经已导致行动上的许多失误和滞后！

「社会化」取代「私营化」

国阵政府自80年代中旬从英美保守主义思潮引入「私营化」的概念后，就如火如荼地把国家所应肩负起的公共服务职能——加以「私营化」，许多影响人民日常生活的公共服务如电能、水供、电讯、邮政、医疗、铁路、高速公路、社区巴士、轻快铁、民航、排污、垃圾处理、泊车收费等等都交由垄断性的私营财团来经营。

政府每每以「减轻政府负担」以及「提高服务效率」来作为「私营化」公共服务的借口。然而，今天「私营化」政策的种种弊端全然浮现出来，它不仅无法有效地为人民提供良好的服务，甚至在制定收费方面，也不时以各类借口来增加人民的负担，而政府在制衡贪婪的收费制度方面，却显得一筹莫展。

单方面照顾私人财团利益

我国的「私营化」政策之所以漏洞百出，原因在于政府把公共服务的职能完全交由垄断性的财团机构来经营，当中不仅在签订合同上单方面照顾私人财团的利益，如在贷款融资方面给予十分优惠的便利，甚至授权私营化公司得以不时按其机构利益所需而检讨收费率，有者「私营化」计划还获得政府保证其固定的「营业额」（如收费站的交通流量），否则损失由政府赔偿。再者，当私营化

公司在检讨收费受到民间反对时，政府反而恫言要以公帑作出赔偿来为私营化公司辩护。

这种单方面照顾私营化公司利益的失衡措施，导致人民的利益全然没有受到保障，结果沦为私营化公司「独赢」，而政府及人民却「双输」的局面。特别是当国家面对经济危机，百业腾涨之际，私营化公司依然还要提高收费，这无疑给中下层人民的生活带来更大的艰辛和严苛。

虽然「私营化」经已广泛引起沸腾的民怨，甚至一些国阵成员党领袖也不得不俯顺民意以抨击「私营化」的弊端，但是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却丝毫没有改变，许多公共服务还是不断进行「私营化」，例如副首相兼财长安华最近针对私营医疗服务收费所作出的「道德性呼吁」，以及马华党大所通过谴责「私营化」的议决案，似乎对扭转整个「以牟利为导向的市场经济」起不了什么作用。

缺乏「反垄断法」的制衡

大马的「私营化」政策较英美者还要变本加厉，原因在于我国在推进「私营化」时没有配套地在国会制定「反垄断法」(Anti-trust law)来确保其他私营机构得以公平地在市场上相互竞争，以杜绝某一间私人财团只手垄断公共服务，导致它可以毫无忌惮地扭曲价格机能，从中牟取暴利。

例如德国在「反垄断法」方面就具备了健全的法治基础，它

在1958年1月开始实施，1966年、1973年、1975年、1980年及1989年先后进行过5次的修订和补充。「反垄断法」的作用在于：通过禁止竞争的对立物——垄断和其他限制竞争的行为，从整体上维护竞争秩序，创造自由、公平的竞争条件。所以，它是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直接目的，被视为保护市场经济制度的「大宪章」。

大马的「私营化」政策基于缺乏「反垄断法」的管制，导致资本出现垄断和高度集中，这股力量一旦失控，就会主宰市场运作，加上藉着官商勾结的金权政治，不断制定制度化的剥削政策和法律，那麽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以及社会正义的促进和彰显就荡然无存。印尼苏哈多政权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大马的发展趋势也显然是朝向印尼的路子走。

「社会化」为第三条道路

为此，社青团呼吁人民在对「私营化」感到万般失望之余，应响应「社会化」(Socialization 或称 Social ownership)的号召，通过施压要求政府借鉴北欧斯堪地纳维也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工党政府所参与实施的「社会市场经济」(Social Market Economy)，这是一条介于共产党的「国有化」(Nationalization)和资本主义保守党的「私营化」(Privatization)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所谓「社会化」的首要宗旨，就是确认「市场是为人类服务，而不是人类为市场所奴役」的市场经济观。

「社会化」致力于经济的自由化与民主化，是一种调和「经济

率」与「社会正义」、「自由竞争」与「政府调控」的混合经济模式。

「社会化」在欧洲各国社会党政府所实践的模式和具体方法各有不同，譬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工会倡导「公决制」；瑞典社会民主党奉行「集体谈判」；奥地利社会党主张「社会伙伴关系」，而法国社会党则通过「企业委员会」来制衡私营资本。

大马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所犯的毛病，就是一概「向右转」，一切任由市场力量来宰制公共生活，过度推崇经济成长，忽略社会正义和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同时又犯上「该自由的不自由，该管制的不管制」的失误，如对资讯和新闻的流通统得太死：对私营化公共服务却又放任得太松，甚至在公共医疗及高等教育方面，亦有逐渐「私营化」的倾向，这些弊端都是必须通过「社会化」来加以匡正的。

由此，大马的「社会化」道路应该是有我们自己的模式，它必须结合我国当前的生产力水平、工运力量、在野党及非官方组织的理论和实践能力，共同打造我们的道路，目的是为了制约失控的「私营化」政策，把市场经济建设得更符合人道和公共利益。

「国有化」证明走不通

需要强调的是，社青团并非主张所有涉及全民利益的公共服务都必须向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那般看齐，以僵化的「计划经济」来全盘收归国有，「国有化」在今天经已被证明是走不通的（除了国防、外交、教育、卫生等部门），因为在党国不分的运作下，权力

的高度集中，导致官僚主义横行，服务效率低下，加上资源配置全以党国领导人主观意愿为依归，市场发挥不了调节作用，人的首创性、积极性和能动性自然无法调动起来，生产力必然无法解放，这些都是「国有化」的弊端。

英国新工党在1994年10月为了顺应历史潮流和社会结构的新发展，不得不修改党章第4条款有关国有化（公有制）的内容；甚至如中国大陆也在进行国有企业的改革，故社青团绝对不会因为「私营化」的穷途末路而将立场回旋到「国有化」的死胡同，我们所鼓吹的「社会化」是既不偏左，也不靠右的「第三条道路」。

社青团主张政府将公共服务从溃败的「私营化」经验逐步转向「社会化」，政府所能扮演的角色就是通过立法来调控或干预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的合理均衡发展。

具体来说，比如槟州的水务局，它是一个在州政府管辖下每年皆有六百万盈余的公营机构，服务效率也算良好，因此它不应该被「私营化」，如果政府真的为了要配合撙节运动而在公共开支上「减肥」，那麽水务局应考虑的是被「社会化」，而非被「私营化」。

分摊「社会化」职能

政府可首先立法规定参与水务局「社会化」的机构必须是公共非盈利机构，并且参与「社会化」的过程不能是由一个机构独揽所有权和经营权，政府可作为协调者来把水务局的服务职能，按最符合公共利益的准绳来分别授予五至十个非盈利公共机构来共同经

营，比如公积金局、槟城消费人协会、狮子公会、堂联、水务局职工会、马来人商会等等都是可以按其经济能力和社会信誉授予部分经营职能的对象，这些非盈利机构除了联合经营水务局外，也相互监督管理职能（当然日常行政和服务运作还是交由原本水务局的技术人员来负责），在加上广大消费人、各类传媒、朝野政党的监督，槟州水务局必然不敢像今天的雪州水务局那般嚣张，其副局长苏巴马廉在无法为市民提供自来水便利的失职情况下，还表现得那么官僚主义，大放厥词。

再者，「社会化」营运下所获得的盈余，除了用作添设更完善的硬体设施外，也能将这笔盈余用来搞好水务局职工人员的福利，如为他们的子女设立奖贷学金、设立托儿所、从事职工电脑培训计划、设立度假村、提高职工离休恩奉金等等，这些都是在以不必满足私人财团「以牟利为导向」的大前提下，所能为社会以及职工带来实惠的措施。

社青团希望大马政府认真看待「社会化」的建议，并积极和果敢地以全民利益为依归，把弊端百出的「私营化」服务逐步过渡到「社会化」，唯有如此，人民才能以更合理的价格，享受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同时大马的市场经济也将从「以牟利为导向」转变成「以人民为导向」。

本文是作者于5月29日假槟州华人大会堂所发表的演词。

论格瓦拉的斗争 与恐怖主义的区别

切·格瓦拉（“Che” Guevera），古巴革命领导人、「游击中心论」的倡导者，他不仅是拉丁美洲卓越的游击战专家，也是全球左翼的传奇人物。

格瓦拉的名字，最近随着其遗骸被鉴定、并送回到古巴安葬而在全球传媒曝光。据悉，古巴官方除了将把格瓦拉安葬在圣克拉拉一个以其名字命名的广场的纪念陵里，更把今年宣布为「英雄游击队及其战友斗争牺牲卅周年纪念日」，以国之瑰宝的至高荣耀来厚葬这位铁骨铮铮、气概豪迈的一代革命先烈。

坦白说，过去我对格瓦拉的认识是极其肤浅的，依稀记得只在旧杂志与书报上看过其肖像。最近一次是在去年赴瑞典考察时，与黄永安同志在晚上开小差到斯德哥尔摩街市闲逛，偶然在一间左翼书局看到其海报与挂像。一周后我们到阿姆斯特丹，又在街市一间T-恤档口看到格瓦拉的人头烫画。

在欧洲一连数天与格瓦拉「结缘」，令我这位亚洲小伙子有点费解。一个头戴红星军帽、双目如锥、两撇胡子，加上连接到下巴的侧须，这么一位仁兄到底是何方神圣？为何时下西方的新新人类（Generation X），还会把一个过气的人物穿在身上？

一个月后，我返回中国暨南大学做研究，并向社会科学部的老

师「寻幽探奇」一翻，随后更有幸在广州旧书摊购买到格瓦拉的其中一本专著《在玻利维亚的日子》（中译本），同时亦在网际网络下载了许多相关资料，这篇反思札记即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

虽然笔者只是凭着书本与网络的接触，对格瓦拉本人没丁点儿感性认识，加上七十年代始出世的孩子，基本上对过去的火红时代确实无法体会。但格瓦拉对信仰的拘执、对实践的顶真，其坚韧的毅力与倜傥的行动在「倒入」我的历史释义圈（Historical Hermeneutics Circle）之后，格瓦拉传奇性的历史画卷，仿佛一幕又一幕地再现在我眼前。

1928年6月24日，格瓦拉诞生在阿根廷罗萨里奥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53年毕业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国立大学医学系。当时的拉丁美洲，正值受到美帝国主义的渗透与扩张，如通过垄断贸易和投资，加强经济控制；透过策动军事政变，建立亲美独裁政权；藉着拉拢军事集团，建立军事基地，进一步把拉美变成自己的「后院」。美国的侵略与扩张，导致第三世界国家备受压迫与剥削，终于激起人民的反抗。

格瓦拉的崛起，正印证了埃而维修所说的一句话：「每一个社会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格瓦拉坚信唯有革命才是真正解决拉美社会不公义现象的方法，从而摆脱美帝国主义的钳制与桎梏。格瓦拉大学毕业后随即投入反对桑·贝隆（Juan Peron）独裁政权的斗争，失败后逃亡到墨西哥。1956年，格瓦拉与卡斯特罗兄弟一道参与推翻古巴独裁者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的武装起义，在马埃斯特山展开游击战争，此时他任纵队司令。

三年后，革命成功，卡斯特罗出任总理，格瓦拉则先后在内阁掌管多个部门，曾担任过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司长、国家银行行长及工业部长等职。他在协助卡斯特罗制定国策期间，一直都是反美急先锋，曾对第三世界产生积极鼓舞的影响。

1965年，格瓦拉致函卡斯特罗，表示愿意辞掉一切政府职务和军籍军衔，到世界另一些地区去协助当地人民开展游击斗争。他先在刚果训练山区游击队员，与蒙博托亲美傀儡政权作斗争，过后又辗转到玻利维亚协助当地人民起义。1967年10月9日，格瓦拉在一场战役中不幸被玻国政府军俘虏，据说是遭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处决。格瓦拉以身殉道、客死异乡，其尸体一直不懂埋于何处，直到30年后的今天，才在玻国东南部出土。

格瓦拉随马革裹尸，但在其伟大的精神感召下，其创立的「游击中心论」（又称「起义中心论」或「格瓦拉主义」），在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初，曾席卷全拉美，深得拉美左翼阵营的拥护，并先后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现过上百个「游击中心」，这些组织对拉美民族解放运动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

格瓦拉留给后世的「游击中心主义」，不仅仅是一套具体的战术而已。事实上，从他本人及卡斯特罗在古巴革命成功后所发表的谈话、日记、回忆录与专著中（如《游击战》、《拉丁美洲革命的策略和战略》、《游击战：一种手段》、《古巴的社会主义和人》等等），经已系统地阐述并整理出一套指导性的革命教材，它涵盖了拉美左翼运动的世界观、社会主义发展观、党的组织观和国际主义等思想，遂发展成一支极左的社会主义思潮。

当然西方保守主义者把「游击中心论」一概抹黑成恐怖主

义，格瓦拉在美国保守派人眼中，就像卡扎菲、卡斯特罗般被视为「恐怖份子」。过去东亚的许多保守主义政权也习惯将本区域的共产党人冠以「恐怖份子」(Penganas)的称号。那些曾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从事过抗日、卫马、反帝、反殖等光荣斗争的志士仁人，历史应还他们一个公道！

社会民主的信仰者一贯反对暴力革命，更谴责通过搞「恐怖主义」(如炸毁公共设施、释放毒气、劫持飞机、绑架人质、袭击无辜平民、谋杀政敌等)，把斗争(不论是左、右或宗教)引上一条反复使用死亡、残害、折磨、恐吓的道路。因为恐怖主义必然助长更多的恐怖主义，从而导致暴力行动的螺旋式上升。

事实上，恐怖主义妨碍着而不是有助于问题的民主解决。再者，恐怖主义将让反动势力得逞，因为他们可以利用恐怖主义的存在和广大公众对恐怖主义的严恶作为借口，不仅诋毁恐怖主义份子，而且诋毁和平的进步力量，甚至为反动势力对民主的大肆镇压行动，提供了「合理化」的暴力依据。

但是，话说回来，反对暴力革命与恐怖主义也应该是一分为二的。我们认为暴力革命的发动至少是要基于以下四种情况，才能得到世人的同情与声援：

1. 广大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完全没有得到保证；
2. 政府不为人民提供合法斗争的权利，并用暴力镇压一切合法的反对力量；
3. 当权者治国无能，不仅无法缓解尖锐的社会矛盾，更助长矛盾的激化；
4. 外国势力的入侵和干预，侵犯一个国家的主权或践踏一个

民族的尊严。

在上述艰难祸殃的处境下，当地人民起义造反、要求民族解放，是最后的、迫不得以的、绝望透顶下的唯一出路；它与二战期间的反法西斯斗争及战后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运动的性质是大同小异的，因此，我们应给予道义上的支持与声援，希望他们的斗争早日成功，以早日进入民主法治建设的新阶段。诚如瑞典前首相欧罗夫·帕尔梅(Olof Palme)所说：「那起武器并不是为了斗争，而是因为人们想创造建设的先决条件，因为革命后开始的是正常的工作。」

我们应该拒绝东西方保守主义者把暴力革命等同于恐怖主义的观点。我们应该以历史主义的研究视角，辩证地认识暴力革命的性质。我们与其简单化、盲目地反对暴力革命，倒不如严厉谴责那些滋生暴力行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慎防以过「左」的观点来看待问题，形而上学地误以为社会主义的建设非经过暴力革命不可。马克思在1872年就曾讲过：「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79页)

由此可见，改良或革命，是要依民主传统、人文素养、生产力发展、敌对阵营的情况和国际氛围等因素加以决定，不能一概而论，本本主义的「左」王与右翼顽固份子，醒醒吧！

当我们回顾格瓦拉战斗性的一生，并审视「游击中心论」的积极意义与消极影响(如唯意志论、先锋主义、以枪代党、急燥

冒进)时,在回首反思马来亚、马来西亚的近现代史,可总结出一点经验教益。

从马共的「上山」、社阵的「上街」到行动党的「上网」,都是按历史必然性规律所发展出来的道路,他们的斗争形式基本上符合当时具体形势的需求,各个党团在各个历史阶段都发挥了推进民主、争取自由、弘扬人权、巩固法治的进步作用。职是之故,前、中、后期的民主力量应该相互敬重、谅解、团结与互助,抛开宗派主义的歧见与历史上的恩怨,共同为今后更宏伟的目标而迈进!

重建行动党的意识形态?

——回应沈观仰和柯嘉逊的诘难

行动党建党于1966年3月18日,草拟党章的第一代人,把「以宪制途径在马来西亚建立一民主社会主义之社会」列为党宗旨的第一条。然而,基于大马政治情势和社会民主历史起点的原因所致,在过去30年来,行动党所标榜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被转化为行动党人斗争的终极目标,导致为缔造大马模式的民主社会主义这么一项宗旨,被迫退居二位,甚至有逐渐被淡化模糊之势。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答案应结合具体历史和理论逻辑来推演。

「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并非只是一句口号,它是继承当年人民行动党李光耀在马新分家前的斗争目标;亦是制约和抗衡巫统「马来支配主义权」的替代路线。「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不论在联盟岁月抑或国阵时代,皆是统领所有非土著进行反同化和反支配的纲领。一句话,在种族气焰嚣张倨傲的「黑暗时代」(独立至1990年),行动党高举这么一面追求民族平等的旗帜,在大马建国史上无疑是具有前瞻性的进步意义的。

最低纲领是民主平等

故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行动党在各个历史阶段所颁布的

宣言，其主旋律都贯穿着「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之理念。因为它是伴随着巫统同化政策的建国历程所衍生出来的对立产物，是循议会道路来纠正同化路线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最低纲领」（Minimum programme）。换言之，「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民族纲领，它也属中左意识形态的一个介面，这不能如一些庸俗政论家那样将问题归咎为「行动党 32 年来没有意识形态」的简单说词。

当然笔者承认，行动党人在议会内外，鲜少讲述民主社会主义在其他介面的价值观，甚至连「术语」也没有。如行动党领袖在论及党的路线时，往往是拿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标签，如民主、自由、公平、人权和开放等等，但中左的概念如团结互助、工人自治、福利主义、个性解放等，似乎不存在行动党圈子的政治语义学当中。

行动党的两位前政治教育局主任，即沈观仰硕士和柯嘉逊博士，近来都不约而同地在本地中英文报章，特撰文针对行动党理论建设的匮乏而作出批评。他们的意见无疑是值得党中央审慎考虑的，相信行动党不会因人废言，而蓄意妄顾他们批评中存有若干合理的真知卓见。

问题是，行动党对民主社会主义在其他介面论述的淡化，除了是肇因于过度集中强调民族纲领——「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以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也应该共同负起责任？

首先，民主社会主义在大马的实践，必须结合本土具体的历史态势和政治情景。如果我们对欧洲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或工党的经验和模式（不论是在朝在野），不实事求是地统统移植到大马，则肯定是会出乱子的。

沈观仰，特别是柯嘉逊，不可能不晓得，民主社会主义的整套社会改良工程，其推进的步伐和所预期碰到的阻力，是胥视个别国家人民的认识水平、民族文化和传统的特殊因子、工运力量的强弱、敌对阵营（由大资本家集团所主导的政党和国家机器）势力的对比、经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政治民主化的程度。

五大挑战

换句话说，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一蹴而成的事业，它需要适合的土壤来生根发芽，而非如共产党那般靠一场狂风暴雨即能建立全新的世界。

一个在野并处于亚洲「威权性发展主义政权」（Authoritative Developmentalist Regime）遏制下的后进社会民主党（行动党），我们面对的挑战主要有五大项：

- 种族问题混淆了阶级问题；
- 半截子的资产阶级法权（Bourgeois rights）无法为替代阵营的公平竞争提供保障；
- 封建主义淹没了民权意识；
- 发展主义（需要维持强势政府）牺牲了制衡机制；
- 人民对社会主义长期持有的顽固偏见和无谓的恐惧。

有鉴于此，任何要求行动党按西方社会党的政治运作和模式来展开斗争，都是按图索骥，刻舟求剑之举。

分阶段落实纲领

事实上，行动党要落实比较完整的民主社会主义纲领，是要按历史条件来分阶段走的。第一步是「政治民主」，它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第一个重要前提，也是必要的基础。没有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就无法提上民主议程，也不会有政治保证。行动党32年来斗争，就是为打造「政治民主」而不断地和联盟及国阵周旋，务求拓宽民主和自由的空间，落实法治和尊重人权的基础。

为此，行动党《争取大开放》的纲领，是符合民主社会主义「历时性」发展的必然需要，它不仅是继续推进「政治民主」的步伐，同时亦是捍卫既有开放的果实，以确保民主化的趋势不会出现逆反倒退。这一阶段所提出的「十大民主化」诉求，和历史上欧洲的自由主义削弱封建主义的政治使命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行动党借鉴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拿来自由主义的口号，就不能被诠释为忽视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观。

行动党最近在全国号召推动「正义、自由、民主及良好施政」的运动，也是一项推进「政治民主」的议程（其目的是为了缔造公民社会）。第二步的「经济民主」和第三步的「社会民主」所牵涉的内容（如以「社会化」取代「私营化」、壮大工运力量，引入「集体谈判机制」来捍卫公积金会员利益及扩大本地工人的福利、并对社会上的老幼残弱施与福利津贴等），到底能否有效落实、何时落实以及需付出什么代价来落实，都要胥视「政治民主」所取得的成就。一句话，反对党和非官方组织在今

天的合作纲领，不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最高纲领，因为大马尚未出现「左翼联盟」的条件，而应是类似西方某些社会主义势力稍弱的国家那般，先组织「彩虹联盟」来和保守政权抗衡，尔后逐步迈向「中左联盟」，最终取而代之。总之，超越现实条件的盲目激进行动，非但无助于理想的实现，甚至也会断送斗争的前途。

至于外延性和串联性的「国际民主」，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我们更迫切需要恢宏民主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精神。因为我们体认到任何国家都不能孤立地解决它的全部经济和社会问题；同时要求每个国家和民族都要竖立全球责任感和「共同安全」（Common security）的理念。

由此，行动党的改革配套之一，就是和社会党国际的事务接轨。行动党近年来对普世人权、环球生态、南北合作、裁军与防止核武器扩散都发表声明，林吉祥更是社会党国际亚太区域（APSO）的副主席以及促进缅甸民主国际网络（PD Burma）的大马代表。

基于国阵的恶法干预不了行动党的「国际民主」议程，故我们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最为显著。往昔行动党的国际秘书是变相的旅游秘书，然则现任的国际秘书，除了频频参与促进亚太民主化的工作，亦专司为突破缅甸的新闻封锁和寻求国际外援贡献力量。此外，社青团也和社会党青年国际联盟（IUSY）及其属下成员党开展青年政治干训的活动，同时也承接了以华文出版系列民主社会主义期刊的任务。

这些都是柯嘉逊离开行动党；沈观仰淡出行动党后所总结出来的政治路线和所累积的工作成果，实践证明没有柯嘉逊和沈观

仰的日子，行动党反而有逐渐重视意识形态和理论建设的发展趋势。

顽固观点

柯嘉逊忽视踏实的具体建设工作，以为只要在竞选纲领上注人民主社会主义的因子，就是真诚的社会民主党人。柯博士最今刊登在英文《太阳报》的一篇文章，依然坚持其著作《我在行动党的日子》中的顽固观点，如把行动党在1995年大选的竞选纲领《争取大开放》形容为「尾巴主义」；把由他本人所草拟的《丹絨宣言》，在1991年的党代大会不经辩论即获通过诠释为行动党中央委员会几乎没有讨论任何关乎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把林吉祥在上届大选失败后没有引咎辞职视为违逆所有社会民主党领袖体认公信力原则的范例；把不曾颁布民主社会主义替代政纲的行动党看成和国阵一般无异。

没有结合具体条件的任何批评，对当前的行动党而言都是不科学的，其合理性是要大打折扣的。我并非是要为今天行动党既存的若干弊端来辩护，更不是认为行动党的改革工程已经做得十分成功，然而我的价值取向是：

- 行动党忽视理论建设是林吉祥个人的过失，还是曾出任政治教育局主任的柯博士和沈观仰必须共同负起责任？
- 行动党没有弘扬民主社会主义的整体价值观全然是党中央委员会主观条件的匮乏抑或社会客观形势的不成熟？
- 包括柯嘉逊和沈观仰在内的行动党人，又曾为打造一个更

加成熟的客观社会形势以便弘扬民主社会主义尽过什么力量？

- 他们更为扫清党内党外阻碍探讨和实践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绊脚石做了多少工作？
- 他们在担任政教主任时举办过多少回贯彻民主社会主义理念的政治干训营？
- 他们发表过多少篇有关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通俗文章？
- 他们出版过多少部探究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严肃专著？
- 他们在大专院校和学术界办过多少场弘扬民主社会主义的专题演讲？

结论的误差

至于沈观仰所提出的见解，更多是建基在他对1995年大选前的行动党的旧认识。行动党和社青团在西马的政治干训营以及所出版的理论期刊《社会民主青年论坛》，经已回答了他的诘难。我们在努力缔造和催生新行动党的过程中，把理论研究列为至为重要的关键点之一，其中对民主社会主义在后冷战时代的斗争道路；区分自由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异同点；区分红色绿党和绿色绿党的差别；探讨在宣传上是否应以社会民主主义取代民主社会主义；考析市场经济的运作；探究英国新工党的改革和执政之路；总结和扬弃福利国的经验教训；具体比较副首相安华所提出的「中间道路」和社会民主「第三条道路」的异同，甚至对行动党实践社会民主的批判性反思，都经已把研究成果透过文章发表在《社会民主青年论

坛》和革新号的《火箭报》上。

林吉祥近年来不只积极专研宏观经济学，事实上他对未来学的研究也极深，同时亦没有忘记对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动态的涉猎。林吉祥在去年 11 月假印度出席社会党国际亚太区域理事会所提呈的研究报告，就曾广泛引起亚洲和欧洲兄弟党的瞩目。此外，行动党对当前国家发生经济危机时所作出的建议和改革方案，如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挽救配套的看法；构成货币危机的主客观原因；资讯工艺结合全球化浪潮给全人类所带来的冲击；对恢复投资者信心的必要措施；为推进政治、经济和金融改革的具体建议等等，都为行动党勾勒了基本路线。再者，党中央为此也举行了若干次的中央扩大会议，并且和各州举行交流会，许多党员干部在辩论大马应否接纳 IMF 的立场时，展开连番理性的激烈论争，这是超脱「梁山泊众好汉动辄喊打喊杀的落伍格调」所彰显的基本素质。

沈观仰或许脱队多年，具体情况没有掌握好，依据过时的观察作出分析，结论难免会有误差。又，沈观仰为文所解剖的两大危机，一乃「自觉本位迷惑的危机」(Crisis of indentity)；二为「政治生存主义」(Political survivalism)，都不啻是独到的见解。我建议大家不妨将沈观仰的两大分析，作为考析近日在地低下进行得如火如荼的「KOKS」运动的标准，或许就不难揭露「三剑客」对外激进，对内保守的本质，以及破译槟州「四人帮」为争当 YB，以牟求在安全区生存的隐议程。

本文曾刊载于 1998 年 7 月 12 日《南洋论坛》。

论林冠英公案的正义标准

林冠英被上诉庭判监 36 个月一案经已引起举国广泛的震撼，人人认为有关判决除了对林冠英个人是一项莫大的打击外，同时亦对大马言论自由的前途、总检察长署行使提控权的标准及司法独立的精神等问题表示担忧。

行动党中央委员会在 4 月 4 日的一项紧急会议后所发布的议决案里，其中有这么一段内容：「对司法制度产生信心危机一事表示关注，特别是司法界对正义的诠释和社会所理解的正义相悖。」

行动党由此认为，林冠英之所以被判监是因为司法界对「正义」的诠释存在若干问题，法官眼中的「正义观」，和一般社会所理解及想要彰显的「正义观」显然不甚一致，导致对「正义」的意涵产生歧义。

何者更符合「正义」？

到底如何理解「正义」？「正义」有绝对客观的标准吗？法庭是否是唯一诠释「正义」的最权威机构？人民所理解的「正义」和法庭所诠释的「正义」，到底何者更符合「正义」？两者对「正义」的认知若出现矛盾，我们应以何作准？

林冠英被控煽动罪是肇因于他抨击总检察长以证据不足为由，而决定不提控被指强奸未成年少女的前马六甲州首席部长拉

欣。同时，林冠英也不满推事庭判决该名少女被扣留在改造中心，反而让拉欣逍遥法外。林冠英的此番谈话被指「置疑国家的法律」；「驱使对司法制度的不满」。

上诉庭的主审法官拿督苏里南在判决时表示：「目前是法庭发出不能容忍司法界受到任何攻击的明确讯息的时候」。意即上诉庭认为「正义」要获得彰显，首先必须确保司法界的判决不受任何评论或抨击，以捍卫法庭的尊严。否则法庭作为捍卫「正义」的机构，一旦其尊严受到削弱，那麽它在社会上就无法维持主持「正义」的公信力，司法独立的精神则荡然无存！（拿督苏里南较后否认他曾说过「目前是法庭发出不能容忍司法界受到任何攻击的明确讯息的时候」的这麽一句话。）

然而，行动党对林冠英一案的诠释，是突显林冠英为了要弘扬「正义」，而挺身为一名马来老妇女及其未成年的孙女请命，以对抗当时大权在握的首席部长拉欣。

苏里南和林冠英的「正义观」，到底何者在实质上更符合「正义」的精神，相信两者间的判断逆差不容易获得弥合。

罗尔斯的「正义论」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美德一样。一个理论纵然是华丽动人，但如果它不是真的，仍然应当予以拒绝和推翻。与此相似，法律和制度即使有效和安排周到，但如果它们是不正义的，同样应予改革和废止。每个人皆享有不可侵

犯性，这个不可侵犯性是以正义为基础的，即使全社会的福利也不能够凌驾于其上。」

「基于上述理由，正义反对以其他人更好地享有权利为借口而剥夺某些人的自由。它不允许以大多数人应有更大利益为借口而把牺牲强加给少数人。所以，在一个正义的社会中，平等公民的自由是稳定的；正义所保证的权利不是进行政治交易或计算社会利益的筹码。」

以上是美国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在其《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中的开场白，他在有关著作里阐述了正义的两大原则：

正义的两大原则

（一）正义的第一原则：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享有一相当完备体系下的各项基本平等的自由权，而且与他人所享有的同一体系下的各项自由权并行不悖。

（二）正义的第二原则：形成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必须是基于 ① 使社会上处境最不利的成员获得最大的利益；② 各项职位及地位须在公平的机会均等的条件下对所有人开放。

根据以上两大原则，罗尔斯的正义观是建基于两个部分的「社会基本结构」，一是界定并保障公民享有「平等的自由权」（equal liberties）的社会系统。（自由的涵义，按社会民主的理解，可分为基本自由和高层次自由。基本自由指的是人们的基本自

由权利，包括言论、出版、信仰、结社、迁徙、在法律范围内持不同政见的自由、通过宣传工具表达自己思想的自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自由和免受政治奴役强制的自由等等；高层次的自由意味着摆脱任何有损个人尊严的依附性、摆脱困苦和恐惧，并享有为追求个人目标和发挥个人潜力而行动的最大机会）；另一是区划社会资源配置和经济利益不平等的经济系统，如市场的竞争机制、政府的干预、福利的惠及等等。

罗尔斯的正义两大原则必须依据严格的顺序，第一原则总是优先于第二原则。换句话说，人们在建立正义的社会制度时，应先满足第一原则（自由的优先性）的要求之后，才能落实第二原则（正义对效率和福利的优先），即「一切的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以及自我尊重的基础——都必须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的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

以「自由的优先性」为准

讨论林冠英公案的切入点，尤以正义的第一原则为准，即自由的优先性。众所周知，自由并非是绝对的和无限制的，一个人除了享有自由的权利，也有保障他人享有自由的义务和责任。个人自由的界限是：当个人行使自由的权利时不应侵犯他人的自由。

既然自由是可以限制的，那麽限制自由的标准又是什么？罗尔斯的观点是：「自由只能为了自由的缘故而受到限制」（Liberty can be restricted only for the sake of liberty）。

林冠英被判监 36 个月，意味着他的自由受到限制，而限制林

冠英自由的理由是建基在「目前是法庭发出不能容忍司法界受到任何攻击的明确讯息的时候」，法庭以捍卫司法制度的尊严作为彰显「正义」的基础，显然是违反了罗尔斯的「正义第一原则」。理由是，人民享有对司法界提出意见的权利（这与《联邦宪法》第 10 条款所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是相一致的）受到侵蚀。上诉庭主审法官对法庭尊严的「捍卫度」没有和人民的言论自由度取得平衡，「不能容忍司法界受到攻击」成为牺牲言论自由的合理化依据。

再者，「自由优先论」精神的被侵蚀也反映在首相于 1998 年 4 月 6 日的谈话，首相说：「我们不能只为了向外面的世界展示国家的言论自由，而不对犯罪的反对党成员判罪」。换句话说，大马宁愿对反对党议员判罪，即使牺牲了言论自由也在所不惜。大马此举完全违反了「自由只能为了自由的缘故而受到局限」的原则，因为我国是以牺牲社会的言论自由来牟取牺牲林冠英个人的人身自由，呈现的是一种双重自由牺牲的态势。

选择性提控不符合正义

总检察长行使选择性提控权也是违反「正义的第一原则」的精神。「平等的自由权」是一视同仁地对待（尊重、捍卫、落实）所有社会成员所享有的自由权，没有社会平等的自由会变成特权，每一个人所享有的「自由度」不能因为其特殊地位、财富、收入、权力等因素而有所不同。例如对拉欣涉嫌强奸未成年少女案件的评论，除了林冠英以外，首相的女儿马丽娜也同样从回教及女权的角度出发展开抨击，但她却没有遭到总检察长署的提控；再者，总检

察长在处理杰菲里·吉丁岸所涉嫌的贪污案、杨德利的非法集会案、巫青团领袖查希横闯第二届亚太区东帝汶大会后，却被允许选择在较轻微（相对于警察法令）的《刑事法典》条款下受检控等等，都是选择性提控的范例。

当然，总检察长经已否认对林冠英的提控具有政治动机，其目的是为了彰显其秉公处理案件的廉正性、公信力和透明度。然而。若总检察长要彰显没有妨碍司法公正的正义典范，则应该对上述案件一一落实罗尔斯的「正义的第一原则」，而非仅靠强调「总检察长署的决定是根据现有的法律以及所获得的证据」来作为反击国内外舆论界的看法。

社会正义论坚信在正义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具有一种基于正义，或者说基于自然权利的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之，更何况是林冠英公案被广泛认为是具有政治动机。

正义感的培育

罗尔斯认为，社会成员培育正义感是建立一个正义社会的重要条件，正义感的培育是历经三个阶段的。第一阶段是父母对孩子的教导，是为「权威的道德」；第二阶段是「群体的道德」，当一群体（小至家庭，大至国家）的安排和运作被确认为是公正的，其成员在群体活动中都能受惠，那他们就会尽力维护群体的合作关系；第三阶段称「原则的道德」，这是一种升华到较复杂形式的群体道德，它会十分自然地导向一种对正义标准的认识。

「公平的正义理论将比别的正义观带来更强有力和稳定的正义感」。在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里，这些标准不仅规定着公开的正义观，并且还不断地要求关心政治事务的公民们，以及执行着立法、审判和其他类似职责的人们去运用和解释它们，由此使每个公民产生一种正义感。

相反地，如果我们对正义和公理所形成的概念产生混淆，加上这个正义的概念是不完全正确或甚至是错误的，那麽显而易见，我们的社会制度就会有缺点的，我们的公共事务就会存有谬误的，因而就会产生愤懑和不安。

反对党人斗争的悖论

在野党在议会民主制下的政治使命，就是不断依据非暴力途径来逐步拓宽「平等的自由权」，而冲击既存不合理的法制（Rule By Law）制度是牟求修正或废弃那些钳制「平等自由权」的法律所无可避免的道路。大马的反对党人遵循议会斗争的游戏规则，是一种成熟且负责任的政治态度。然而，没有落实公平的游戏规则（Fair play）导致反对党人经常陷入一种无奈的悖论当中，若完全遵照不甚公平的游戏规则，那么要修正或废弃既存的钳制性法律无疑是缘木求鱼；但为了要拓宽「平等的自由权」而选择冲击不合理的法制制度，除了要付出代价外，甚至还会被误认为是「不聪明的斗争方式」。

林冠英公案在在突显了反对党人循议会民主斗争所面对的悖论，基于坚信和平的议会道路是大马政治生态运作的前提条件，

行动党的政治使命或许注定要靠牺牲小我的自由来逐步换取社会更大的自由。林冠英可能会面对牢狱之灾，但若能因此而激起社会人士对「正义」价值的反思，进而逐步以投票箱来拓宽我国的「平等的自由权」，那么这个牺牲的代价还是值得的！

政治立场与新闻专业没有冲突？

《南洋商报》前总编辑暨总主笔张木钦最近在其「见虎烧香」的栏目里，发表了一篇题为《林吉祥大战黑手》的文章。该篇文章不仅措辞轻浮庸俗，内容也突显出对林吉祥个人极大的偏见，这无疑和作者贵为资深报人的身份格格不入。

张木钦的许多立论之所以是谬误，原因是他没有将逻辑推理「构联」(Articulation)历史条件来研究问题。他所擅长的计俩，按专业术语来说，就是「非对称性关系推理」(Unsymmetry Relation Inference)。张木钦的文章，习惯把许多在表面上存在的现象，不经严正考析地说成是现实应当存在的合理事实，然后再以这种他自认为合理的事实，来作为判断某一问题的依据，从而推导出似是而非的结论。

首先他把《南洋商报》为林吉祥提供固定专栏，说成是「实在不可思议」的「捉虫进屎忽」(自找麻烦)之举，用他办报的标准来说，简直就是「破格」地让反对党领袖，在言论自由有限的国家，提供免费的论坛。

张木钦的潜台词，意即林吉祥应该懂得审时度势，不仅要感谢《南洋商报》的大恩大德，更要好好珍惜这么一个难得的「破格」机会，来宣传政见，鞭挞施政。

不算「破格」

到底《南洋商报》为林吉祥开辟固定专栏，是否属于「破格」的安排，我有很大的保留。因为我相信《南洋商报》的高层，在作出向林吉祥固定约稿的判断前，肯定是「稳重负责」地衡量过当前的政治开放度，以及市场导向的需求。再说，林吉祥每周的供稿，也不见得一定刊登，或毫无删改的刊登，因为《南洋商报》内部自有其一套「自我审查」的机制和标准。此外，《南洋商报》也不是当前唯一敢于让林吉祥写专栏的报章，因此「破格」之说，无法成立。

既然不算「破格」，那麽「林吉祥专栏」和张木钦的「见虎烧香」就不能相提并论，因为《南洋商报》对两者所采取的审查标准，显然会就作者身份的不同、文章内容的批判对象、对读者和政府所引起的反应以及文章措辞遣字的严谨度，而有所不同。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但张木钦无需以偷换概念的手法，透过「破格」之说来讽刺林吉祥取消固定专栏的行动。

林吉祥取消专栏，是一种无奈的象征性抗议行动。因为行动党不像执政党那样可以靠一通电话，就能让报馆懂得自我约束，抑或通过种种相关的法律，来要求报馆「稳重负责」。行动党没有「恶法」的保护，只能祈望报馆秉承公正、客观、自由的专业传媒操守来处理我们的新闻。但是，如果某些报馆的日常实践没有落实新闻自由的最起码理念，我们也无可奈何。

当然我们晓得大马的新闻自由度是备受局限的，加上华文报章和英、巫文报章的所有权背景不甚相同，导致我们尽量不去批评

民营华文报章的运作。

行动党在七月上旬，议决要设立一个独立的传媒调查团，来监督和研究英、巫文报章在处理行动党最近的危机时有否给予公平的报导，因为它们每日专门拨出显著的版位来刊登行动党的内部问题，而过去它们的习惯作业方式是全面打压行动党的新闻，甚至在报导国会辩论时，连「林吉祥」三个字都删去，行动党质问到这些传媒的「预谋」是什么？

行动党人迄今依然搞不清楚，为何《南洋商报》竟会为此而暴跳如雷？我们当前所指责的某些报章，是英、巫文报章，而非《南洋商报》。张木钦的辩辞是说因为我们「冤枉」《南洋商报》，所以它要「叫得最大声」！

我不晓得《南洋商报》是否认同张木钦的这番辩辞？事实上，行动党自发生党内危机以来，《南洋商报》的整体处理手法，除了在新闻报导方面对双方尚算持平外，其余的专栏文章以及言论版的选文，都表现得不甚公正。

轻浮、偏见和挑衅的社论

但是行动党建议设立的独立传媒调查团，研究对象并没有包括《南洋商报》在内。直到7月14日的社论『行动党自造危机』刊登后，我们才认为《南洋商报》没有「稳重负责」地秉承公正、客观和自由的专业传媒操守，因为社论不应处处表现出轻浮、偏见和挑衅的态度。

张木钦以为《南洋商报》「破格」地为林吉祥开辟一个固定的专栏，就能抵消该报在处理这次危机所预设的立场和挑衅态度，

以及合理化该报在关键性时刻（即7月14日的社论刊登后的一连四天），蓄意「丢掉3篇文告」（林吉祥的回应）。张木钦责怪林吉祥「自己拆掉讲台」，「忘恩负义」，但却没有道德勇气非议《南洋商报》违反新闻专业操守的过失，并用「破格论」来加以掩饰，这就是张木钦写文章的「特色」。

经过刊登7月14日的那篇社论后，行动党开始察觉到《南洋商报》幕后存有「黑手」，再结合我们党对该报长年的观察，更加重我们党的判断。然而，林吉祥并无责怪《南洋商报》在平日处理行动党新闻的手法，只是认为在关键性的时刻，《南洋商报》总是显露出「其利用公共舆论来打压大马的反对党」之本质。林吉祥为了支持他的立论，特例举出该报在1990年大选前夕曾刊登煽动种族情绪的全版「政治广告」；以及在1995年大选投票前夕，图文并茂地诬蔑「林吉祥做梦也想当首席部长」。张木钦没有针对上述「异象」作出解释，只是企图借所谓「咸丰年代的一幅漫画」为遁词，就逃之夭夭！

《南洋商报》为何要在该篇社论刊登后的一连四天丢掉林吉祥的三篇文告？林吉祥在这三篇文告中所作出的回应以及所发出的疑问，为何《南洋商报》不一一作出解释或驳斥，而要留待劳烦张木钦以偷换概念的手法，来作出庸俗的回应？

把一切放进时空之中

至为遗憾的是，张木钦所谓前资深报人的「光环」，在对新闻自由作出扭曲性的诠释时，完全破灭消散。

张木钦认为某家报馆亲某个政党，不能算是什么阴谋而是「阳谋」，「这不过是一种政治立场」，并问行动党表示报馆「有政治立场算不算有罪」？

张木钦举例说英国的《泰晤士报》亲保守党，《卫报》和《每日电讯》或亲自由党，或亲工党而不失其权威性，来作为支撑其立论的基础。

我要告诉张木钦，你写文章的毛病就是没有将逻辑和具体历史态势（尤其政治现实）相构联，就匆匆地推导出结论。赠你一句德国哲学家的名言：「把一切放进时空之中」。

众所周知，英国的法治精神，确保新闻自由对各个政党而言，都是「费尔泼拉」（Fair play）的，即各家报馆都可以根据其预设的政治理念、企业所有权和现实利益的考量，来自由地选择亲某一个政党，或反某一政党，而不受任何「恶法」的制约和惩罚。换言之，某报支持某个政党，或不支持某个政党，都不必看执政当局的脸色，所以他们的选择是真正自由的选择。

然而，我国的新闻自由和英国相比还差一大截。大马的传媒，除了党报以外，试问哪一家报馆拥有真正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获得法治保障的「自由」来「费尔泼拉」地选择向某个政党亲和，抑或选择和某个政党对立？

因此，没有真正自由的选择不叫选择，本地的非华文报章没有不选择亲执政党的自由，也没有选择不反在野党的自由；华文报章的情况或许没那么极端，但试问《南洋商报》可以自由选择反对政党的立场吗？《南洋商报》可以自由选择亲在野党的立场吗？这是张木钦蓄意不「构联」具体情况来作具体分析的「手法」。

「政治立场与新闻专业没有冲突」的立论在英国是能成立的。因为一来《泰晤士报》得以真正自由地选择亲保守党的政治立场，二来即使选择了政治立场，它亦不会像《南洋商报》那般在诬蔑工党后，还否决工党的回应权利，更不会在英国大选前夕，制造假新闻来攻击工党。《泰晤士报》可以有政治立场，而不失其权威性的道理就在于此。

结构性的自律

但「政治立场与新闻专业没有冲突」的命题对大马而言则是荒谬的。本地华文报章在威权的法律结构下运作，选择偏向国阵是结构性自律的产物，林吉祥从未要求「只允许报纸亲行动党」，因为我们不拥有制裁不亲行动党报章的权力（即使我们党执政后，也不会这么做）。反之，国阵的新闻自由观经已实践出来，张木钦应该可以凭专业道德作出判断。

行动党的新闻自由观是「评论大可自由，事实必须信守」（Facts are sacred but comments are free），我们体认到行动党作为一个公共组织，肩负着公共使命，因此我们接受公共舆论的监督是合理的，也是必须的。但是那些蓄意通过歪曲事实、化约问题实质、挑衅和恶毒攻击的所谓「批评」，以及在作出「批评」后否决我们回应的举措，不能算是「新闻自由」。知道吗？

《南洋商报》所实践的新闻自由是否和张木钦所诠释的「政治立场与新闻自由没有冲突」的见解相一致？若然，我们尊重《南洋商报》的政治立场，但希望它今后在处理行动党的新闻时，向英国

的《泰晤士报》、《卫报》和《每日电讯》看齐，学习它们如何处理敌对政党的消息。

《南洋商报》通过「批评」没有受到恶法保护的反对党来彰显新闻自由，然而对执政党干预新闻自由的举措却噤若寒蝉。对于后者，是一种人人都能谅解的无奈，但对于前者，真的是非自由的选择吗？

行动党希望大马有一天真能像英国那般落实「政治立场与新闻专业没有冲突」的境界，而不是像张木钦所指的「本地华文报一向标榜无党无派，是他们的选择」。我再重申，这种结构性自律的被动及消极选择，不叫选择！请张木钦分析问题时要更加严谨和实事求是。

我选择在《星洲广场》发表此篇文章，是我的立场预设所致。我虽晓得《星洲日报》不愿卷入这场和《南洋商报》的论争，但是我欣赏《星洲日报》秉承「正义至上」的办报原则，也相信它会为我提供和张木钦进行严肃论争的空间。

附录

社会民主主义： 亚洲在世纪之交的新机遇

林吉祥

社会党国际理事会会议，于1997年11月10日至11日在印度的新德里召开，正值社会民主主义在亚洲面对着最大的挑战与承诺的历史转折点。我们在新德里的聚会显得更有意义，因为这是一项让我们向全球最大的奉行民主国家致敬的难得机会，同时亦向这次会议的主办单位，即领导印度联合政府的人民党致敬。

在过去几个月来，一场严重打击亚洲小龙，甚至波及日本和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已使到频频鼓吹在繁荣和自由、良好施政和民主人权之间进行独断选择的亚洲价值观的拥护者，处于节节败退的守势。

这个新格局为社会主义国际提供了一项历史性的机契，以便在亚太或是其他区域，大力推展社会民主的中心思想，即自由、民主、社会正义、和平与团结互助等与人类愿望的核心息息相关的讯息。

自社会党国际在1951年重建以来，社会民主主义经已被证明是欧洲政治力量的主流，同时也不断地在拉丁美洲和非洲获得长足进展。然而在亚洲，除了如日本、印度、尼泊尔及蒙古等兄弟党能单独执政或组成联合政府而使到社会民主党得以扮演重要角色外，

作者为大马国会反对党领袖暨民主行动党秘书长。

本区域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力量皆面对艰巨的挑战，而过去 20 年来各小龙经济的高度增长，使到社会民主在亚洲的发展更为困难。

「经济自由化将必然导致政治自由化」是众人向来抱有的错误观念，而这是亚洲价值观理论崛起的原因，说穿了，它只不过是以民主的语言，来粉饰并合理化集权或威权统治的把戏。

经济危机的政治因素

亚洲小龙经济的动荡及发达国家市场所遭受的牵连，除了肇因于本土政治的问题外，亦含有全球性的因素。在国内，经济危机的政治因素与欠缺民主有关，如缺乏透明度和贪污盛行，导致经济管理不当，又如毫无节制的过度贷款率、产业和股市过热、出口产品竞争能力剧减以及不明智的投资等。

在环球的因素方面，除了日本以外的东亚国家，在 1991 年仅占全球生产总值的 20%，但却占了一半的全球成长率。如果东亚因为经济危机和外资的减少而导致增长率放慢，那将会抵消目前陷于低潮的西欧经济在明年所预期的复苏机会。

影响亚洲和全球市场的经济动荡突显了社会民主对市场经济的正确分析，即如社会党国际第 20 次大会所弘扬的主题：「市场是为人类服务，而不是人类为市场服务」（John Smith 语）。且让另一个论坛来研究全球化对经济危机所带来的严重影响。在全球化的型期下，国际秩序的新范式、跨国公司的操作、单一国家的主权以及社会控制等概念，都必须给予革命性的理解。其中最本质的问题是，到底全球化会导致人民的权利进一步被剥夺，抑或会带来更

积极的效果？

遗憾的是，某些亚洲小龙经济的领导人，虽频频鼓吹国际经济系统有必要出现更大的透明度和公正性，诸如对国际货币市场进行管制，避免因货币波动而危害国家经济，然而他们却不准备在自己的国家内实行他们在国际论坛上所鼓吹的政策。

事实上，在面对经济危机之际，为了打压批评和异见，出现更大的不民主和威权主义的回潮是可能发生的。诸如将自由谈论环境和经济问题视为极度「敏感」、「反国家」、甚至是「不效忠」之举，以期合理化最蛮横的法令被利用来践踏基本民权，如钳制言论和资讯流通自由以及未经审讯即扣留异议人士的行动。

但是若从积极面来看，亚洲价值观所面对的危机也就是恢宏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性契机。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指出：仅有经济增长，但缺乏民主、公正、平等、可持续发展、保护消费人权益以及建立公民社会的配套机制，不是一种可行的模式。

思考新方法

过去从未对亚洲价值观质疑过的人们，今天开始反思了。目前社会民主党人的最大挑战，即是能否将社会民主的理念，广泛转播给亚洲人民并成为主导下一个世纪的重要政治力量。

为了要成功贯彻上述理想，社会党国际的亚太区域委员会必须准备进行全面的重组和建构工作。其中不仅要准备和所有的政治势力（不论其意识形态）对话，也要积极地弘扬社会民主的理念。一个复兴且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亚太区域委员会，将有助于

社会民主的广泛传播，我们的运动将成为恢复缅甸民主的先锋，同时亦为亚洲人民追求自由、民主、公正以及团结互助等理想的代言人。

为了这项历史性目标，社会党国际除了得重新思考自由、民主、公正、和平以及团结互助等原则在面对新世纪挑战之际的新式演绎方法以外，也须要利用资讯革命所带来的新技术与新资源去建构一个新亚洲。

这种新的尝试与新方法甚至可能包括考虑将「社会党国际」改称为「社会民主国际」(Social Democracy International)。此举并非是要拒绝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要确认若社会主义国际想要在亚洲获得历史性的突破，则我们须先处理亚洲区域所独有的问题。

欧洲是社会主义伟大运动的发源地，那儿对如何区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没有存在多大的误解。

然而在亚洲许多国家，基于长时期的资讯封锁和蓄意误导，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负面以及等同于共产主义的词汇。随着东欧剧变，共产政权的倒台，更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失败与灭亡的谬见。任何弘扬社会主义的运动都一律被视为是在鼓吹一个过时且失败的意识形态。

基于亚洲许多国家对社会主义拥有先入为主的错误理解，故将社会党国际改称社会民主国际，将是下一个世纪社会民主主义在亚洲采取攻势的重要步伐，这总比继续被动地拘泥在词汇上的争论来得更有意义。

或许大部分，甚至可能所有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会对我的建

议感到不以为然甚至反感，但是为了要让社会民主在亚洲取得历史性突破，也为了要在全球化的大潮下，对失控的资本主义进行驯化，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准备有更大胆、更创新的构思。

在这个亚洲小龙经济处于挣扎求存，永远保持高度成长率的「亚洲奇迹」幻影破灭的时刻，所谓下世纪将属于「太平洋世纪」的说法已逐渐式微。此时，正好是社会民主力量整装待发，大展拳脚的时候，以便将 21 世纪发展成亚太区的社会民主世纪！

本文乃作者在有关大会上所发表的演词，较后刊载于 1997 年 12 月 7 日《星洲广场》。

东亚经济危机与 东方社会民主主义改革

鲁凡之

东亚民主化契机 与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总危机

东亚局势正在发生急剧而尖锐的变化，已明显地不仅局限在经济，而是正由经济扩及政治、社会、文化的整体格局。东亚金融和经济危机有越演越烈的持久深化之势。

照现在的严峻局面看，有可能逐步促成东亚政治危机或民主化契机的前提——经济发展不会「自动形成」政治改革，但经济发展与经济危机的「吊诡综合」，却可以促成政治改革的「前提条件」；不要忘记，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客观法则），是包含着「经济危机周期」的。70年代初以来的滞胀（Staflation），即生产停滞或低生产率，并带高失业率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新危机形式，并没有改变其具有「危机周期」的本质，而只不过是传统的十年一次的「危机周期」变形、延缓、积压、转嫁和世界化疏导；总有一天要面临此危机积压极限而再「总爆发」。

作者为香港著名学者/政治理论家。

今天的东亚经济危机就显然具有此深层性质，但却由战后新兴的东方资本主义先引爆，而不是由传统领先的西方资本主义所引爆。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其「构造」本身已内在决定其一方面高速成长，但另一方面却没有所谓「永远繁荣」，而在盛衰周期的不断循环发展里，朝向超越其自身，朝向超越性解决其内在固有综合总矛盾的「后资本主义」（Post Capitalism）；在资本主义及市场经济带来人类历史进步的基础上，逐步克服及扬弃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盲点」和「死穴」，即其缺陷和局限，从而作超越性的人类新发展。

当前还在深化的东亚经济危机，已促成由印尼作起点，马来西亚、泰国、南韩、菲律宾等亦在酝酿契机，出现政治危机或进一步民主化及和平政改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而日本的政治格局亦已频频出现较大的改组 and 变化；柬埔寨、缅甸的政治危机虽原与东亚金融危机无关，但今后亦将可能与有关的波连在客观上汇合，若时日拖长，也可能影响到中国等其他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东亚经济危机已不仅限于金融危机（现已包括消费市场大幅萎缩而导致的大批企业倒闭、工人阶级失业、楼宇空置、生产过剩、中产阶级受严重打击等），而且正呈连锁反应趋于可能恶化为「另一个三十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及市场经济总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走资」的俄罗斯经济陷于崩溃，东欧经济一直没有实在的起色，美国后院的拉丁美洲亦正由巴西、墨西哥掀起了新经济危机，第三世界多数地区始终落后发展和贫困匮乏。西北欧和加澳主

要凭籍「半社会主义」的「福利国」(Welfare State)缓和持久失业等劣况及提供社会相对稳定的福利保障,国际资本主义头号支柱的美国,也正准备受冲击考验。

资本主义「内在逻辑」必然爆发大危机

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始终利润增长远快于工资增长,从而总的来说,尽管工资增长及人民生活改善不少,有效需求市场大幅扩大,但积累至天文数字的庞大私人财团资本始终增长得更快更多;他们可运用的资金(包括种种期货、「资金」等)以至相对的所谓「资本过剩」、「生产过剩」及「有效市场不足」,始终是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根本问题。这也是一切国际金融资本、国际炒家、「投机资本主义」的必然存在、必然扩大的客观根源。

一般投机仍不足,遂有「买空卖空」、「衍生工具」等等所谓新投机方式;仍而不足,也肯定将继续有「衍生再衍生工具」……诸如此类的更新投机方式,这是资本主义及市场经济必然的,否则上述含义的「世界过剩资本」如何谋取利润?货币不谋取利润,便不是资本,便不是资本主义。可知「全球资本主义一体化」早就已是一大「泡沫经济」,投机比例日高,生产增长缓慢。香港、东亚的泡沫经济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虽然香港泡沫经济加上了「九七回归」前后的特殊因素,东亚泡沫经济加上了战后以来所谓「东亚发展模式」五十多年「负」的一面总积累和总爆发的特殊因素,「正」的一面则已发挥得差不多了!

回顾「三十年代总危机」与 西方凯恩斯/社会民主主义改革

三十年代由西方带动的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暂且不谈其与三、四十年代世界大战的关系,我们已清除看到其给西方先进国家所带来的巨大进步转变——「正统资本主义/纯粹资本主义」基本死亡,「凯恩斯式/国家调节资本主义」与「社会党式/社会民主主义」合流;从经济学角度看,便是于「自由市场」失效/断裂处,由「国家调节+自由市场」去将之从在衔接以致更扩大运作,是「政府挽救市场」、「政府制造市场」、「政府挽救资本主义」——必须注意「挽救」二字!当然,「纯粹资本主义」是基本完结了,但却不出现规模更大得多的「新资本主义」与新世界市场。富可覆国的新垄断资本仍然存在,也同样当然,在这「新资本主义」里,也已同时存在了日趋明显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构成,这亦是无可避免的人类进步必然发展。

将政治角度、哲学角度、社会学角度结合来看,那更是人权、法治、民主的进一步深化,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的进一步深化,新中产阶级进一步壮大,公民社会的进一步成熟,「国家」的进一步「非资产阶级化/公器功能化」,以及社会公共利益及中下阶层利益得到进一步确立,新垄断资本主义受到进一步的立法限制……等等的进步演变。这就是西方先进国家,由美国罗斯福「新政」(凯恩斯改革)到欧洲「社会民主党福利国家」迄今的基本情况;虽然七十年代开始的「凯恩斯危机」,至今仍不能解决,「国家调节的

资本主义」、「国家调节的市场经济」亦出现新的大问题，期间并出现弗列特曼等的「正统资本主义/新保守主义」回潮，但要求回到「前凯恩斯」当然不可能亦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美国共和党以及英国保守党下台后，「弗列特曼主义」也已明显减退。

现在回顾起来，可以说，没有三十年代由西方开端的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便没有上述的西方逾半个世纪的进步发展，这亦堪称是人类的吊诡「现代辩证法」呈示。

东亚发展模式」的正/负二面

而战后迄今的东方/东亚，则由于西方诞生现代工业革命以来的相对「落后发展」历史背景下，大部分于摆脱殖民地及其可能境况之后，便分别通过不通类型的「国家/专权党模式」或「国家/大财团模式」，香港殖民地亦绝大多数时间属「非民主专权模式」——合为所谓「东亚发展模式」，特征之一是通过「权威国家」扮演重大功能角色或扶殖角色去实现民族资本积累或本地资本积累、工业化基础和国民经济振兴；一则顺应东方文化传统的「国家强/社会弱」特征及「家族/群体伦理」，另则发挥权威国家的集中力量，「加速度」工业化及「现代化」功能。数十年下来，大体言之，国民经济成长和「现代化发展」的成绩是明显的——虽然「现代化」即使在先进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也并不全面充份。

结合著所谓世界总资本及西方资本向低工资、低福利保障、低物价、低生产成本的东亚中度发展地区作「资本结构转移/现代化扩散」，以及利用东亚廉价劳动力为西方消费市场生产（所谓

「让出」日用消费市场/轻工业市场给东亚及「第三世界」资本的实质），东亚整体经济成长率远高于西方，而日渐改革东西方之间的世界资本主义及市场经济关系和格局。不仅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已先后脱出上述的「中度发展地区」层次，而直迫西方先进国家，日本更曾在经济上问鼎「世界第一」以力压美国；而且占全人类近四分之一的中国经济实力及「综合国力」明显大幅度增强，马来西亚、泰国等亦紧随亚洲四小龙之后而取得显著发展成绩……，以至一个所谓「新太平洋世代/新东亚世代」的预期，确然已在酝酿之中——虽然在我看来，这是要到二十一世纪中期，才能真正成为充份事实的人类历史又一大变！

然而，「东亚发展模式」在取得上述「正」的发展方面的同时，「负」的发展方面——即付出的代价亦非常巨大，主要是攀附着「权威国家」及「家族/群体伦理」而必然形成的大量「负功能」与「反公义」消极体现，包括官商勾结、官商一体、贪污腐败横行、贫富悬殊、裙带风盛、社会不公、公产私化、籍权营私、权钱交易、权责不明、追求门面、官僚虚饰、公私过度消费、不良信贷积累庞大……，以至搜刮民脂的「官僚资产阶级」、「官商财阀大家族」、「东方式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以及东方传统文化已特强的家族制专权与国家专制，更以现代新形式强化，将东亚上一历史阶段在反帝反殖民族独立运动/救亡革命中，曾广泛兴起的民主运动及其人权/法治/民主价值打压，或变形扭曲或拉向倒退，民族及文化发展不平等，甚至出现印尼对华人及土著少数民族的「法西斯」式持久种族迫害，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及地区「小霸权」时现……。

「东亚发展模式」与金融危机爆发

「东亚发展模式」的「负」的诸方面发展，数十年间已积累至十分严重的程度，而在这个时候，早已在全球范围流窜的「世界过剩资本」、「金融投机资本」、「股汇炒卖资本」，以及在「世界总资本」整体层面上早已形成的「泡沫经济」格局（实不限于一时一地），更藉网际网络等资讯技术革命大大加速「全球资本主义一体化」，而更大规模在东亚发生作用；结果以美资为主的国际金融资本/索罗斯等国际炒家的股汇炒卖、衍生工具投机掀起经济龙卷风为点燃，既引爆先在东亚各国连锁反应，后更扩散到全球去的东亚金融危机，并将可能成为「后网际网络」的第一个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亦在此大危机风潮中，将「东亚发展模式」上述诸「负」方面发展的积累，逐步引爆出来。

「东方社会民主主义」 改革的契机、动力与内容

「东亚发展模式」及所谓「亚洲价值观」各种「负」方面因素的相继爆发，若得到足够的历史理性检讨、「现代化反思」和新体制改革、新整体结构改革的处理，我看那是二十一世纪中期，「新东亚世代」和「新太平洋世代」充分来临的必要历史前提，在期间，由现在起的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好比三、四十年代西方掀起

的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导致西方尤其欧洲先进国家出现数十年的「社会民主主义改革」进步浪潮一样，二十世纪行将结束时由东方可能掀起「另一个三十年代」的东亚经济危机，亦将导致东方也逐步出现一个数十年的「东亚式社会民主主义改革」进步浪潮；并可能在「全球资本主义一体化」的急速进程中，也带来「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一体化」，即「东亚经济危机全球化」的急速进程，从而亦促使西方的既存「资本主义/半社会主义」混合结构，亦可能出现更进步的改革！

这个由东亚经济危机逐步激发掀起的「东亚社会民主主义」历史波段，主要的社会改革势力，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被打击最严重的新中产阶级中下层，他们的「改革派」政治代表（可能定义为新含义的「新左翼」），将会与基层群众一起促进新改革——但香港的新中产阶级则相对缺乏这方面的动力，因为他们是全世界最高平均收入的中产阶级（以至他们的子女成为全世界「最受过度宠溺的新一代」）；而香港工人阶级则勤称是经济发达社会里，几乎属最低平均工资、最低福利保障的工人阶级。但香港缺乏发达的工人运动传统，中共更在此推行资本主导的「劳资调和」政策。

至于这个「东方社会民主主义」改革的主要内容，则是：

- 维持及发展战后以来「东亚发展模式」的「正」方面的优势和成果，克服及扬弃「东亚发展模式」的「负」方面的缺陷和局限；
- 人权、法治、民主深化的政治法律社会文化大改革；
- 多元民族及文化平等发展；
- 「国家调节的市场经济」与合理适度的「福利国家保障体制」相接合。

「东亚发展模式」本已自东方文化传统里发展出「国家调节经济」的特强功能，那是东方自己的「前凯恩斯的凯恩斯」，但却必须将「国家调节的新资本主义」与「官商勾结的官僚资本主义」明确区别开来，发展前者而扬弃后者，必须将「国家调节的法治市场经济」与「官商勾结的官僚市场经济」明确区别开来，发展前者而扬弃后者。

「新资本主义」、「凯恩斯改革」 和「民主社会主义之路」

由西方到东方，「社会民主主义体制」的要求，都是：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取代传统的「纯粹资本主义/纯粹自由市场经济」，并继续进一步结构改革为与「民主社会主义」结合的「混合经济/混合结构」，而完全扬弃「官商勾结」的「官僚资本主义」与「官僚市场经济」（在东方/中国，即传统古已有之、于今尤烈的腐败「官商经济/官商主义」）——东亚只有香港这个曾长期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微型「城邦式」社会，因为较少东方「前凯恩斯的凯恩斯」（国家调节经济功能），到今天的金融大危机中，才被迫较明确地走上「凯恩斯之路」！

香港政府从来都不是「凯恩斯信徒」，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现实迫使他们这样走，亦可见资本主义「内在逻辑」所客观包含的「自我背反」因素和趋势；但「凯恩斯主义」亦只主张「政府制造市场」和「赤字预算」来刺激经济、制造就业机会等，以公私

「透支经济」去「调节市场」和「提早实现市场」，却非「干预股市」。

香港政府的「干预股市」实只能是一时之法，虽然那确曾「刹住」国际金融资本的一轮「炒卖掠夺计划」，但长久计却必须另谋根本对策。强力冲击香港资本自由市场，即被弗列特曼称为当世仅存的「国际自由资本主义」最后堡垒的力量，不是别的，竟正是「现代国际资本主义」自身的「内在逻辑」！

香港和东亚在这方面，也要走上西方先进国之路，「社会民主主义之路」并不违反香港「长期维持资本主义」的规范——也同样曾经长期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微型「城邦式」社会的新加坡，则于独立建国后便早就走上这条道路；虽然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后来被「社会党国际」认为其违反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民主原则」而将之开除。日本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亦有其现代化「公民社会」基础及广泛中下阶层根基，近年已曾执政，虽然政治上需要更多的检讨反思和重订目标/策略。马来西亚已有32年历史的国会主要反对党——民主行动党，也是社会民主党类型政党，并且是今天「社会党国际」唯一以华人为主的多元民族成员党。

美国金融资本的「两面刃」与「魔灵」

至于实受美国金融垄断资本支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开出的「解决金融危机方案」，以及美国政府的有关政策，实质都是为了美资为主的国际金融资本「更方便」地在东亚各

国「自由流动」及控制东亚经济；诚然，东亚金融大危机亦可能反过去冲击到美国经济，但时下美国显然已将日本曾经问鼎「世界经济第一」的势头压下，并且在从东亚到俄罗斯再到拉丁美洲已呈连锁反应的国际经济危机中，美国俨然以「拯救者」的姿态出现！那是谋求「唯一超级大国」的所谓「世界领导霸权」所需。

然而，这无疑是一把极其危险的「两面刃」，那虽可以为美国带来世界战略的政治利益，更可以以美资为主的国际金融资本带来实实在在的庞大经济利益；但此等「新帝国主义」利益和策略会否最终引火烧回美国自身呢？那就要看这「后网际网络」的第一次严重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会否真的演变成「另一个三十年代」——一场新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总危机了？！

美国确实有政治民主、自由、法治和很高的「人权」落实，但美国也确实有新垄断资本主义大财团的实质支配与「金元霸权」；真正的魔灵，始终是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构造」本身的「内在逻辑」（发展法则），即由「世界总资本」的天文数字积累规模远大于「世界总有效需求市场」增长而来的所谓「世界过剩资本」（以美国过剩资本为主）——但今天人类的大多数，「第三世界」多数地区却仍然严重资金不足和严重物资匮乏，「悲惨世界」仍普遍存在，这一人类全局的「整体性矛盾」，今后究竟趋于怎样的「理性有效解决」呢？

显然，美国和欧洲先进国家需要更进步、更合乎西方人民利益和世界人民利益的「人道化/理性化」深刻结构改革。

社会民主的新疆界

作者：彼埃尔·莫鲁瓦(Pierre Mauroy)

译者：丘光耀

1997年6月，在欧洲联盟的15个国家当中，其中12个是由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执政或组织联合政府。最今在欧洲人口最为稠密的国家，即英国与法国，它们的人民把未来寄托在左翼政府手中。明年德国人民也应该会选择揭开新的一页。

这些都是决定性的发展。它不仅显示人民拒绝自由主义政策所带来的经济溃败、社会贫困和对人类生活的漠视，同时也突显出人民对社会民主宏图的信任，所以我们肩负着一项双重的责任感。

首先，迈向欧洲的责任，其前程就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要开始采取重大的行动以缔造一个增长、就业、团结互助和民主的欧洲。这些价值都是我们党特征的基础以及我们对欧洲承诺的理论基石。凭着这些基础价值，我们应该与公众舆论对欧洲的理想的要求取得一致。阿姆斯特丹峰会进一步朝向有关目标，它通过接纳一项关于增长和就业的议案且在协约里的其中一章包含了就业问题。现在我们不仅要向前迈步，而且要共同迈步。

同样的，我们对其他（地区）人民拥有责任，他们期望欧洲能重新形塑自身并将这一片大陆变成一个典范——以标榜政治民

主，伴随着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及文化多元的大陆。他们期望欧洲能成功粉碎那新自由主义经已暴露其全然束手无策的伪方案。

我们必须认识到社会民主欧洲的新疆界对其他大陆而言是极其重要的，正如其他大陆的发展对欧洲大陆同样重要一般。

这个新疆界的界线由我们来界定。首先这是一个民主的疆界。在中东爱好和平的同志若要挽救和平的进程以及重新恢宏宗教的发展，那么他们就需要欧洲的合作。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者需要欧洲的团结互助若他们欲赢回其政治权利。在非洲的新左翼力量需要欧洲的协助以打造一个真正民主的模式以及寻求他们迈向发展的道路。我们在拉丁美洲的战友需要欧洲的支持以便为其经济进展注入社会民主的价值。亚洲的民主党派需要欧洲的援助若他们要建构一个将人的介面和工业发展相一致的社会制度。

新的疆界也是经济的疆界。我们不欲再看到「全球化」成为我们理念与行动效能的煞车器。我们不应再相信经济规律是在人为的控制范围之外，甚至让它成为弱肉强食的世界。政治应该更强于经济，以便将其意志铭刻在市场的运作上。一句话，我们的责任是为进步、改良、重新配置（资源）和公正提供远景。这即是为经济机制引入积极发展（的因素）同时平衡各股势力。在彼等的情境下，我们在欧洲的举措将被那些卷入「全球化」进程的其他大陆党团视为一个试样。如果我们成功，欧洲将会被当成一个典范。

这些都是我们所面对的挑战。若我们要回应有关挑战，社会党国际是一个为我们提供辩论理念的论坛。此外，有鉴于社会党国际在地理上的不断伸延同时其成员党在人民当中的影响日益扩大，这些都是带来必然改变的主要原因。再者，通过其属下的委员会

——欧洲民主与团结互助的论坛——「冈萨雷斯委员会」（Gonzalez Commission），可作为推进我们所期望的发展类型之有效工具。

我们享有全世界政治组织最为庞大的地位。我们应该显示出我们是称职的。当理念转化成希望、宏图与行动时它将真正显示出力量。社会党国际拥有实现这些重要使命的能力；它亦有责任去实现它，更为重要的是它具备完成使命的意志。

社会党国际的连续性与更新性

作者：皮埃尔·莫鲁瓦(Pierre Mauroy)

译者：张玉麒

社会党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为当今最重要的国际政治组织。其强大的力量来源自我们社会民主(Social Democracy)的理念在政治、地缘以及意识形态的扩展及巩固方面节节胜利的斗争。当我们在为筹备20世纪最后一次的代表大会时，这股力量成为我们最主要的资产，社会党国际正探究如何对新形势作出调适，以反映其更新性，并展望未来的前程。当然，这全是我们长远历史的结果。

社会党国际是工人运动伟大斗争的继承者。在19世纪末，工业化推动了工会及工人政党的发展，他们很快地意识到联合及团结的必要性，并在国际上组织起来，而这是凭个人力量所无法达致的。由此，「第二国际」在成立大会上，把「五一」宣布为国际劳动节以及争取8小时工作日。这一切经已彰显出对团结和国际主义的觉悟的必要性，以捍卫社会主义的价值观。

毋庸置疑，当时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因两大考验而受到削弱。首先，我们在1914年力求捍卫和平，遗憾的是我们的尝试没有成功。接着，我们和共产主义分道扬镳。但是我们都能从风暴中生存过来，因为我们坚持社会民主的价值和理念。

作者为社会党国际主席，法国前总理；译者为民主行动党社青团副组织秘书。

在1945年后，二战的重建工作包括社会党国际的重建，1951年在法兰克福所通过的原则声明，接纳了有关「社会对经济成长的认可是赖于对个人的解放」，并确认社会主义的目标是秉承「国际民主」以确保「各个国家里的自由、对人权的尊重以及和平」。

由此国际性的社会主义迈入新的时期。我们既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性；也反对共产主义的压迫性，这经已代表了走第三条道路。我们体现了一项替代的选择，社会民主开始在若干欧洲国家付诸实践，并成功地在斯堪地纳维亚缔建了福利国。我们提供一项调和经济增长和社会正义，发展和民主，自由及对和平追求的模式。

经过这么多年，社会党国际业已竖立起自身的特征。这建基于一项人人分享的承诺，即是对每一个别计划或纲领，不论在国内或国际，都秉承着「团结互助」(Solidarity)的价值观。

「团结互助」促使社会党国际的奋斗经历了整个世纪直到本世纪末的临界点，我们都为民主、公正以及人权斗争不懈，并且在缔造和平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然而，斗争迄今仍然在持续着：在中东，不幸的是左翼与右翼政治形成显著的对照；在波斯尼亚，我们的朋友卡罗斯(Carlos Westendorp)正领导着一项卓越的重建大计；在中美洲，奥斯卡(Oscar Arias)坚定不移的决心为重建和平立下大功；北爱尔兰亦在约翰·休穆(John Hume)、狄克·斯宾(Dick Spring)和东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努力之下达致了空前的协议。

此外，「团结互助」也促使社会党国际以更深的根基和更巩

固的力量迈入下世纪，它也是我们为对抗政治压迫及金钱力量而奋斗的精神支柱。

社会党国际继续发挥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力，这些年来我们不断地设立区域性理事会以及适当的组织，例如：在东欧及西欧国家缔造社会民主理念，特别是通过协调达致社会民主创立的「民主与团结互助论坛」（Forum for Democracy and Solidarity）；社会民主对都市生活回应的「地方政府理事会」（Committee on Local Authorities）；以及支持一个情况非常复杂的大洲为建立及巩固民主而努力的「非洲主动力量」（Africa Initiative）。

社会党国际在世界上的成就越来越大，因为它已将那些梦想破碎的一群聚集在一起，同时也吸引了将社会党国际会员藉当作是一种肯定的政党。1951年，社会党国际重组时仅仅拥有少过20个成员党，到了1976年成员才勉强超过40个。然而，在1992年却多达111名，直到今天我们已经拥有139名会员，它们来自全球各地：从东欧的共产主义改革派到非洲自由运动、从智利社会党到墨西哥民主革命党、从巴勒斯坦「法塔赫」（FATAH）到蒙古民主社会党以及从波黑左翼到格鲁吉亚左翼。

今天的社会党国际具有丰富的意识形态、历史及政治遗产，我们绝对有理由为此感到骄傲。但是我们也同样面对这些优良传统的要求：即我们必须确保不使它衰微，更加不能背叛它。

有鉴于此，从开始的欧洲、南美州到近年来的非洲和亚洲，社会党国际都致力在每一片大陆札下结实的根基。这也是唯一能让所有执政或在野的社会民主党领袖聚首的国际性组织。

社会党国际的首要责任就是诚实地对待本身的价值观。虽然

经历了整个世纪，社会党国际都能够不断地适应并更新，并能够在发展理念方面取得进步、在组织上日益扩大、开放，这全都有赖于结合了社会党国际的连续性与更新性，传统与现代性。这种结合非但没有变成沉重的包袱，反而成为了一种宝贵的资产，而且在最近温科（Wim Kok）的一句名言「在为将来做好准备时无需摧毁过去」中获得肯定。

我们今天面对两项挑战，而这是必定要被克服的。因为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只要有需要就能办得到。

首项挑战是——「开放」。1951年，社会党国际基本上都是欧洲成员，而今天它在欧洲还是最强的。在15个欧盟成员国之中，就有13个能够让人们看见社会党上台执政辉煌成绩的国家，不论它是单独执政或组联合政府。布莱尔和佐斯潘（Lionel Jospin）的相继胜利标榜着欧洲社会党人的转折点。在欧洲结构进入一个决定性阶段之际，也授予他们专心致志达致此目标的首要责任。

我们目前所面对的风险就是成为本身成就底下的牺牲品。欧洲人必须意识到他们的责任，即继续将他们在社会党国际的多方位工作放在首位，唯有这样，其它各大洲的政党才能免于对长久以来一直被批判的「欧洲中心主义」回潮之恐惧。

此外，与欧洲以外的新伙伴加强联系也是重要的工作。在此精神底下，布莱尔曾建议与美国的民主党人举行对话。这种对话可以上溯到更早时，即首次与纳粹主义对抗的令人颓丧黑暗时代。过后，瑞典首相塔格·艾兰德（Tage Erlander）再次采取了主动。80年代，法国社会党以及其它兄弟党继续共同肩负起这项责任，并且与自由职工会国际联盟（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Free Trade

Union) 建立了持久的合作形式。1996年在纽约举行的社会党国际大会, 象征着这项对话的成功。

这种团结互助到了今天已经进入新的阶段。欧洲社会民主党已将改革更推上一层, 然而克林顿坚称美国民主党人还无法做到这种地步。这是特别针对美国社会福利和医药保险、废除死刑、政党财源、大学平等录取学生等等领域而言。

社会党国际也必须继续地与今天拥有140国会议席的日本民主党保持对话, 同时也不能忽略我在金大中的总统就职仪式上会晤过的韩国民主党人。有关对话也必须推广至俄国主要民主政治力量 YABLOKO、通过大会授权予全国执行理事会以争取加入社会党国际会员藉的「非洲国民议会」(ANC), 以及加纳、肯雅和其他国家的进步力量, 连同被巴西左翼驱散的力量。

国际架构的伸缩性允许了差异与一致的结合、雄心勃勃的概念以及尊重我们的原初原则, 这就提供了讨论的内容。

第二项挑战——与第一项挑战息息相关, 即「我们自己对社会党国际特性和定位的再肯定」。社会党国际之所以能够击败共产主义, 全赖它从来没有放弃过其价值观或意识形态斗争。今天, 社会党国际忙着与所有形式的极权主义对抗, 以及多年不曾间断地对抗金钱的奴役。这场战争只有靠意识形态才能得胜。即使每一个人都接受市场经济, 但是如果认为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的经济计划之间的分歧是可被接替的话, 则其危险性就存在了。实际上, 这是值得关注的, 因为它与基本的缩小贫富悬殊、减少不公平、共同分担工作以及管制金融流动等问题息息相关。

甚至最近在 Davos 举行的大会上也对极端自由主义的作用存疑, 以及强调一套世界级的「重新管制」重要性, 以奋抗市场的不稳定和社会排斥的增长。

这不是可以松懈的时候,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应时时警惕自己, 绝不能让「全球化」使贫穷国家变成富有国家的新从属, 但是它必须为人与人之间的均势与新团结互助服务, 以推动及巩固持久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在牟利的市场逻辑底下, 团结互助以及积极个人主义的弘扬是不具空间的。同时, 最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引导着对团结互助的破坏以及增加了世界上的异化现象。

社会党国际必须力求进步与勇于改变, 正如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说过的「为答案制定配方」, 也是我们都知道的。这也是为何当我与冈萨雷斯(Felipe Gonzalez)在其任期间会面, 提出成立「寰球进步委员会」(Global Progress Commission)之建议, 而有关建议也在纽约获得一致接纳的原因。这委员会的任务是为我们的未来的方针作出思考, 而最大优点是它真正具代表性, 因为它吸引了各大洲会员。有关委员会亦在各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 并且将会在明年的社会党国际大会上提呈报告。

在继承旧传统方面, 社会党国际必须秉承着高瞻远瞩的精神, 才能落实其理想以及成功地把它的讯息传达给下一代。找出这本身的答案, 是一项国际性的任务。对此, 我们在上一世纪扮演了成功的角色, 而这项胜利也应该继续被承诺到下个世纪。

本文译自《社会党事务》(Socialist Affairs) 1998年第47卷第2期, 曾刊载于1998年11月8日《星洲广场》。

我们与未来的工作

作者：尼可拉·辛克拉迪 (Nicola Zingaretti)

译者：丘光耀

经常有人谈及各领域的科学与技术的思维，伴随着本世纪末的临近而发生了惊人的转变。科学的研究看来是毫无止境的，远距传送法 (telematics) 以及生物 - 伦理学 (bio - ethics) 为个人的命运和演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问题。人类及其命运与世界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工人的世界亦经历着深刻的转型。生产的时间和模式经已改变，这归功于新的技术，此种进程看来是不会停顿的。这种转型也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年轻一代的生活受到戏剧性的影响最为重大，四十岁的「中间」一代，他们虽然依旧活跃，但却发现很难去适应时间的流程。有鉴于此，未来的工作正是也将是决定人类命运直到本世纪终结为止的主题。在我看来，有三大项主要的新事物必须给予关注：

第一是机器，技术性工具在我们的现代化社会业已扮演着增长的角色。它是生产过程以及生活和社会组织的一个重要部分。所有的机器虽制造出新的工作，然而也引发出新的问题：我们是否在见证着一个仅仅是工作被替代的活动，还是一个由机器永不休止地替代人类的过程？这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当人类最终达到其解放的目的时，即工作在生活中已经不再是「必须」，他们才会明白到工

作者为前社会党青年国际联盟 (IUSI) 主席。

作是一个人自我完成 (self fulfilment) 的重要部分，同时工作也成为在财富分配其中的一个决定性元素。肯定的是，到时新工艺和新的生产方式将使人获得自由以及拥有更多的时间。我们正在面对一个包括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巨大挑战，它直接联系到社会上各种不同的构思。如何利用这些时间？如何在个人之间重新分配生产时间？仅仅在一小部分人当中还是有必要着手进行广泛的结构重组，俾使我们都能就业但减少工作？这对我来说，是左派的一场巨大辩论和机会，所有的左翼年轻人，应该反抗那种只是把选择交由市场去决定的失范状况。

第二个深刻的转型即是经济「全球化」(globalisation) 的进程。今天，存在着一个由穷人生产，富人消费的市场。基于生意之故，在一个效能不断增长以吸纳和获取商品的市场里，有必要让贫者固贫，以维持廉价的劳动力以及富裕的市场。「全球化」通讯的新工艺使到跨国企业能够在富裕的国家里操控社会的管理同时在其他贫困和落后地区进行生产。我想左派的责任，就是要将这种下一个世纪的新剥削形式规范化。我们要采取的并非拒绝「全球化」进程的进攻性策略，这无疑是迷失方向、自杀式的策略。反之，一个广泛有序的人为干预对于此一新的全球性挑战是不可或缺的，目的是为了对财富进行有效的再分配，以反对所有新形式的剥削。

最后是知识的问题。许多人在尚未弄清楚有关知识这一主题之前，就曾表示对于资讯的摄取和占有，是确保财富的其中一项特征。智能经已获得了新的价值。然而这种认识充分吗？答案显然是不。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仅有少数人有能力摄取必要的知识 (necessary knowledge) 而过着自由人一般的生活。由此，为机会

的公平分配，不论是在国家和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穷国与富国之间都是左翼的一项巨大且重要的斗争。

这就是为何社会党青年国际联盟会选择在 1997 年，即世纪之交的前三年，把大会聚焦在未来的工作这一主题上，同时为何这一整年来，我们的会议与研讨会都环绕在相关问题而展开。社会党青年国际联盟是至今全球最为庞大的青年网络，同时它也不断在壮大当中，虽然这并非是我们的目标。社会党青年国际联盟是一个行动的工具，用以改造国家的方方面面。有鉴于我们所面对的所有新问题，此时此刻正是整个时代的社会主义者，左翼的青年，开始为这一切而工作的时候！遍布全球的每一个角落，改造它！

本文译自社会党青年国际联盟假 1997 年 11 月召开全球第 22 届代表大会前夕的预备会议讲稿。

瑞典模式 国际化趋势下的牺牲品

作者：布洛·柏祖斯(Bror Perjus)

译者：刘格正

瑞典模式不但是「社会民主与市场经济共存」的成功试验，也是工会运动的典范。在 1991 年社会民主党选举落败以前，瑞典劳资双方的「历史性妥协」持续了 53 年之久。但是，资本国际化的趋势结束了这种劳资权力的平衡，显示出以一国为基础的策略已有不足之处。

1909 年是瑞典工运史上的一个关键。雇主以经济不景气为由企图压低劳动条件，引发了劳资冲突。大部分的瑞典工人都参加了那次风起云涌的罢工潮，尽管罢工基金几乎耗尽，工人们面临饥饿却仍坚持不退。那时资方动员军队和警察，再加上工贼的破坏，使工会遭受空前的挫折。

罢工后的秋后算帐使工会损失了近半数的会员。工会学到了一个教训：只靠罢工是不够的。为了反击工会的立法以及军警的镇压，工会必须扩大其影响力。因此那次挫败反而使工会和瑞典社会民主党(SAP)的关系更加紧密。1921 年瑞典实现了普选权(废除

作者为瑞典斯德哥尔摩食品工人工会杂志编辑，译者为台湾劳工阵线义工。

了财产及性别的限制)后,社会民主党透过与农民党的结盟,终于在1930年代开始在国会中掌握多数。

以此强势地位,1938年瑞典总工会(LO)与雇主联盟(SAF)达成了《萨尔茨耶巴登劳资协定》(Saltsjobaden Agreement),终止了半世纪以来激烈的劳资冲突,建立了新的游戏规则。因此,瑞典模式的基石是:

1. 建立每隔一至三年的全国性集中的劳资谈判,决定工资及劳动条件;
2. 工会坚持「团结工资」,即不分产业地将工资拉平;
3. 全面就业政策优于提高工资。

争议不必一定透过罢工来解决,而可由谈判或劳工法庭仲裁来解决。由于工会在团体协约有效期间保证产业和平,但又能保有协约期满后号召全国性罢工的能力,乃使工运更为强大。

至此,瑞典模式逐渐发展为一套复杂的经济理论及政治实验,包括:

1. 财产的重新分配;
2. 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对完全就业及低通货膨胀政策的承诺;
3. 积极的劳动力政策,工会参与职业训练及劳动力流动的组织工作。

《萨尔茨耶巴登劳资协定》使几十年都有定期谈判,资方关厂与劳方罢工的案例急速减少。由于生产没有中断,工资乃持续提高。

资本国际化

到了1970年代,权力的平衡转移成对资方有利。控制瑞典经

济的几家出口企业如SKF, ILea, Volvo, SAAB和ASEA/ABB都变成了跨国公司。资金跨过国界,大量且快速地流动,已非国家所能控制。大公司能在一分钟内买进几千万的瑞典克朗,比从事实际生产能赚更多的钱。

于是,瑞典的大企业不再依靠国内的购买力,也不再乎劳资之间是否和平相处,雇主联盟更公开背离《萨尔茨耶巴登劳资协定》。社会民主党1976年选举的落败,给予资方反击工会的信心,挑起了1909年以来首度的大冲突。1980年夏天,近半数的工会会员遭受资方关键的挑衅。当然,工会最终获胜了。因为劳工阶级的实力远比1909年强大,劳工运动再度得到鼓舞。

资本逃逸

但这个胜利并不稳固。劳资冲突加速了资本的逃逸,而执政的资产阶级三党(温和党、中央党和自由党)联合政府,除了将瑞币贬值外,并无因应之道。1982年社会民主党重掌政权,面对金钱投机导致外汇消耗殆尽的困境,同样的也被迫将货币贬值。

1990年代一开始,景气持续衰退。为了对付大量的资金外流,社会民主党提议由劳工、资本、国家三方协商一个新的社会所得政策,却引起工会的严厉批判,认为此举是要禁止罢工权。社会民主党被迫改组重建,造成全面性的信心危机。1991年政府有意提高失业辅助,却引发大量资金外流,使得失业问题更为严重。在资方的强力反扑下,那年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鞠躬下台。

国际工运的团结互助

这个模式在一个国家接著一个国家重复地发生，证明了单一国家的劳工运动与民主运动的无力感。

在芬兰，雇主最近要求删减 20% 工资。面对货币贬值 30% 的威胁，芬兰劳工联盟只好退让，减薪 7%，工会最近以总罢工要挟，阻止了对失业福利的删减，这是一项重大的胜利。

面对即将来临的大萧条，瑞典工会可能被迫和资方进行本世纪的第三次大冲突，其结果将对全球各地工运的策略有重大的影响。瑞典工会有获胜的实力，罢工基金仍然完整无损，组织坚强，政治意识很高。

不过不管结果如何，工运绝不能再孤立于国境之内。工运的发展有赖国际的团结互助。我们不能只是跟著国际资本的屁股后面走，也不能只是企望市场经济消失。工运需要一套长远的策略，来规范资本与产品在国界之间的任意游走。

目前的国际劳工团结组织有「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ICFTU) 以及「社会党国际」(SI)。更进一步的国际合作则有赖各国总工会的投入。

工运不能单独作战，还应与其他的人民组织，如宗教、环保、和平团体，以及反种族歧视，人权、妇女运动合作。我们在各个国际组织，如欧洲共同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以及联合国本身，都应有一致的策略。

总之，前途困难，但绝非不可能！

城市贫穷的定义 一项另类方法论的探究

作者：依萨·沙里

译者：丘光耀

在我们尚未探究我国的贫穷问题和城市地区住房问题两者之间的关系时，对城市贫穷的定义有必要重新检讨。我们必须承认虽然贫穷问题业已引起各造的关注，但是要对有关问题加以概念化、定义和审度，却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一般来说，贫穷被视为是对基本需求的匮乏（如维持生活的衣、食、住以及广泛的饥饿问题），以及个人自尊因需要依赖他人的支援而受损等。然而，将上述普遍的概念转化为一项明晰的标准，并推演到实际情况却是很困难的。一部分困难的衍生是鉴于贫穷问题要在一个国家内给予准确定位只能是相对的，即通过将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和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相比较才能作出判断。被视为能维持生计的基本需求是经常随着客观情况和时间的转变而有所不同。

贫穷线收入的概念

在大马，所使用的贫穷概念对城市和郊区而言，是更着重于绝对贫穷，是指缺乏维持生活的固定必须品的那一类贫穷。由此，贫穷被定义为一个家庭无法获得足够的收入来维持基本需求的总支，如衣、食、住、行和医药等用以延续家庭成员日常生活的物资。接着，为了衡量绝对贫穷，当局制定了一个最低收入的标准或简称贫穷线收入（Pendapatan garis kemiskinan）。大马的贫穷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除了衣、食和住外，也包括其他开销如租金、燃料、医药护理、交通、教育和消闲服务的方便。

贫穷线收入也被用作为衡量以确定一个家庭属于贫穷家庭与否。城市地区（包括郊区）的贫穷家庭数量是以「家庭收入调查」所提供的家庭收入分配表为准，最贫穷阶层率亦是通过对计算所有收入少于贫穷线收入一半的家庭而鉴定出来的。

用以计算贫穷率的家庭收入被定义为金钱收入的总和，这包括一个家庭在常年或在一段时间当中所经常获得的物质报酬。被计算的金钱收入包括薪金、花红、奖金、超时津贴、现金津贴和所缴纳的公积金。此外，自雇的收入、产业的收入如利息、红利和租金都计算在内。以物质形式计算的收入亦包括从家里所生产以供自己消费的物品、从雇主那里所获得的物品、以及屋主居住在自身所拥有的房子的租金价值，此外，从交换中所得也被划为是收入的一种。

三大弱点

以上所阐述的贫穷概念和标准，自「第三大马计划」（1976 - 1980）开始，经已被用作衡量我国的所有五年计划，然而，这种贫穷线收入的衡量法存在着若干弱点。哈伦·哈欣（Harun Hashim）曾鉴定过有关弱点：

(1) 贫穷线收入并非一项最终的判断标准，在鉴定贫穷方面，它更像是一种需要被其他指标所加以补充的标准，而非一项得以独立地衡量贫穷的全面概念。

(2) 只是使用贫穷线作为标准，无法衡量出存在于某一个家庭的贫穷状况。

(3) 贫穷线的使用也无法反映出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和福利状况。

此外，使用「绝对」贫穷线收入的衡量方法（即只是根据普通价格水平的改变来调整），可以说是较倾向于会导致低估了贫穷率，因为虽然说贫穷线收入的调整是依据时下价格，但有关调整肯定没有依据固定价格。在经济蓬勃成长的情况下，这种计算方法没有顾及到富裕阶层所享有高速成长的收入和贫穷阶层（特别是居住在城市）低微收入之间所形成的鸿沟。这意味着用此种计算方法，无疑是任由富裕阶层和贫穷阶层之间的悬殊日益扩大。

低估城市贫穷率

除了上述弱点外，用作测量城市贫穷率的贫穷线价值也经常

受到争议，这是因为同样用在衡量城市和郊区的贫穷线收入，会倾向于低估城市的贫穷率。原因是城市的生活指数，如吉隆坡和新山，比郊区者高达 10 - 12%。此外，有部分研究显示，城市地区的家庭，倘若赚取少于一千零吉的收入，那将很难跟得上国家发展的步伐，以维持良好的生活水平。

故此，我们可以继续辩论到底何种标准才是适合用于衡量城市地区的贫穷问题。然而，如果我们对绝对贫穷的关注点转移到相对贫穷的话，则对研究将会更有裨益。当我们研究相对贫穷的问题时，贫穷线收入将无法派上用场。在探究相对贫穷时，一个人或一个家庭虽然在社会 - 经济方面经已脱离绝对贫穷的境地，但他可能在和其他个人或家庭相比较时，还是远远落在后头。一般来说，当政府致力于消灭相对贫穷时，工作焦点应是放在整个社会最低层的 20% 或 40%。

社会排除法所研究的介面

相对贫穷的标准除了适合于政府当局在推进国家发展政策 (1991 - 2000) 时克服贫穷问题外，此项标准也符合当今全球解决贫穷问题的新方法论，即是社会排除法 (Social exclusion approach)。这种方法论最先启用于欧美 — 它将研究的侧重点放在所谓的「新城市贫穷及低下阶级」 (New urban poverty and the underclass) — 专为研究贫穷问题的剧增、社会上越来越多人生活质量的倒退以及因经济的转型和福利制度的重组所导致的社会失范状态。社会排除法有助于研究人员和政策拟制者分析我国的贫穷问

题，哥比纳 (Gopinath) 曾阐述过有关方法论的长处：

「在过去十年来社会与经济组织的发展，显示在贫穷和权利受到剥夺方面经已发生了若干转化。社会不公平的扩大，劳动市场的分化以及工作数量和质量上的变化，正在全球每一个角落发生。社会的各个群体和个人在不同的层次上参与种种变化或被有关过程边缘化。」

社会边缘化的概念建议以一个分析的架构，来处理那些洞悉到和贫穷及权利日益受到剥夺的问题系系相关的介面。」

何谓社会边缘化概念的意涵？简单来说，罗哲士 (Rodgers) 所给予的定义是：「一种有关分析个人和群体为何无法从社会与经济所提供的机会中获得财富及好处的方法论。」换句话说，这个概念不仅是将贫穷问题视为个人所面对的匮乏状况而已。反之，它将我们的注意力导向于考析那些阻挡贫穷阶层参与社会发展主流以分享个中好处的社会过程和制度。有鉴于此，社会边缘化的概念可被视为一项对绝对贫穷概念的补充，而这正是我们所应给予关注的。

社会边缘化的形态

接下来的问题是，到底在城市中那一种形式的社会边缘化问题，导致个人和家庭陷入贫穷或处于社会的下层？罗哲士列出了以下社会边缘化的几种形态：

- 从劳动市场中被边缘化；
- 从得以追求更尖端技术和获得更高收入的职业中被边缘化；

- 从能够提升技术的机会中被边缘化；
- 从借贷制度中被边缘化；
- 从获得适宜的住房设备以及基本的设施如水供、电流、清除垃圾和排污设施中被边缘化；
- 从社会保障的制度中被边缘化。

通过了解被边缘化的形态以及那些导致部分社会成员继续贫穷下去的机制，或是在国家宏观经济取得长足成长，但贫穷者依然无法翻身的种种介面后，则政府当局和非官方机构才能采取有效的步骤。然而，政府往往忽略了对贫穷阶级的照顾，并倾向于对另一方面的要求作出回应。职是之故，为了更有效地解决贫穷问题，那么如何让贫穷阶级克服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被边缘化的问题就必须获得关注。

有鉴于此，上述研究社会边缘化的方法论之所以被认为更为有效，原因是它能协助我们从更宽阔的视角来考析问题，而非单单从收入角度出发而已。反之，我们也必须从政治的介面——例如参与政治的权利、个人和政府的关系以及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中观察贫穷现象。有关方法论将能被应用在分析我国的城市贫穷问题以及住房设施匮乏的问题。

本文曾刊载于 1998 年 8 月 16 日《星期广场》

行动党新旧 「政治典范」的冲突

黄伟军

近日民主行动党因革除及中止黄朱强、廖金华及冯杰荣三人的中央委员会职务而引起报界的广泛报导，有关事件在形式上不论被外界形容为是「大地震」，抑或「茶杯里的风波」（行动党主席曾敏兴语），在笔者看来，其本质正正是新旧行动党「政治典范」（Political Paradigm）的较量。

所谓「典范」，按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的看法，又称「专业基体」（Disciplinary Matrix），它是一种由对特定模式的信念、价值和范例所构成的「共同体」。不同的典范对某一领域（或问题）有不同的标准和定义；它有不同的概念网，与实践、观察有不同的联系；不同典范的支持者在不同的世界里从事他们的活动。由此，不同典范的人看到的是不同的世界。

以英国工党为例，该党的「现代化派」与强硬的工会份子，他们对工党的重建和意识形态的理解是迥然不同的。他们政治「典范」较量的胜负不仅决定了新工党能否诞生，也决定了英国的历史和该国人民的命运。

作者为旅英政治学硕士研究生，曾在吉隆坡某独中短期执教。

不得以求变

林吉祥在97年5月提出要建设「新行动党」，以及该党政治教育局主任邓章钦在更早的时候表示要建立「新火箭」，此举都是试图要竖立「新典范」的努力。他们看到时代主题的变奏、政治气候的转变、科技革命的影响、传统铁票的流失、新生选民的旨趣，导致行动党不得不务求改变，否则该党在千年盛世的门槛，就宣布「完成了历史使命」。

为催生「新典范」所配套的种种改革方案，被「旧典范」视为是一系列与常态运作预期相悖的重大新事物的「反常」现象，他们担心因「旧典范」受到冲击而丧失既得利益。鉴于此情，新旧「典范」开始进行激烈竞争，互不让步，而「旧典范」倘若不被扬弃，则「新典范」就无从确立。

许多评论家习惯以「年龄」作为区分和解释近年来行动党发生人事纷争的标准，似乎林吉祥在大力扶持「少壮派」以迈出改革步伐，蓄意冷落「元老派」。这种纯粹以年龄作为分野的标准，无法解释许多冲突的现象，难怪报界对于不少不老的黄朱强很难归类。

另一类评论的切入点，是以「林吉祥独裁论」为基调，它把许多无法以「年龄」来解释的冲突现象，归咎给林吉祥一人来承担。因此，「林吉祥独裁论」把行动党自建党以来所有发生叛党、脱党的个案，不经「具体分析」地统统简单化处理，如把柯嘉逊、李万千的退党，和李银芳、邱成福的跳槽等同起来；或将郭金福、陈庆佳的辞职和黄、廖、冯的风波相挂钩，无疑行动党数十年来引

发纠纷的「黑手」就是不能接受「异见」的林吉祥。

「典范冲突」是笔者硕士论文专司研究行动党改革的理论根基。最近笔者曾不断接触行动党新旧「典范」的人物，从口述笔录、文案研究到问卷调查，再结合许多感性的体验，笔者认为「典范冲突」是其中一个研究行动党历史和现状的有力理论框架。在研究过程中，巧逢发生黄、廖、冯的风波，因此，笔者就斗胆给大家提出一些考察意见，希望能开拓对「行动党研究」的新视角。

「典范」冲突的发轫

自行动党在上届大选败北后，强大的政府在处理经济危机和维持有效的公共服务方面都表现得差强人意，加上私营化的弊端层出不穷，导致许多选民都对在野党的制衡力量重新寄予厚望，人人皆看好行动党在来届大选必能大有斩获。

这种对行动党绝对有利的客观形势，也从多场补选的成绩中反映出来。该党中央领导层必然懂得审时度势，而林吉祥为了杜绝「旧典范」头脑发热，信心爆棚，便警告行动党上下要摒弃「等榴连跌下来」的心态，积极展开工作，加快改革步伐，扩大斗争疆域，而「新行动党」的催生，就是在这么一种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首先，林吉祥看准了数码时代的政治生态是和过去截然不同的，资讯工艺成为人人日常生活的中介纽带，而行动党为了开拓新生代的票源，不能不了解、关心、洞察并反映出所谓「新新人类」的理想和诉求，这不仅为该党走出传统「华人捍卫者」的旧框框提

供了契机，同时也是将该党的政治信仰落实到资讯和权力分众化的生活中去。

「资讯工艺、人人共享」便成为行动党近年重头推动的政治议程，是为新行动党的一面旗帜之一。这本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前瞻之举，然而，它也点燃了新旧行动党「政治典范」冲突的第一个导火线。

「旧典范」对资讯工艺感到陌生和作出本能的抗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消极的抗拒转化为积极的抬杠却是非理性的。譬如指责林吉祥不仅过度沉溺于资讯工艺，甚至指「林吉祥变了」、
「向国阵靠拢」、「给马哈迪收编」。另一方面，「新典范」积极成立「资讯工艺中心」，频频开展资讯教育工作，这都需要专业的知识和系统的管理。「旧典范」没有终生学习的准备，却把责任推诿给他人，同时具有强烈的「反智」（Anti Intellectual）倾向，导致他们害怕新科技、抗拒新文化、妒嫉新生代。

迷信火箭魅力

「典范」冲突的另一个导火线，发生在行动党对外的组织和统战工作上。「旧典范」过去基于强烈的宗派主义色彩，导致它与外界（不论是华团、其他在野党或非政府组织）的「统战」关系都做得不甚理想。「旧典范」对「火箭魅力」的过度迷信，造成不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么一条硬道理放在眼里，「旧典范」在对外组织动员时的力度和广度明显不如当年的社阵，原因就在这里。

然而，「新典范」近年来开始主动向党外伸出橄榄枝，如在

去年举国热烈讨论《新反贪污法案》的修订时，林吉祥就曾以国会反对党领袖的「公职」身份（非行动党秘书长的「党职」）来召开「圆桌会议」，广邀各界精英，为该党的肃贪纲领出谋献策；此外，在将资讯工艺普及化方面，行动党也基于公共利益为考量，和国阵一道合作；「林冠英公案」更把所有捍卫正义、女权、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的社会力量团结起来，并在6月8日成立了四党联合的反对党理事会，这一切都是「新典范」近年来在幕后默默经营所换来的小小成绩。

再者，「旧典范」对大专青年的工作，数十年来都没有认真看待。加上《大专法令》的禁锢，对彼此的相互冷遇，提供了合理化的借口。「旧典范」在「观念引航」方面确实匮乏，难怪大专青年对行动党没有亲和力；行动党对知识份子没有感召力。

「新典范」近年来所从事的学术和理论研发工作，以及在组织学生的经验方面，经开始在大专青年圈子发挥影响力，反之「旧典范」即使在大学论坛外的政治座谈会上所使用的语言以及所讲述的内容，都只是充斥着怀旧式的感慨激昂，无法为新生代提供任何政治指引和启发（最近笔者出席行动党实兆远福清洋支部所举办的晚宴，冯杰荣的演讲内容竟然有80%是在大谈当年的「三保山运动」，频频突出他们32年的斗争精神，没有触及任何时下的热门国家议题）。

「旧典范」强调「选党不选人」，因此无需加强组织（黄、廖、冯的支部组织建设十分贫弱），不重视选区服务工作（廖被报界形容为「睡觉议员」），忽视理论的研究和推广，甚至宣传方面也差强人意（黄主管宣传部三年来，《火箭报》只出版过一期）。笔者对「旧典范」的政治运作，实在不敢恭维。

重视意识形态斗争

柯嘉逊认为行动党的斗争缺乏意识形态的指引，这种评论对「旧典范」而言无疑是中肯的。行动党数十年来从未重视理论研究，在实践上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联系也不强，在宣传方面也尽量谈化民主社会主义的色彩，这当然也不能全怪行动党，因为选民的政治认识不高，同时敌对政党亦从未突出意识形态来争取选票。

但是，如果任何人说一个政府所实施的公共政策，背后没有意识形态指引的话，这无疑是患上虚无幼稚病。国阵政府的「2020年宏愿」、「亚洲价值观」、「私营化政策」都是具有意识形态考量的政治经济纲领。反观行动党「旧典范」在应对马哈迪的政治经济学方面，是显得多么地苍白。

行动党「旧典范」的操作，即是以「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为目标，把国阵数十年来的单元同化政策所激起的民怨，转化为行动党的票源。行动党许多「旧典范」的领导人，与其说是多元民族的左翼政治人物，倒不如说更像是反对国阵政策的华人斗士。他们无需提出具体的、可供替代性的公共政策，也一样能撼倒政敌，赢得民心，取得选票。行动党「旧典范」可谓是一个符合「忧患时代」需求的反对党，但一旦国阵在90年代提出「2020年宏愿」的发展纲领，以突出经济建设来谈化种族矛盾后，「旧典范」在一片歌舞升平的「安逸时代」显然就不大能调适自己。

「旧典范」丧失发言权

在行动党内拥有主动「求变」能力的领导人毕竟是少数，被动地「应变」者也不多，而习惯在「忧患时代」作斗争的领导人，基于他们的「旧典范」跟不上时代的主题，而显得嗒然若失，士气消沉。加上许多因新时代、新形势所衍生的政治议题（宏观者如对全球化的利弊、生态循环、女权意识、地缘政治、国际战略等问题的认识；微观者如对网际网络、马华文学「烧芭」的争端、大专青年的困惑、城市工人的权益、原住民的命运等），他们都因认知上的滞后，而失去了发言权。

「旧典范」所习惯处理的议题在新的政治形势下经已不存在，或者说有关矛盾不再如过去那般尖锐，难怪他们会自我边缘化。反之，新的政治议题需要新的「政治典范」来处理，行动党内新生代领袖的表现给笔者看到新的希望，如林冠英和邓章钦在议会内外卓越问政表现；陈国伟踏实的选区服务和长袖善舞的统战手腕；章瑛、郭素沁和古拉对国内外非官方组织事务的积极参与；刘天球对行动党宣传形象的全方位设计以及丘光耀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深化研究，都是新行动党的新「政治典范」的具体表现。

寄望新行动党

事实上，行动党新旧「典范冲突」是可喜的现象，这是新生事物降临前的阵痛；是「新典范」确立前所必然经过的斗争，我们

对行动党的寄望是应该建立在这麽一种理性的认识基础上，不要动辄就把责任简单化地归咎林吉祥一人来承担；更不要频频以「团结」来阻碍新行动党的催生。

西方政治名言有道：「政客是为下一届大选而考虑；政治家是为下一代而考量」。选民在当前的政治形势对行动党寄于「团结」的厚望是无可厚非的，但为了选举成绩而要求行动党向消极、僵化的「旧典范」妥协，放缓改革步伐，牺牲新生力量，错过历史契机，即使行动党在来届大选能赢取更多的议席，它亦肯定无法胜任下一世纪的政治挑战和使命。

「旧典范」着重的是下一届大选；「新典范」放眼的是下个世纪！

我们不要对行动党有所寄望，我们要寄望的应是新行动党！

本文曾刊载于 1998 年 6 月 21 日《星洲广场》。

——续《行动党「新旧典范」的冲突》之后 需要一种新的政治文化

陈希玲

我们社会面临的问题是无穷无尽的，特别是在这场经济风暴后，空气中充满了抱怨和要求改革的呼声，但我们发现，尽管有人提出解决问题的新规划、计划和实践，但却只是请丢石头的人搬进玻璃屋里，不但问题没有解决，徒增人民万般无奈和失望的情绪。

从标题可以看出，这篇文章旨在论证目前形势下一种新政治文化需求的必要性，特别要谈的是行动党近日来所谓「大地震」后的余波，所涉及该党党内「新旧典范」的冲突问题。

如同任何新生的政治观念一样，它必定是反映某种社会形势的转变，政党内的「新旧典范」的冲突也是标志着（党内政治文化）某种转变的到来，这并非是纯粹思辨的产物。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且来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 （一） 哪些形势的变化要求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指引？
- （二） 为什么需要一种新的政治文化（且称为「新典范」）来完成这种使命？
- （三） 改革的目的与新行动党未来的走向是什么？

作者毕业于中国复旦大学哲学系，目前任职于华社研究中心社会大学部。

提出上述三个问题的目的，是我本身对民主行动党所想要缔造的新的政治文化的进一步思考的基础。

走出困境的契机

自90年代以来，除了1990年大选所提出的「壮大反对党，促成两线制」的口号曾掀起一阵高潮外，整个政治局势随着国阵提出的「2020年宏愿」和经济一片繁荣昌盛的景况后，加上对国内外政治和形势的剧变，行动党原有的理论、政纲和思想观念已逐渐丧失适应能力，但是它在某个程度上又不肯轻易放弃原有的进行轨道，却也没有完全辨清未来的发展方向。

如果说「林吉祥即是行动党」，「行动党即是林吉祥」，也能使行动党在巨变洪流中屹立不倒，这说来倒有点牵强。我个人更倾向于这几年来在台前幕后默默耕耘的「新典范」所下的功夫。

从现在看来，行动党自90年代后，党员人数没有逐年增加，反而不少高层领袖纷纷离去，而行动党中央领袖年龄结构也日趋老化。很明显，这些行动党领袖中的「旧典范」对某些具体问题进行批判时，并没有做到更新自身，开拓眼界的高度；同时，行动党在老、青和妇女党员之中，各有其利益和要求，各有自己的活动领域，并与各自不同的社会运动保持联系。但它们之间却缺少必要的交流和沟通，更少相互支持，这对一个政党的运作和党内民主来说，是弊多于利的。这也是造成今天「新典范」和「旧典范」冲突的矛盾之一。

另外，信息时代的来临导致一系列社会文化的变迁，这也是黄伟军提的时代主题的变奏。个人和群众以信息资源来定义自身，构筑自己的生活空间，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新兴阶级的生活方式。然而，行动党的「旧典范」对这种变化的敏感度和反应却不如过去年轻时斗争了几十年的情况一样，显示出其元老的实际威慑力和影响力，或是尝试去重视时代所提出的新问题、秉承左派不断学习的优良传统，或至少在重大课题上谋求与「新典范」的合作及支持。这些都是成为「新典范」奚落「旧典范」的原因之一。

一方面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旧典范」是行动党不能走出其困境的原因，而「新典范」则声称带领行动党走出困境的力量。我们看到，在这三年里，改革派在分析和更新行动党的观点方面的犹豫不决的心理开始消解。行动党内的知识分子已有能力对过去的遗训进行严厉的批判和重新思考。这是我们希望看到一个真正强大的反对党所应感到高兴的。他们看到了问题的症结，并且有了结论。据悉，行动党内的「新典范」极推崇英国新工党的东尼·布莱尔的「改革」和「现代化」方针，即「世界变了，行动党却没有变」，他们决定改变它。

「新典范」在这里作为进步的力量和新的政治文化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的任务是促成这些转变。此间，我本人因有幸与多位「新典范」的人物有知性和感性的接触，对他们的进步感到莫名的高兴和鼓舞。但是，作为一名观察者，我们的思考便要触及问题的核心，即「新典范」如何在时代赋予他们的这种使命中，施展他们的抱负。

承先启后的原则

在刚才提到那些已经无人接受或者已经被证明是落伍的「旧典范」之后，我认为，公正的做法是：「新典范」不仅要对那些过去 32 年来以自己的青春、智慧和精力来奉献给民主事业的元老们表示感激，对他们所做过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成果要加以珍惜，并且结合他们的经验和自己改革的纲领来促进反对党的力量。

「新典范」不应该被设想为一种旨在取代、继而排除旧的「传统」的新政党。因为他们没有必要放弃已有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中任何有生命力的成分，而是在于拓展它，以便应对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好比「第三条道路」的提出，正式标志着「新典范」对改革现代社会的批判态度和战略目标，而我本人也满怀兴趣想看看「新典范」如何在所谓「历史的终结」或「意识形态的终结」的大环境下，坚守他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革新能力的」这个信念。

行动党过去从未认真从事党的理论建设和研究工作，给外界和党员一种「意识形态」甚为模糊的印象，这也让「新典范」在建立一种新政治文化的同时倍增困难。

但我们也看到「新典范」的决心和魄力，经过信息洪流的洗礼，他们已使自己适应了变化的要求，他们深深了解到「We modernize or die」的道理，这是「旧典范」所不及的，他们依恋的草根政治，导致心态上仍然停留在农民起义的阶段。但是，关心反对党前景的人们也不得不担心的是，尽管「新典范」已展开了新的政治文化的改革运动，但是基于结构上的捆绑，他们的不彻底性，也许会种下日后难以收拾的后果。

「新典范」的挑战

「新典范」的「新」，仍在于它具有过去传统上所不具备的新特点，他们的活动范围、斗争手段和价值取向的变化，虽具有新时代的意义，但是在其他方面，「新典范」是否也具有足够的勇气去催促和建立更完善的新政治文化？比如党内权力交替的制度，如何淡化林吉祥个人领袖的魅力而突出「新世纪·新行动党·新希望」的活泼形象，以及让真正学有专长的人分担党内对拟制公共政策的任务。

如何在「后林吉祥时代」的权力真空中，倡导全新的「权力下放」和「职务合理分担」的观念，都是非常重要的。其他如包括如何在新的意识形态的旗帜下，团结一切关心社会改革的力量。笔者在这里斗胆提出「后林吉祥时代」乃出于关心和希望能达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本人相信这也是「新典范」的重大隐忧之一。

拥抱下个世纪

如此看来，「新典范」的「历史任务」一点也不轻松。目前，该党内的 KOKS（倒林吉祥运动）到底是出于个人动机，抑或政治阴谋还是理性的批判？是不是会演变成「反林吉祥」即是「反行动党」那种中共式的政治文化？而「新典范」在这方面又能起什么作用？林吉祥是行动党一名极具魅力而支配欲极强的领袖，他那样的领导方式，已导致党内权势和信心天坪的严重失

衡，这不但伤害了长久与他共同战斗的同志，也形成行动党正常的党内民主面对发展障碍。

「新典范」的出现可望改变和分化这种现象，而他们本身也已成为促成这场变化的手段和目的。我们更乐意看到的是「新典范」敢于进行彻底的结构性的改革，共同分担权力、责任和互相配搭，避免历史的重演，唯有这样才能放眼未来，拥抱下个世纪。

行动党的未来应秉承四大理念

黄永安

民主行动党在党章和若干重大的建党文献中自我定位为一个奉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在建党后不久又争取到参加社会党国际，成为世界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民主社会主义党和工党大家庭的一员。

这就是我们党的定位与特性，也就是我们党的身份，因为身份的鉴定不能以「我们反对什么」来处理，而是需要「我们是什么／我们主张什么」去自我肯定。

由于具体的历史因由，我们党建党以来就没有改换过很多次的主要领导人，这个事实有好与坏两面。

其一，领导层的稳定也为在60、70和80年代的旧式政治斗争中提供了整个党稳定的基础；

其二，由于时代的巨大变化和年长一辈的领袖已渐渐迈向乐龄，单凭领导人不变来提供稳定与发展，无论在理论或实践中都是不可靠和缺乏效能的。

加上我党的具体组织一向来都很薄弱，党不稳定或面对千变万化的国内国际形势演进时举棋不定、慌张失措或患得患失的情况（有时是很微妙而不易觉察）就日益频仍。

告别「农民起义」式的斗争

当然，我们可以继续跟着感觉跑或以「农民起义」的感性领导进行斗争，不过，是类方式是有其历史局限的，也只适用于有机会在高层领导人身旁或党机关工作的全职党工。

进一步说，恁靠感觉与感情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也很容易造成全职党工和思想心理缺乏自信的干部产生依赖、情绪不稳定、精神空虚、生活不充实与交际圈子狭窄的负面效应，同时给中立的群众或浮移选名一种「不知天高地厚」与「忽亢忽卑」的感觉。

如前所述，以前「储蓄」下来的「感觉」还会在未来几年用得上，但是，「储蓄」若不继续或改变生态（不仅方式而已），是会用完的。

杜绝自艾自怜

在「储蓄」用完后，可以想像的景象将是不愿改变，也不想别人改变的党领袖、党员和干部日益与主流的国内国外社会，其动向、其思潮、其时态和其议题脱节，进而自艾自怜地感叹「如果生活欺骗了你」。

要防范这种局面出现而成为历史悲剧或甚至个人的悲剧，行动党举党上下都必须进行思想现代化的工作与调整，重建一个以现代社会民主党身份的特征的政治组织。

问题是社会主义有那些可以和我们的理念相结合呢？这些

理念可以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实践吗？

有的！理念和实践都有！问题只是我们是否准备接受改变、接受自我改变的概念、摒弃过时的思考与心态。

社会民主的4大理念就是（1）进步的观念、（2）普世的关怀、（3）科学的思想、（4）人道主义。

进步的观念是指我们应该相信，在理性思考后的政治参与，会推动社会在物质及精神上比以前更好，而且好的东西最终会淘汰不好的人、事、物。

应喜见年轻人进步

有了进步的观念，我们就会对比我们年青的人有了比我们更好的学识、更强壮的体格、更精明的思考、更完美的生活、更广泛的社会接触，感到内心里的欣慰、高兴；而不是希望他们像我们一样在年轻的时候捧咖啡、逃难、脚踏车。有了进步的观念，我们就不会有那种「你要捱过我以前捱过的日子」才有资格跟我讲话的「长征英雄」的心态。

有了进步的观念，我们就会对年青人能坐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互相交流策划而加以鼓励，而不是疑神疑鬼地试图分而治之；在党内有了进步的观念，我们就应会更自然地、正常地根据自己的年代做本年代的事，而不应再出现年青人扮老人、老人扮年青人的不自然、不正常的潜意识。

有了进步的概念，年青一辈的就会有自信与安全感去在同辈人中交流、争辩、互相学习、互相批评，而无需找前辈批护；亦无

需在心理上依赖前辈肯定或稳定。

拓宽世界观

普世关怀指我们应有更广阔的世界观，承认我们党有她光荣与独特的一面，同时，也知道我们党也和历来东西方所有政党一样，有人类组织的弱点，而加以改进。

普世关怀当然也意味着我们在作出决策时，尽量去考察和审度世界各地、各个历史时期的类似形势与难题。

建立普世关怀也要求我们去追求认识应该认识的人、事、物，包括历史上的人、事、物，作为我们的参考对照。

我发觉一个非常不建康的封建主义心态在作祟，即由于担忧有人不高兴，90年代加入的一些党工，拒绝去认识80年代末期发生过的事或认识80年代曾活跃过，后来淡去的党干部。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当作一切不曾发生或不存在才会觉得自己是开天辟地的重要人物？

社会党人是现代的人，也是带动现代化的政治力量，我们不应该实践这种宋朝的史观。

瑞典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都有党史馆，忠实地超越党内纷争地记录着百余年内发生过的事和人物传记；我们钱虽不多，不能学到足，但是，现代的精神相信是不用钱去培养的。

在宏观方面，普世关怀就是要我们去批判性看待和处理民族主义和国家主权的问题，以迎合国际及没有政治一体化的新实现。

科学的思考

科学的思想就是要耐心和涵养的，不能说最高领袖很忙，没有「你们这些学者／写文章的人」的闲情去想东西。

这是神话。学者和写文章的人也和日常生活的普罗的人一样忙，而且是有标准如ISO9001/2/3去衡量绩效的；全职政治领袖也许很忙，但是忙并不是不去作科学思考的藉口。

其一，如果这么忙，为什么不分工？是不信任人或是认为没有其他人会做得比我好？

其二，科学思考并不是叫你当统计学家，而是说尽量全面反复衡量事物的轻重、缓急先后和主次；

其三，或是我忙是因为我的竞争欲特强，凡事无分大小都要领先？都怕别人用了你的版位或广播时间？

所以，一个好的分工、分权、分荣耀的工作制度是确保党建全发展，走向社会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否则，我们觉得将永远停留在「起义」的心理状态中。

当然，懂得工作后休闲也是关键的。

九大基调

人道主义即说，我们政策与路线的制定与世界观必须以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和安全感9个主要基调为基础，而不是我们制定政策以人的英雄感，荣辱为依归(我们不是马哈迪)。

党要不要转化改革当然在很大程度上看我们当今的思想与精神状态和我们是否拥有自然的人生观。

社会民主党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相反的，我们都是血肉的人，不过，重建一个社会民主的现代政党却要求我们去做个现代的人，有现代观念与基本社会举措的人，而不是在时空真空中得过且过的人。

行动党的斗争与草根运动

黄金城

作为一个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以及社会党国际的一员，民主行动党自1966年创党以来，的确在实践社会民主的道路上交了及格的成绩单；但在参与草根运动，诸如工人运动、环保、妇运、公共福利、少数民族权益方面，仍显得不足，必须进一步加强。

针对这点，勿须党外人士的提醒，民主行动党内也不乏一些勇于自省、敢于批判的声音。例如上一期的《火箭报》，该党全国政治教育局主任邓章钦便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我国客观政治环境的发展，造成民主行动党长期不自觉地重于作出反应式的政治行动，忽略了更为重要的政治运动，进而淡化了党领导与党员对党政治信念的理论基础与建设。」

民族平等的纲领

事实上，民主行动党强调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理想而斗争，这项纲领，主要在于为实现各族平等的目标而设，离

开实践社会民主的终极目标显得过于浅窄，无法凸显其进行阶级斗争的宽阔视界，也模糊了它与左翼运动、草根运动的历史渊源。

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与工人运动，是血肉相连的；作为一种国际运动，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强调自由、公正与平等、团结互助与和平；因此，它不只关心本国任何个人及社会团体的权益受到侵犯与剥削，它同时也关怀国际的民主状况，奉行普世的人权观，支持联合国人权宣言。

民主行动党的斗争方向，虽然符合社会民主的精神，特别是在60年代的动荡局势当中，它一改社阵的「过激路线」，以较温和的方式，朝向「议会民主」的道路前进，为它本身取得很大的民意支持。

然而，不论是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甚至是90年代，民主行动党的政治行动仍然视国阵的动作而反应，缺乏高度的自省。如果国阵偶尔作出一些有益民生的政策，民主行动党的一些领袖在面对传媒的询问时，便无法清晰地、理智地在其谈话与文告中贯澈社会民主精神，并毫不含糊地作出回应。

被动的窘境

这种不自觉、被动的窘境，反映了部分领袖对社会民主精神要旨未能掌握。在瞬息万变的资讯时代，以及面向下一个千禧年的世纪之交，领袖除了政治的激情，更须有专业的政治素养。

民主行动党的政治教育工作，若说在过去因客观因素未能有效

地贯彻到全党，那么，在强调「资讯工艺」的大前提下，行动党呼吁人民学习电脑，吸取新知、加强竞争力，也设立了两所资讯中心，对党员及领袖的政治教育，又岂能忽略？

有论者认为，社会民主早体现在该党「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纲领上，殊不知这仅是从美国总统门罗「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脱胎换骨而来的概念，是落实社会民主的最底线要求；若要在下世纪有更佳的作为，并吸引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成为接班人，绝不能数十年如一日的捧着一纸「圣训」喃喃自语，必须自我鞭策，看清时代的变迁。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民主行动党在工运组织中拥有可观的渗透力，V·大伟等人活跃于职工总会，为它带来可观的票源，民主行动党与国际劳工组织的联系也较强。

然而，80年代中期开始，民主行动党与劳工组织的关系逐渐淡化，这固然是因本国的客观现实使到工运领袖小心翼翼地与民主行动党划清界限；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便是一些工运领袖忙着向国阵自动缴械，自愿被收编以换取个人利益。

强化和工运的联系

既然如此，民主行动党也不能因此放弃它与工运的亲密关系，对劳动阶级也应表现出更多的关怀。例如最近在一片裁员声中，除了职总之外，其他政党极少挺身而出，为劳工争取福利，民主行动党在这方面，应可扮演一定的角色。

在环保工作、妇女一定、公共福利、国际人权及争取少数民族

权益的岗位上，民主行动党个别领袖的表现相当出色，如郭素沁、刘天球、章瑛等，便踊跃参与非政府组织在环保及人权方面的运动，包括在去年东协部长会议时，率众在会场外以和平方式抗议东协接纳践踏人权的缅甸成为会员，赢得国际的瞩目。

可惜的是，尽管民主行动党有个别领袖在各种社会运动、草根运动作出贡献，但总体来说，它在这方面的参与度仍然不够，予人发表文告多于其他行动的观感。

三十而立

作为一个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民主行动党成立 32 年以来，在捍卫民主、人权及自由方面的功绩，不容置疑。所谓「三十而立，四十不惑」，迈入而立之年的民主行动党，对目前的困境及未来的发展，应有一番反思，甚至变革；在不惑之年，才能有更佳'的作为。

因此，秉持社会民主主义，积极参与草根运动，应是它努力的方向。唯有社会民主主义，才能开阔它的政治视野，突出其新左派的睿智形象；积极参与草根运动，才能使它紧扣大众及社会的脉搏，真正深入民间，消除其「华人政党」的形态，强化为中下层阶级权益的斗争，创造更民主的社会。